

看见过去 知道未来

看历史

EYE ON HISTORY

EYE
ON
HISTORY
封面故事

沦陷区

一个更复杂的存在

日伪城市管理 / 毫无善意的“善政”
战略物资统制 / 疯狂的掠夺与反掠夺
粉墨登场 / “宣抚班”真相
沦陷区之光 / 一本杂志的风骨

中国历史上的“川军”

影像记时：中国股市 30 年

两万册国宝藏书租界逃美记

蓝鲸行动：
美刺杀蒋介石秘闻

08
2015/AUG

ISSN 2095-0853
9 772095 085150
08

定 RMB 20元
价 HKS 30元
邮发代号：62-313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

文 | 浦顿

不管是高考还是公务员考试，都不再是一考定终生。如今，人们可以拥有多次选择机会，直到找到属于自己的道路。

知

名作家十年砍柴 1993 年兰州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东方电子厂工作。

和他一起分配到这个厂的大学毕业生，逐渐对这个国营老厂心生厌倦。食堂和厂房都很破旧，更重要的是，效益也不好，看不到什么希望。

后来，机会来了。1994 年 8 月 19 日，中央国家机关首次招考公务员，这意味着可以通过考试直接到国家部委工作。他们刚刚工作满一年，复习备考的能力还在。于是，他们再次踏上梦想的旅程，十年砍柴考进了国家司法部。

这样的变革，对立志从政的青年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有一个高中同学，大学在中央财大读书，毕业那年，他报考中纪委的公务员，几千人报考，最后只录取三人，他成为了三个幸运儿之一。

对中央国家机关来说，直接招考公务员有利于精确寻找到新鲜血液。报考的多为应届大学生，他们饱读诗书，但是社会经验却还是一张白纸。“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他们的理想主义会给机关带来朝气，同时又可以根据特定机关的需要进行培养，有希望成为中坚力量。

当然，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不独国家中央机关，省市县的机关都在大规模招公务员。尽管不时有不公平的录取事件发生，但是总体而言，这种大型而严格的招考仍然是最公平的选拔方式。



对中央国家机关来说，直接招考公务员有利于精确寻找到新鲜血液。年轻人的理想主义会对机关带来朝气，同时又可以根据特定机关的需要进行培养，有希望成为中坚力量。



年轻人报考公务员是不是好事？青春的最大特点就是理想，而公务员给人的感觉却是超级稳定的现实感。太过稳定的生活，往往缺乏激情和创造力。事实上，公务员的报考，是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的晴雨表，在经济飞速发展的时候，年轻人往往更愿意到企业寻找机会，而经济转型期，他们就更愿意到政府上班。最近十几年来公务员考试的大热，说明社会最大的价值诉求趋向稳定，而不是创造。

但是，事情正在起变化。这两年，公务员的报考人数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人们发现，稳定虽好，但收入和晋升机会似乎有所缺失。更重要的是，创业在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改革开放以来，30 多年的经济发展，使很多家庭拥有了可以支持子女创业的能力。

上面提及的十年砍柴的故事，还有下文。

他考进了司法部，那些留在东方电子厂的人，如今大多是高管，东方电子厂改制上市了，就是现在的京东方。十年砍柴在司法部工作一段时间后，又遇到了部里面的改革，他去了司法部下属的《法制日报》。后来，他辞职了，去了语文出版社。不久前，他又辞职去了无界传媒。他没有成为一名官员，而是成为了知名作家。

这样的故事非常动人，因为不管是高考还是公务员考试，都不再是一考定终生。如今，人们可以拥有多次选择机会，直到找到属于自己的道路。①

张伯行：康熙朝第一清官

文 | 张海增

张伯行是康熙盛朝的肱股之臣。他自幼勤勉好学，十三岁便熟读四书五经。康熙二十年，赐进士出身。康熙三十一年，补授内阁中书，历任济宁金事道、江苏按察使、福建巡抚、江苏巡抚、礼部尚书之职。张伯行一生为官勤勉、清廉，虽几遭奸佞之臣弹劾，但却不改为官时“廉政”的初心。

致仕初年，送礼之风日炽，下官奉上官金帛、宝器以求被提点的陋习由来已久，世时朝野盛传“各行省积弊最深者莫如江南”之言，这不禁使时任江苏巡抚的张伯行身负重压。

一次，六合县令登门求见张伯行，假借赏画之名，将一根沉甸甸的金条暗藏至其中。赏画时被所藏之物所吓的张伯行，次日在回见他时，便亦赠予其一幅字画，张伯行如法炮制，不仅将金条物归原主，还在所赠之画上书“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至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之词，并写《禁止馈送檄》告诫官员。

康熙四十二年，张伯行任山东济宁道，到任时，遇大灾。他立即自筹粮饷，共筹得仓谷二万二千六百石，钱帛若干。而后，他在充任福建巡抚时，亲历了粮商囤积居奇，贱买贵卖的丑恶罪行。当即他下令由府库出资，售平价粮给百姓。而也正因此举触怒了权贵的既得利益，在此压力下他仍能泰然处之，与权贵们斡旋。最终，他用“仓谷为轻，民命为重”的大爱感化了圣朝的仁者之心，而免于获罪。

张伯行力行改革，废封建迷信，崇义礼，所行之事深得民心。在调任福建巡抚之时，当地百姓痛哭数里相送，

其情其景令人动容。然而，至良善、恤民情的张伯行却在官场上受尽排挤。

康熙五十年，张伯行任江苏巡抚，适逢当年秋试，总督噶礼与考官为一己私利，狼狈为奸，沆瀣一气，做起了卖官鬻爵的勾当。寒窗数年，终难抵金箔宝器，士子们都为此愤然。以致在揭榜时，有千名士子将财神像抬入了文庙的正堂，以此泄愤。为寒士数年的寒窗之苦，亦为朝廷遴选更多的栋梁之材，张伯行挺身而出，将此事奏与了朝廷。不明实情的康熙帝龙颜大怒，擢噶礼、张伯行二人协同彻查、审理。不过数日，张伯行便将噶礼的所做之事查得水落石出，并将查实之事奏报了康熙帝。诡诈的噶礼自知难逃干系，索性串通了口供，设法构陷了张伯行。就这样，噶礼与张伯行一同下狱。但时隔不久，噶礼依附权贵，凭借其翻云覆雨之势，终被免刑、保释；而张伯行却始终正气凛然，不肯向权贵低头。此冤案传出，天下哗然，百姓皆为张伯行鸣冤，一时间，士子们纷纷上书，恳请康熙帝彻查此事。得到奏报的康熙帝勃然大怒，斥群臣，拟御旨，免噶礼之职，复张伯行之职。

“只饮江南一杯水，四海清官数伯行”，这便是百姓对张伯行的评价。“食只菜蔬，衣必麻粗”一生都大抵如此的他在赢得百姓口碑的同时，也被康熙帝所推崇，康熙曾言：“伯行操守为天下第一。”康熙五十四年，张伯行以“狂妄自矜”之罪再次被朝臣弹劾，对此事康熙帝却不予置评。康熙六十一年，张伯行在千叟宴上，被康熙帝赋予了“真能以百姓为心者”的评价。^①

01

《通往兰尼米德之路》

(英)《今日历史》2015年7月

大宪章是如何诞生的？肖恩·麦格林称，英国国王约翰继位后，继续与法国国王作战，结果战败并丢失大片土地。约翰国王极度渴望能够收复失地，1214年再次发动对法作战却又惨败。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催生了《大宪章》的诞生。

此时的约翰国王，对外作战失败，对内尽失民心。当时，英格兰的内廷官员和贵族们遭受到了来自约翰国王的百般羞辱：大臣们的婚事甚至大臣子女们的婚事都必须得到约翰的首肯；他不断地废除旧律，与此同时每年都签发新的律法；他对民众施以沉重的赋税和无尽的徭役；他削弱了几乎所有贵族的既有特权；他试图限制所有人的自由；他继承又肆意变卖皇室的遗产；他在国内诉讼的判决上总是搪塞，时常出卖正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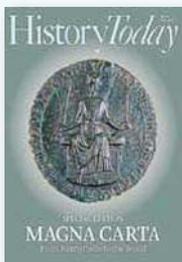
再度对法作战失败后，英国贵族和平民等各方力量的反抗情绪终于爆发。1215年6月15日，在强大压力下，约翰国王在泰晤士河边的一块平原——兰尼米德签署了《大宪章》。《大宪章》明确了“王在法下”，以此限制国王对权力的滥用。

03

《马的故事：它是怎样改变了人类的历史》

(美)《考古学》2015年07/08月

5000万年前，在北美洲的森林里，一只不足两英尺高的食草动物正在怯生生地寻找着树叶和果子。这个小家伙现在被称为始祖马或“早期马”。在150万年前，它的祖先进化成了我们今天所认识的马。约90万年前，马从北美草原抵达了东半球，在那里，他们完成了与人类的第一次接触。从此，人类与马之间的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关联，在世界各地的考古记录中被屡屡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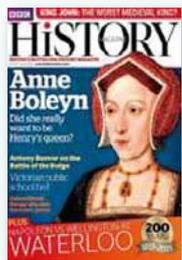
01.



02.



03.



04.

02

《滑铁卢战役》

(美)《史密森学会会刊》2015年6月

惠灵顿后来曾称，滑铁卢战役是一生中所经历的最激烈的战斗。最初，法国军队人数远超联军方面，炮兵数量更是遥遥领先，而且士气很高。这些法国军人还深信，自己的指挥官拿破仑是自凯撒大帝以来最伟大的军事天才。

滑铁卢战役无疑是灾难性的一战。作战的这一天可以称得上是拿破仑从事战争和指挥军队23年以来最惨痛的一天，约有25000到31000名法国军人死伤，更多的法军士兵被俘。而另一方的联军也死伤惨重。

200年后的今天，走在当年滑铁卢战役的战场上，似乎很容易理解拿破仑当年为什么输掉了这场战役：位于英军防线中的这座140英尺高的铁狮山，确实是进行埋伏的绝佳地点。当年英国、普鲁士联军就是从铁狮山东面的森林中杀出，猛击法军的右翼，并最终导致了法军的溃败。

04

《亨利八世和安妮·博林：改变了英国历史的王与后》

(英)《BBC历史》2015年6月

亨利八世和安妮·博林之间的恋情一直是英格兰历史上一桩充满着浪漫色彩和诸多谜团的话题。

人们曾经都以为亨利八世抛弃了西班牙公主、来自阿拉贡的凯瑟琳，是因为亨利八世对凯瑟琳的侍女安妮·博林一见钟情。然而，一本名为《另一个博林家女孩》的历史小说却引起了人们对于亨利八世与安妮相识过程的质疑和考据。有学者提出，安妮的姐姐玛丽·博林曾是亨利八世的情妇，而安妮则是从法国留学归来之后才进入英国宫廷，并得到了亨利八世的狂热追求。

安妮·博林和亨利八世的婚姻，永远地改变了英国的历史。1536年5月19日，安妮迎来了她悲惨的结局：以通奸罪被斩首。各种推测与争论由此开始。

慧眼因流变的大背景而生

——追随文史大家看历史

文 | 方北辰

面 前这本刊物的名字很有趣，叫做《看历史》。看历史，用什么看？肯定是眼睛。要想透过表象看到历史真相，用什么看？应当是慧眼。怎样才有一双慧眼？这个表面看来似乎并不复杂的问题，我直到1978年拜在四川大学历史系缪钺先生门下，攻读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生之后，才算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

我们这一批研究生是国家恢复招收研究生制度的第一届，所以学历不问出身，彼此大不相同：有的是大学本科，有的是中学肄业；而我则是大幅度转身的工科学历。当时文史两系的研究生，彼此自我调侃，说是“三教九流”。

恩师缪钺先生是享誉海内外的文史大家，也是能因材施教的著名教育家。他针对我们专业基础参差不齐的实际情况，着重在基本功培养方面定下了三项基本原则，即“古今结合，文史结合，史论结合”。他又在不同的专业课程中结合实际例证，不断对此进行讲解和深化，以求达到“授人以渔”而非“授人以鱼”的最佳效果。

其中的“古今结合”是恩师从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名言继承和深化而来。他强调，从事历史研究必定要面对种种具体问题，要想把问题看得比较深入和全面，尽量接近历史真相，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先要找到与问题密切相关的古今流变大背景，然后把问题放到大背景下去观察；绝对不能急于下结论，孤立性地就事论事。为何要这样？因为任何具体问题都有前因后果，绝非凭空出现；而每一具体问题的前因后果又很可能会与它之前和之后的问题发生关系，从而构成一种古今流变的大背景。一旦你把问题放在与之准确适应的大背景中去观察，就好



从事历史研究必定要面对种种具体问题，要想把问题看得比较深入和全面，尽量接近历史真相，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先要找到与问题密切相关的古今流变大背景，然后把问题放到大背景下去观察。



比长出一双慧眼，它的骨架脉络就能比较清晰地看出来。

由于家庭有文史渊源，所以我对文史的热爱起始很早。中学阶段，基本的文史典籍我已经无须借助注释而能大体理解。1962年我考入西安交通大学的电机系，专业是电机与电器制造工程。从那时起，直到后来毕业工作之后，依然不能忘情于文史，有计划地看了不少经典。能不能在适当时候把专业与爱好结合起来，可以说是我那时的梦想。这段岁月中，虽然看了不少文史经典，然而那时“看历史”的眼睛，其实完全属于业余级别的“肉眼”，而且还轻狂地以为我这双“肉眼”，真的把历史看出了诸多名堂。

直到忝列廖老的门墙，聆听了恩师如同醍醐灌顶一般的指引之后，我才知道天外还有天，“看历史”还有慧眼这般精妙的境界。心悦诚服之下，好好跟随名副其实的文史大家，从头学习怎么从新的视角看历史。

慧眼不是一天炼成的，但是只要铭记在心，不断努力实践，就会尝到甜头。我首次感觉出了一点效果，是入学一年多以后，在对唐代女性审美问题的思考上。

十多年前在西安读大学，唐代壁画、唐三彩塑像，那是看得不少。而其中的女性形象，几乎都属于脸庞圆润、体态丰满的健美型，与林黛玉式的弱不禁风大相径庭。为何会如此？当初的“肉眼”，就根本没看出门道。现今好了，按恩师的教导来试试吧。与这一问题密切相关的大背景，应当是能够左右社会审美风气的上流阶层。上流阶层又发生了什么古今不同的流变呢？隋唐王朝与此前的汉晋王朝相比，最大的流变莫过于浓厚鲜卑民族成分的加入，即后世学者所说的“鲜卑化”。

鲜卑是北方古老民族，原居现今黑龙江省大兴安岭。汉代匈奴衰落，鲜卑向西发展，占领蒙古草原的匈奴故地，势力逐渐强大。从曹魏开始，形成全面往内地方向推进的态势。西晋灭亡，鲜卑族在北面建立北魏王朝，后来演变为东魏和北齐，西魏和北周。此后建立起来的隋唐王朝，在上层人物中，鲜卑贵族以及鲜卑化程度很深的汉人贵族占有很大比例，与汉晋王朝几乎是清一色汉族人的情况迥然不同。比如顶层的皇族，就是北朝鲜卑化汉人贵族杨忠、李虎的后代。杨忠是隋文帝杨坚的父亲，北周政权开国元勋之一，被赐以“普六茹”的鲜卑姓氏。而杨坚又娶北周鲜卑贵族大臣独孤信的七女儿，生下隋炀帝杨广。独孤信的四女儿则是唐高祖李渊的生母。李渊的皇后窦氏，也出自北周鲜卑贵族。窦皇后所生的唐太宗李世民，其皇后长孙氏，出自北魏皇室拓跋氏的显赫一支。隋唐两朝，至少有6位皇后出自鲜卑族。位高权重的大臣宰相，出自鲜卑族或者鲜卑化程度很深的汉族者，据学者统计竟有26位之多。



方北辰 +

方北辰，历史学家，知名学者，精于三国历史文化的研究和应用。成都武侯祠博物馆所举办的《武侯夜话》主讲人。2014年12月，在《百家讲坛》主讲三国名将。

鲜卑是北方的草原民族，为了抗御严寒和风雨，适应常年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无论女性和男性都必须具备强壮的体魄、刚健的精神。而女性还要肩负繁衍后代和照顾家庭的重担，在体魄和精神两方面更是必须如此。而以肉食和乳品为主的饮食结构又在营养上提供了充足的保证。于是，女性以丰满健硕为佳的审美观念就自然而然从现实生活中产生。随着上流阶层的浓厚鲜卑化，这样的审美观念也成为新的时尚，大量杨贵妃式的女性新形象就这样出现在历史的大舞台上。

对于女性审美的这种剧烈变化，成语中有“燕瘦环肥”的生动表达。史书说汉成帝宠爱的皇后赵飞燕身体瘦削轻盈，能够在手掌上跳舞，故有“飞燕”的美名。与此类似，南朝梁代大臣羊侃宠爱的舞女张净琬，腰围仅仅只有一尺六寸，当时认为也能跳掌上之舞。但是《旧唐书》中所形容的杨贵妃，却是“资质丰艳”，即丰满而艳丽。这样的审美观，甚至还影响到骏马的欣赏。唐代的骏马，不论是图画中或雕刻中所见到的，也是身躯壮硕而四肢细长。

对于这种“看历史”的初步试验和心得向恩师作了汇报之后，廖老没有明确表态，只是要我好好去看陈寅恪先生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看才明白，陈先生1940年完成的这部名作，早已经在类似的流变大背景中去观察隋唐的礼仪、职官、刑律、音乐、兵制、财政等具体问题了。陈先生当然具有一双“看历史”的顶尖级慧眼，所以廖老是用这一指示，传达出“孺子可教也”的无言肯定，也是要我从陈先生的著作中，进一步学习这种方法的灵活运用。

于是，我又触类旁通，在这样的流变大背景中，去观察隋唐女性地位的提高，两性关系的开放以及女性介入政治等等具体问题，都有比从前“肉眼”观察更为深刻的认识。

回顾此生，在治学上的最大幸运是能够在文史大家廖老指导下，先后获得硕士、博士学位，并于1981年初留四川大学从事教研工作，在廖老身边继续接受言传身教，看历史、讲历史、写历史，直到1995年先生仙逝。恩师在“看历史”方面的真知灼见尚多，此处仅举一端，略表缅怀之意而已。^①

中国历史上的“川军”

文 | 章夫



中国艰难的8年抗战史上，川军作为一个特别的“另类”，扮演着十分有趣而重要的角色。在整个战史上看似无关轻重，但恰恰是几场重要的战役，在中国抗战的历史长河中，又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人们对这支有血

抗日战争，大后方人民把自己的子弟送上抗日前线，一批川军乘船离开重庆。
图/FOTOF

有肉的部队又爱又恨，多了几分了解。

近年来，抗日题材的影视剧此起彼伏，成为屏幕上的重要内容。而引人注目的川军抗日素材，也频频搬上荧屏形成热播，比如《抓壮丁》《壮士出川》《正者无敌》《川军团血战到底》《雾都》

成都少城公园搭起的临时高台上，川军统率刘湘的誓言透过麦克风飘荡向天空：“若敌寇一日不除，我川军绝不还乡。”

《壮丁也是兵》等。这些影视剧亦庄亦谐，从不同侧面把300万川军的精气神，刻画得入木三分。

就这样，更多的普通人知道了“川军”这一特殊的群体。然而，从本质上说，川军不同于湘军、桂军或东北军……自唐宋以来，以川军命名的部队多矣，他们是一支支颇具江湖气息而又兼具中华民族特质“很男人的”部队。

“川军”只不过是体现“这方男人”身上一个特殊的符号而已。

❖ 美国人眼中的川军形象

1937年立秋刚过，成都少城公园热闹非凡，一场从未有过的誓师大会在此举行，悲壮而森严。“战死沙场为父以你为荣。”一面白底黑字硕大的“死”字旗下，一位父亲对儿子如是泪别。

成都这座以休闲著称的文化名城，在风中高扬的白色死字旗透出前所未有的凄凉。“死”字左右两旁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字。右边写的是：“我不愿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份上尽忠。”左边写的是：“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分。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

少城公园搭起的临时高台上，川军统率刘湘的誓言透过麦克风飘荡向天空：“若敌寇一日不除，我川军绝不还乡。”

然而，打仗拼的不仅仅是豪言壮语，是要靠手上“家伙”说话的。家乡父老面前和豪言壮语驱赶下，这支浩浩荡荡的川军从安逸的大后方开赴抗日前线。

下面这段文字，是当年一位美军观察员描述的他眼中的川军模样——

他们沿着马路通过郊区成群结队毫无秩序，有的穿着军服带着军帽，其余的服装则随心所欲任意穿戴，每个人都带着旧式雨伞以及脸盆、茶壶、

电筒、毛巾、蔬菜和备用草鞋，这些东西或者挂在肩膀上，或者用绳子拴在身上，许多扛枪的人都把用布包裹着私人财物吊在枪杆上。像这样吹打打的喜剧般的中国军队，只有在传奇故事中才有……

这位观察员事后对他的同僚说，那种景象真是有趣极了。

这些战争细节透露出当时川军两个重要信息：一是“装备之差”；二是“军纪之散”。

国军眼里，川军无疑是一支没有任何战斗力的杂牌军。有“双枪将”之称的川军，除了那些长短不齐口径不一的各式土枪，很多士兵还多了一支大烟枪。

国人眼里，这是一支傻里巴叽的部队。时值北方未秋，当中央军和晋绥军坐着卡车从山西前线一路后撤时，这支脚着草鞋身穿单衣的“叫花子”部队，沿川陕公路步行1500公里，逆着溃潮之师奔赴战争前线。

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民族命悬一线之间，这支被人嘲笑的军队，被推向了抗日救国的历史舞台。

没妈的孩子像根草。一旦离开四川这个安乐窝，川军就成了没妈的孩子——没有补给，没有兵营，没有粮草，严重缺乏枪支弹药。

山西地盘上，看着这支“叫花子部队”，晋绥军统率阎锡山怒电蒋介石，要求驱除川军，蒋介石也说“让他们回四川称王称霸”。天下之大竟无川军容身之地。就在此时，面临日军巨大压力，正组织徐州会战的李宗仁得知有支部队可调时，大喜。本以为报国无望的川军将士，发誓用敌人的血来报李将军的知遇之恩。由是，川军到达了第五战区，随即参加了震惊中外的徐州会战。

1938年初，日军攻占上海、南京后，一路沿津浦线北上，从沧州南下，企图南北夹击占领徐州进而威胁武汉，迫使中国政府投降。

滕县是南下徐州的战略门户，日军要占领徐州，首先要攻克滕县。战争双方最高指挥官心里都清楚，谁拿下了滕县，谁就掌握战争主动权。可当时组织徐州会战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正在台儿庄集结重兵，守卫滕县之重任就意外地落在了王铭章和他的“草鞋军”身上。

当时进犯滕县的日军共三个师团，总兵力约3万余人，配有山炮、重炮、战车等重武器，并有作战飞机四五十架，由第10师团长矶谷廉介统一指挥。而守卫滕县的川军因此前山西作战伤亡过半，整编后实际不过2万多人，装备多为四川土造的七九步枪、手榴弹及少量川造轻重机枪和迫击炮，没有任何重武器。至于通信，旅以上才配有无线电，更谈不上交通、补给、卫生等装备。

滕县血战就在敌我力量极其悬殊的情况下拉开了帷幕。1938年3月14日，身处战争前沿的122师师长、第41军前敌总指挥王铭章得到的最高命令是“死守滕县，等待援军”。激战三天三夜，孤立无援下滕县完全陷入日军四面楚歌之中。“城存与存，城亡与亡。”第4日午后，见援军无望，王铭章发出“决心死拼，以报国家”电报后，发起最后冲击，壮烈殉国。

死守4天半，川军总计伤亡一万余人，日军伤亡两千余人。王铭章成为包括整个“台儿庄会战”中，中国方面牺牲的最高指挥官。

日军随军记者佳腾芳子在新闻稿中这样写到——

1938年3月初，我军攻占济南后，组织濂谷混成支队以步兵两连队配合相当数量的炮兵、坦克、飞机继续南进，在泰安、兖州等处均未遇到抵抗，但到滕县后遇到41军之122师顽强抵抗3天，我军遭受很大损伤。

徐州会战结束后，李宗仁不无感伤：“若无滕县之苦守，焉有台儿庄大捷？台儿庄之战果，实滕县先烈所造成也！”

这支在美国人眼里有趣的“草鞋军”，用自

己的血肉之躯，完成了生命最后的凤凰涅槃。

这，仅仅是川军在整个抗日战场上，留下的悲壮案例之一。

❖ 中国历史上的“川军”

偏安一隅的四川自古来自得其乐，创造了



近代中国历史上最让世人侧目的，是川军利用成都的保路运动叩响了武昌城的枪声，直接导致了辛亥革命的提前爆发。辛亥革命中，各省纷纷独立，当时四川先有革命党人在重庆成立大汉军政府，接着又有人在成都成立蜀军政府。



辉煌的古蜀文明和富裕的天府之国。

或许正因为此，古蜀被秦所灭成为“天下粮仓”以后，那条“不通人烟”的古蜀道便蜀门洞开——文明与野蛮相继进来，天府之国便在历朝历代中遭受种种渊藪。

四川历史上五次大移民，莫不与战争相关。清以来的“湖广填四川”，多半是四川这片广袤

土地上兵戎相见之后形成的悲惨局面。四川军事移民记载非常多，如眉山县思蒙乡张营店。“湖广填四川时以军营形式组织迁来，张姓定居处即名张营，店开在张营境内，故名。”这种地名在四川十分普遍，如周洵《蜀海丛谈》满营“驻防成都旗兵，始于康熙五十七年……划少城专驻旗兵，后遂称曰满城。”这是军队移民在成都形成的典型地名。

今天的成都甚少“土著人”，三代以上的成都人几乎都是移民。一个甚为生动的写照，便是清人撰写的《竹枝词》里所记载的：“大姨嫁陕二姨苏，大嫂江西二嫂湖。戚友初逢问原籍，现无十世老成都。”

关于四川的来历，缘于北宋咸平四年（公元1001年）宋真宗为四川下的一道诏书。诏书云：“分川峡转运使为益、梓、利、夔四路。”认真细看，这是一项调整行政区划的决定。川西版图行政名称渐变为：秦时置为巴郡、蜀郡，汉代称益州，唐代改为剑南道，其后为剑南西川道和剑南东川道，分别在成都和三台设治所。简称东西两川，后又设山南西道，便有了“三川”。宋真宗改“三川”为“四川”：益（成都）、梓（三台）、利（汉中）、夔（奉节）。这一行政区域被称为“川峡四路”，简称“四川”，四川由此得名。

秦并天下，汉定关中，隋平江南，无不依靠四川人的鼎力支持以成大业。“是故从来有取天下之略者，莫不切切于用蜀。”可以说，四川这块“风水宝地”被历代封建王朝视为“王业之基”。

川军的最大特点是“内战外行，外战内行”。历史上几乎所有内战中，四川基本就是一个割据政权，“中原大军”一到就土崩瓦解。但在抵御外敌上，毫不含糊，非常有血性。最为惨烈也最为惊心动魄的，要数“川军”抵抗蒙元入侵。

淳祐二年（1242）六月，宋理宗朱批余玠为四川宣谕、制置使兼重庆知府（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长兼四川省长）。余玠的战略眼光十分独到，整个四川版图都密布着大大小小的城堡，这些堡垒有一个共同特点，特险凭夷，控扼要冲，交通

较便，利于攻守；水源不竭，粮秣有继；就地取材，修筑较便。余玠在四川与蒙军三十六战，把蒙军打得龟缩在几个据点里不敢出来，大量的良田在南宋的掌管之中整整51年。憾余玠后被奸臣所害，“川军”在钓鱼城击毙蒙古大汗蒙哥，直到南宋灭亡，还在拼死抵抗。

今天我们常挂在嘴边的川军起源于清末民初。清末帝宣统二年废绿营，在全国建陆军三十六镇（相当于后来的陆军师），四川因省大人多兼控康藏地区，因而成立了十六、十七、十八镇。并成立武备学堂、陆军小学、官军学堂、陆军速成学堂、陆军讲武堂等来培养各级军官，这些学堂毕业的学生，后来成为川军中的骨干，优秀者还曾被派遣出国深造。

近代中国历史上最让世人侧目的，是川军利用成都的保路运动叩响了武昌城的枪声，直接导致了辛亥革命的提前爆发。辛亥革命中，各省纷纷独立，当时四川先有革命党人在重庆成立大汉军政府，接着又有人在成都成立蜀军政府。

历史并没有向前推进，军人当政的恶果，产生了一批各自为政的四川军阀。“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的古训，从一定程度上阐释了四川特有的地形和人文。义气二字重千斤，人人皆称兄道弟，以“桃园聚义”“瓦岗威风”“梁山好汉”为榜样，提倡侠义与互助共济。这个时候“川军”的军魂主要靠“袍哥文化”来维系。由于盆地意识浓，川军很擅长“窝里斗”，彼此互不团结。这也为当年红军立足于四川，建立根据地提供了有利条件。

有一种奇怪的现象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四川远离抗战前沿，但四川人对抗日的热情却胜过不少战争前线。其实要真正了解四川及四川人，须研究四川人骨子里的DNA，首先得从四川人的结构说起。历史上五次大移民使“四川人”流淌着五湖四海的血，每一个抗日大小战场上都有他们的老乡和同胞，所以他们特别能拼。

难怪有专家如是结论，天下四川人，以天下为已任。川军在川是条虫，出川则成龙。^①

网络作协的成立和汉乐府制度的演变

文 | 唐博

过去的一个月里，一些省市的网络作家协会纷纷挂牌成立，接下来的一段时间，这个机构或会以一种制度的形势在各地接踵落实。

不难看到，网络作协的成立，自有国家意图在其中，即希望通过网络作家们的网络采集和网络写作，使上层能及时听到真实的民间声音。这不禁让我想起发于秦、兴于汉的乐府诗歌制度。

汉乐府制度的设立，主要有三个目的：一是实行封建教化；二是统治者出于音乐、艺术的享受；三是收集民间情报，使统治者能及时了解民间的真实情况。而后者是设立乐府机构的主要目的。

到了汉武帝统治时期，为了防止自己与世隔绝，只听到朝中一派的谀辞，汉武帝听取了儒生董仲舒的建议，扩大了乐府机构，并加强了对民间信息的采集，开通了一条旨在洞察民间冷暖的文路，这就是乐府诗在汉朝鼎盛的主要历史原因。

国家意志驱使大量的文人下乡“采风”，一些反映民间生活疾苦的诗，通过民间采风的形式，经由制度进入到皇帝的耳目，并成为王朝施政用令的参考。这个时期，《十五从军征》《战城南》《病妇行》等诗歌，都是具体而深入反映社会下层民众日常生活艰难与痛苦的好作品，对于统治者反思战乱进而制定与民休息的政策有积极的作用。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西汉 211 年的安治，乐府制度的确立和完善有一定的功劳，而类似于今天网络作协的采诗机构，在汉朝官僚体系中不断受到重视，也自然和其发挥的巨大作用相关。

汉绥和二年，汉哀帝下诏撤销乐府。在诏书中，汉哀帝这样说：“郑声淫而乱乐，圣王所放，其罢乐府”，这个旨在收集民间情报的机构只存在了 106 年。之后，西汉王朝走向衰落，而“采风”这个词却得以传承下来。

“采风”虽然传了下来，但是作为一种制度在王朝中的实

施，唐宋至元几百年间都非常有限。所以，大名鼎鼎的隋朝“私人教育家”王通就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诸侯不贡诗，天子不采风，乐官不达雅，国史不明变，呜呼，斯则久矣，《诗》可以不续乎！”

到了明朝后期，民间出现了一阵采风高潮，冯梦龙、李开先等一批文人看重民间歌谣、故事的质朴与真实，着手搜集民间歌谣、笑话等，编辑刊印了《挂枝儿》《山歌》《笑府》等民歌集、笑话集，但并没有得到统治者的重视和制度化展开。

清雍正四年开始，在浙江、福建、广东、湖南等地设立了“观风整俗使”，其意在巡察地方、劝谕化导风俗，使“采风”遥接西汉，有了一些国家意志的意味。但这个“观风整俗使”的实际运行，因充满了强烈的特务性质，让文人不自觉地与“文字狱”发生联系，因此，其调动民间写作的力量非常有限。雍正以后，清王朝不再设置“观风整俗使”。

直到 1918 年，这样的“采风”在文人的自觉发起下，才有了新的接续。在时任北大校长蔡元培的支持下，刘半农、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周作人等教授发起了歌谣征集活动，设立歌谣征集处，向全国征集近世歌谣。“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这样的“采风”已经扩展到一切民间的创作和风俗。

从汉乐府制的确立到近代的文人自觉，梳理这段漫长的“采风史”不难发现，民间社会对国家政治的影响，文人在其中发挥了巨大的桥梁作用。细观今天的网络世界，恰是生动鲜活的民间社会投影，网络作协的设立，自然因应了国家对听取真实的民间声音的制度化需求。

因此，从桥梁作用来看，我们期待那些得以首批进入网络作协的作家们，既要正确理解网络作协设立的目的，又要看到自身承载的使命，认真学学西汉的乐府诗官们，少一些网络推断，多一些田野调查，尽可能采一些原汁原味的声音，并为这个时代说几句真话、写几篇务实的文章。①



史叔下午茶
看历史
EYE ON HISTORY

话题： 乾隆在扬州的“朋友圈”

📌 /读杂志/ 乾隆三十七年，扬州人口达50万，居世界第六；扬州盐商提供的盐税占全国盐课60%。康熙和乾隆，对以扬州为中心的江南别有用情，这种盐商、文人和官方的互动，使江南成为超越地理的文化存在。

史叔：《乾隆在扬州的“朋友圈”》这条微博引发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35万的阅读量也证明了大家对于清朝历史的高关注度。网友热情澎湃的评论，也是让史叔无言以对，被大家“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本事而深深打败！



📌 清风半夜鸣蝉 17：古扬州经济发达全靠大运河的拉动。“扬一益二”，说的就是隋唐时期扬州的经济繁荣是全国数一数二的。如今大运河的交通优势已不明显了，扬州的经济实力也不行了，在江苏落后于苏州、无锡、常州等城市。

at_cal：乾隆其实是清朝大“败家子”，好浮夸虚名，统治后期几乎掏空了清朝的家底，而且还喜欢“到处题字”！

张鸣：在我看来，经营百姓必需品的盐商兴盛，本是商业萎缩的象征。只有清代这样保守的朝代，乾隆这样专制的皇帝，才有扬州盐商的奇迹。

旁观者丁以德：乾嘉时期文字狱盛行，借编纂类书毁掉民间藏书。学者为躲避迫害，埋首故纸堆，进行文字考据、文献整理。这一时期可是文化的幽暗期，怎么就成了盐商促进和推动了学术文化发展？

沈园仍在：从汉武帝的盐铁专营实行以后，在古代，盐就是朝廷垄断专卖，古代贩卖私盐是重罪，像程咬金、黄巢这些彪悍的人物才敢干。

Zorig：扬州这个城市虽然在苏北，却像苏南城市一样充满活力，反观一江之隔的镇江，百业萧瑟，更像苏北。

换热 GM：盐商之首黄均太吃碗蛋炒饭都耗银50两，米粒完整粒粒分开，泡透蛋汁外金内白。蛋是吃了人参、苍术的鸡下的。配饭的百鱼汤有鲫鱼、舌鲢鱼、脑鲤鱼、白斑鱼、肝黄鱼、鳔鲞鱼、翅鲞鱼、裙鲞鱼、血乌鱼等，奢靡之极。





评论最火微信
(2015年6月)



最火微信榜
(2015年6月)

武则天到底长啥样？

推送时间：2015-06-09

阅读人数：553037

史叔：据说太平公主最像武则天，史书对太平公主的相貌是这样描述的：“公主丰硕，方额广颐”。公主体态丰腴，脸蛋饱满，额头也比较宽，那么武则天大概也差不多。这是唐朝的审美标准，如果让武则天穿越到现在，恐怕要被归入“微胖界”，跟美女是不沾边的。



清风油：

年轻时应该绝对美貌，不然能混成那样？虽然她很有智慧，但在男权社会里，美貌是女人最大的资本，只有大脑没有脸蛋，是不可能成就她后来的一切的。

夏了夏天：

以前的人因为营养不良，所以大部分都瘦，他们眼中的胖子可能和现在我们说的微胖差不多。据记载，杨贵妃也只有120斤左右！

唐小维尼：

武则天的扮演者中，最灵动的是潘迎紫，最典雅的是归亚蕾，最传神的是刘晓庆。其他忽略不计！

竹风萧影：

从名字推定，柔中含武，天下第一，典型的女汉子。

no.1

明朝灭亡时的囧事

推送时间：2015-06-14

阅读人数：163447

史叔推荐：你知道崇祯皇帝其实是个急性子吗？大明最佳影帝又是谁？崇祯皇帝在位时杀掉的最后一个人是谁？弘光帝到底昏庸不昏庸？南明臣子马士英坚持作战、宁死不降清，为何被视为奸臣？明朝灭亡时，囧事一箩筐。

no.2

十厘米之上的风景：高跟鞋的前世今生

推送时间：2015-06-16

阅读人数：118355

史叔推荐：不要以为女人对高跟鞋的爱是从青春才开始，这爱早就渗入女性基因中。如果能在10秒钟里变得高挑和妖娆，有几个女人会放弃这样的机会？你以为15公分就算高跟了，差得远呢。

no.3

中国古代的避孕

推送时间：2015-06-06

阅读人数：82109

史叔推荐：避孕原理现在可谓通俗易懂：不让小蝌蚪找到安身之处即可。所有避孕方法都是阻止精子和卵子相遇，不给机会使卵子受精。古代中国人却没有这么明晰的观念，各种稀奇古怪的避孕方法让人啼笑皆非。

no.4

朝鲜是如何打开国门的

推送时间：2015-06-18

阅读人数：60488

史叔推荐：19世纪的朝鲜半岛先后抵住了法国、美国的霸王硬上弓，却在19世纪末期被日本撬开了国门，此后西方国家相继取得贸易特权。朝鲜的国门就是这样被打开的。

* 阅读人数为微信推送一周内的点击量。如您感兴趣，请关注《看历史》微信公众号 EYEONHISTORY 查阅。



微社区：故乡的气候，那叫一个酸爽

话题 1201 访问 25538



精华



名人堂



相册



分类



更多



主持人 / 曹

/话题/

老家在中国东北，虽不是最北边，但却有北方气候的显著特征，春秋凉爽干燥且短暂；夏天热起来喘气都能浑身是汗，赶上漫长的雨季，好吧，潮气的不得了；冬天的冷不是一般人能够受得了的，虽说近几年暖冬来袭，可还是很冷。总之就是夏天想过冬天，冬天想过夏天，不敢奢求春天秋天，因为实在是太短暂。

故乡的冬天，雪是主角，一入冬就开始下雪，纷纷扬扬，夹杂着细雨落下，地面被北风一吹迅速结上一层冰，让人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如履薄冰”。正月里的雪往往会大过腊月天，好像在做谢幕演出。最近几年是暖冬，气候越来越不正常，所以大家一定要保护环境，保持生态平衡，从我做起！

北方的夏天虽不比南方的烦躁炎热，却也让人难以忍耐，三伏天的室外风都是烫人的，温度三十七度都算是凉爽了。夏天睡觉很痛苦，翻来覆去热得无法入睡，等到半夜三更迷迷糊糊睡着，早上醒来浑身乏力，褥子也是湿了一片。而且这样的日子会持续好长一段时间。

东北的春天向来都是短暂的，而且让人无法判断到底春天是什么时候来的，又是什么时候走的。因为大多时候今天还是北风凛冽的寒冬温度，明天却变成了炽热炎炎的夏日午后；刚刚感觉到春风拂面，转眼间又是满嘴沙尘，满眼土黄，只有山坡上的桃花开的正艳，告诉人们春天已经过来了。



网友评论

蝉：
我的故乡也在东北！完全感同身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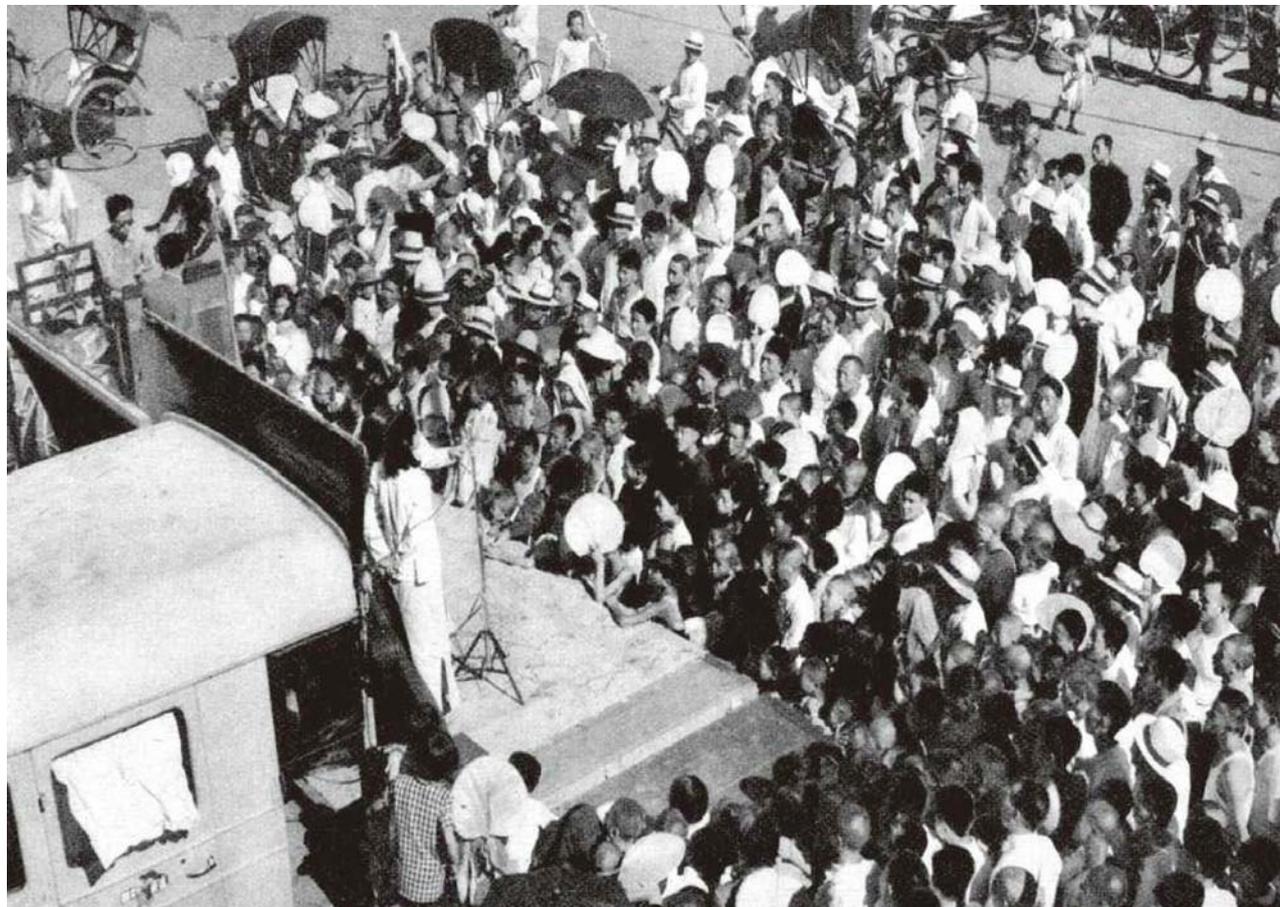
李子：
东北有暖气，冬天比南方暖和多了，屋子里可以穿短袖；南方冬天阴冷，又没有暖气，那才叫冷得酸爽。

辰辰星：
从来没去过东北，最远只到过江苏……

桃夭：
我的家乡在重庆，夏天就是个大蒸笼，车上都可以煎鸡蛋，欢迎大家来蒸桑拿！

明天不远：
住在成都，春天很舒服，只是嗖一下，就过去了。能不能让春天多飞一哈儿？





028

沦陷区， 一个更复杂的存在

封面故事
Cover
Story

二战时，日军曾占领中国大片领土。二战前在东北扶植伪满洲国，二战时又扶植汪精卫的“国民政府”，想在沦陷区推行殖民统治，为其全面侵华战争服务。

而对沦陷区和汉奸，中国人往往会有很多思考，而在抗战胜利70年之后，一些人也产生了某种误解：

其一，认为日本在沦陷区实行了一些“改革”和“建设”，对中国的现代化有促进作用。

其二，认为沦陷区就是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彻底沦陷。

真相究竟如何？长期以来，我们对沦陷区的关注，很多时候只停留在敌后武工队的抗日上，但是，沦陷区是一个更复杂的存在。

微历史 Microfilm History

- 001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
- 002 张伯行：康熙朝第一清官
- 003 新闻
- 004 慧眼因流变的大背景而生
——追随文史大家看历史
- 006 中国历史上的“川军”
- 010 网络作协的成立和汉乐府制度的演变
- 012 微言

昨天的你我 ——法国摄影师镜头下的 中国改革开放

看阎雷的照片就像在看一幅完整的关于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变迁的风俗画。这种拍摄的力度和完整性在中国摄影家中也非常少见，或者说几乎没有。



026 叶公好龙

热历史 Hot Histo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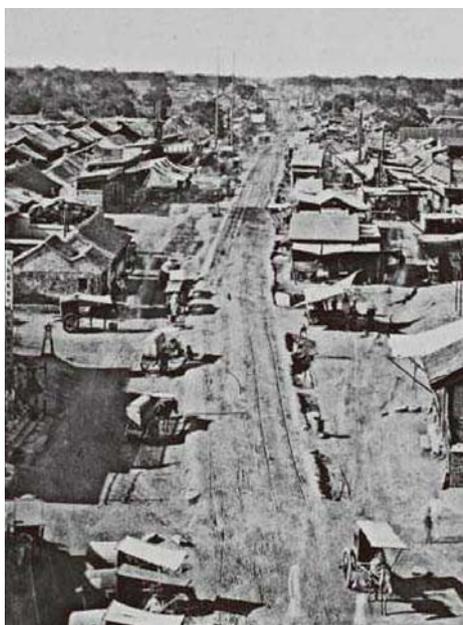
中国股市30年

相比于西方许多国家，中国的股市发展时间并不长，仅有 30 年的历史。无论是中国的公司、市场或是股民都还需要时间成长，强大的股市只有慢慢生长，方才成熟。

- 袍哥江湖 064
- 黄永玉谈表叔沈从文：
一生从容 072
- 史景迁：
不妨在古代小说中寻找“同盟” 074
- 两万册国宝藏书
租界逃美记 076
- 抗生素发现史 080

一个瑞士人眼中的 晚清帝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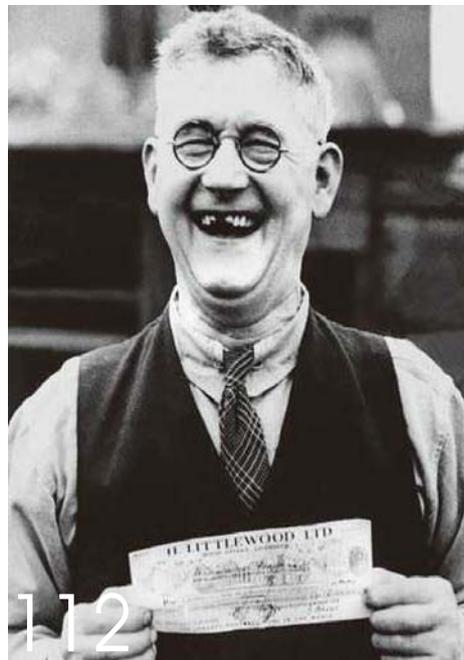
瑞士人克莱尔收藏了不少晚清时期的中国影像，并留下了大量关于中国的游记。这些影像与文字资料，为今天的人们生动地勾勒出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风貌。



086

- 090 建文帝生死之谜
- 094 蓝鲸行动：
美刺杀蒋介石秘闻
- 096 费孝通：
中华文化诊疗的践行者
- 102 上海江湾机场：60年风云沧桑
- 106 潜龙飞天
——潜水航母的传奇

厚历史 Thick History



英国足球趣史

12世纪初，英国开始有了带有娱乐性质的足球比赛，但没有专门的比赛场地，就在城市中的闹市区进行。如果球中途窜入居民屋里，运动员也就一窝蜂地冲进去乱打乱踢，常常把屋里的东西砸得稀巴烂，房主只好自叹倒霉。

酷历史 Cool History

- 七十二寨侗女绣衣中的密语 120
- 纸牌趣史：
从“叶子戏”到扑克牌 126
- 日本樱花文化中的凄美情结 128
- 百年前的“特区”：
商埠济南 134
- 大唐公主们的“任性”往事 140
- 悦读 142
- 所谓“拼爹” 144

国际标准刊号
ISSN 2095-0853
国内统一刊号
CN51-1732/k
广告经营许可证
5101034000361
邮发代号 62-313

出品人 严光辉

总编辑 苑海辰

采编总监 柯菁

编辑 吴蔚 黄鑫 凌波
蔡丽萍 黄弋

主管主办 成都日报报业集团
出版 看历史杂志编辑部

主笔 刘杨
记者 李叶琪
新媒体运营 毛瑞 孙瑛

运营机构
成都先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美术编辑 闫星 王珏菲
编务 范若青

运营总监 罗荣敏
发行总监 叶翔
发行经理 陈锐

邮局发行
四川省邮政报刊发行局

本刊法律顾问
四川君合律师事务所

本刊声明
本刊所有文字图片的版权，均归本刊所有。未经本刊书面明确许可，不得转载。否则本刊必将追究侵权责任。

印制
四川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图片合作
CFP、东方 IC、人民网、新华社、FOTOE

凡向本刊投稿并采用，均视为作者同意授权本刊通过网络、电子杂志、结集出版等方式使用该作品，如有例外，请书面声明。本刊所付稿酬包括刊物内容及其他使用报酬，不再另付。未署名图片、文字作者请与本刊联系，以奉稿酬。

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红星路二段159号
成都日报报业大厦2203室
电话/传真 028-86621481
邮编 610017

杜绝虚假报道
举报电话：028-86625451

看历史

Eye On History



欢迎联系我们

主编邮箱：491131688@qq.com 电话：028-86720178
《封面故事》编辑邮箱：1602651769@qq.com
《微历史》《厚历史》编辑邮箱：2010025743@qq.com
《热历史》《酷历史》编辑邮箱：klsbjhy@163.com
新媒体编辑邮箱：27330889@qq.com

投稿邮箱：klstougao@163.com
《看历史》微信公众号：EYEONHISTORY
《看历史》新浪微博：http://weibo.com/guojiailishi
《看历史》腾讯微博：http://t.qq.com/history0799

广告热线
028-86621481 (传真)

发行订阅电话：
028-86763285
028-86624841

在以下城市可以买到《看历史》

成都	尚和书店	028-86667805/18908079206
重庆	尚和书店	023-86359611/13883585088
昆明	尚和书店	0871-64122816/13808715581
贵阳	尚和书店	0851-5661974/13078514533
遵义	尚和书店	0852-8715679/13984201585
西安	尚和书店	029-82100992/15902924011
太原	尚和书店	0351-5625806/13934583130
南宁	尚和书店	0771-2624534/13617715181
桂林	尚和书店	0773-2834966/13217732489
南昌	尚和书店	0791-88592700/13576955788
柳州	尚和书店	0772-2176764/13132720066
长沙	尚和书店	0731-2810105/15074927150

武汉	春秋书店	027-85493562
哈尔滨	翔宇书店	0451-88341807
沈阳	小门书报刊发行有限公司	024-62500517
石家庄	兵行天下书店	13633313388
济南	联合书社	0531-82052662
郑州	大河期刊	0371-67647276
苏州	和缘书店	0512-65188163
南京	星与火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25-83327129
兰州	兰州大漠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0931-8521092

乌鲁木齐	新疆大漠天马书店	0991-5837665
广州	卓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20-32723429
深圳	新宏博发展有限公司	0755-22203426
温州	华鸿有限公司	0577-81707629
杭州	华鸿有限公司	0571-88256120
北京	北京市报刊零售公司	010-83158388
大连	天天期刊	0411-8522978
天津	新兴书店	022-27694099



《看历史》微信公众账号



《看历史》淘宝店



《看历史》腾讯微博



《看历史》新浪微博





微历史

Microfilm History

影像纪年

昨天的你我

——法国摄影师镜头下的中国改革开放

微历史版块编辑：蔡丽萍
邮箱：2010025743@qq.com

法国摄影师阎雷生于1962年，他在16岁那年开始了自己的摄影生涯，18岁成为职业摄影师。1985年，阎雷以自由摄影师的身份首次来到中国，30年间足迹踏遍中国的每一个角落，记录了中国城乡的各行各业、男女老少、衣食住行。策展人那日松如此评价阎雷的照片：“看阎雷的照片就像在看一幅完整的关于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变迁的风俗画。这种拍摄的力度和完整性在中国摄影家中也非常少见，或者说几乎没有。”

阎雷不是一个新闻摄影记者，也从不自称是艺术家，他只拍他认为很美的“故事”。他把镜头对准了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朴实无华，又不失生动有趣，展现了那个年代人们的精神面貌和生活态度。这都体现了阎雷的摄影理念：避免自己的作品流于平庸的新闻摄影或某种特定的风格，而是遵从自己的所见和所感。通过这位法国摄影师的照片，我们能感受到历史的丰富与复杂，人生的坎坷与趣味。

（图片选自《昨天的中国》，由后浪出版公司授权）



1988年，山西大同，买火车票的民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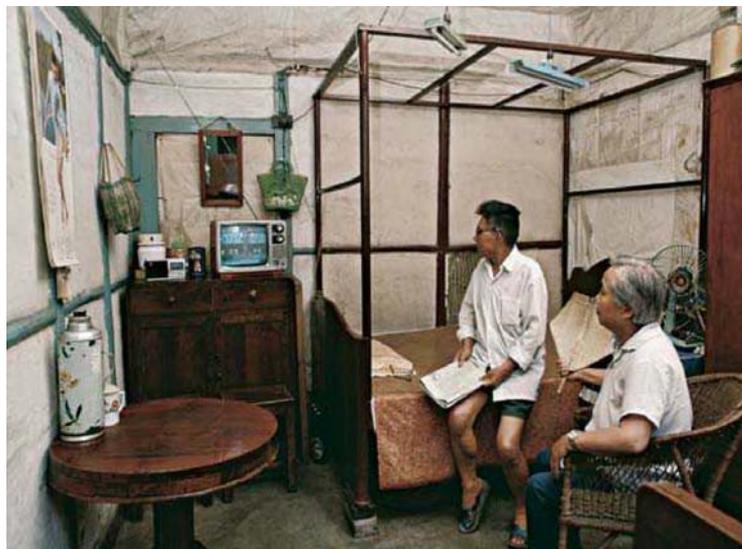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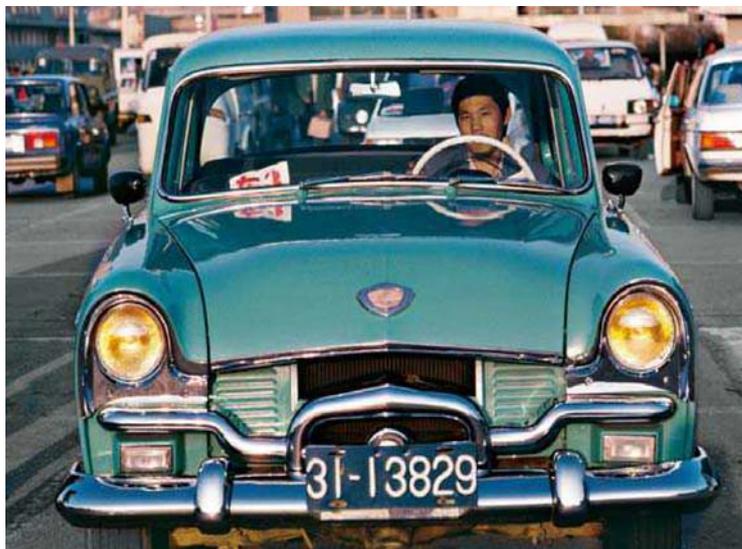
01	02
	03
	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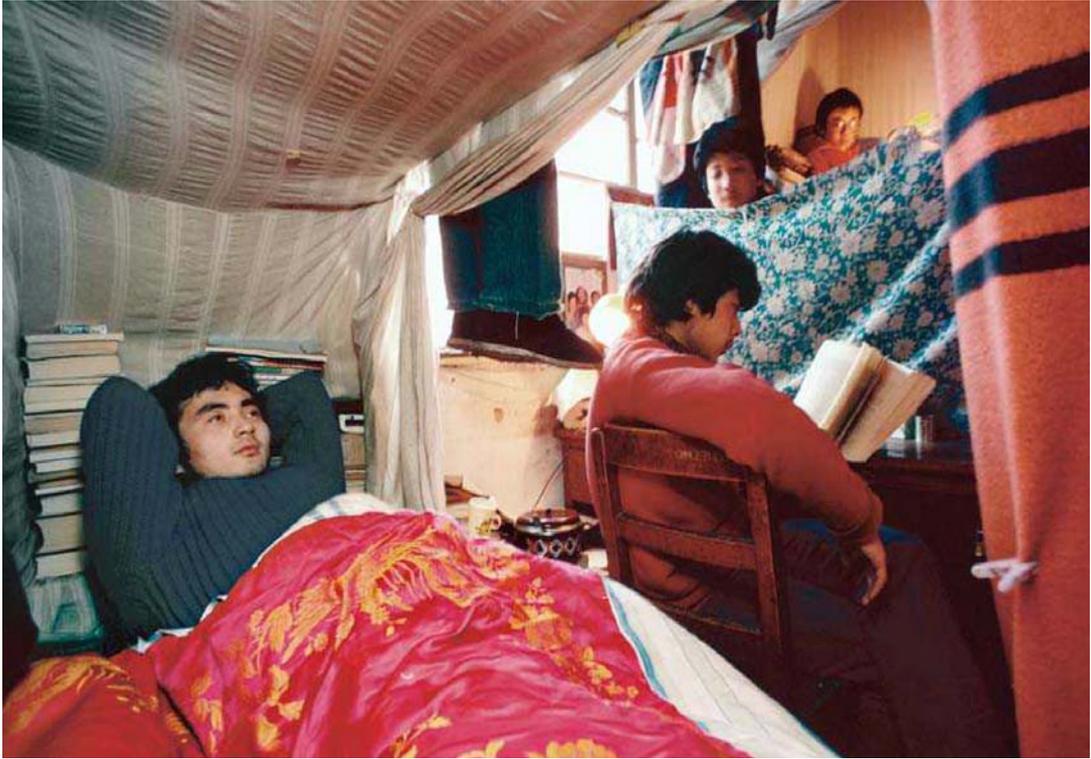
01 1995年，广东深圳街头。

02 1986年，北京长安街，上海牌轿车。

03 1992年，云南昆明。

04 1987年，四川成都，民众通过看电视学习电工技术。







01
02

03

01

1987年，北京，北京大学宿舍。

02

1986年，上海，民众在体育场内购买股票。

03

1988年，山西大同，买家具。

叶公好龙

叶公其实是个英雄人物

文 | 匡己

叶公好龙这一成语在《现代汉语词典》里是这样解释的：叶公爱龙成癖，被天上的真龙知道后，便从天上降到叶公家里。叶公一看是真龙，吓得转身就跑，好像丢了魂似的。比喻表面上爱好某事物，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爱好，大多含贬义。

❖ 孔子与叶公“道不同”

叶公好龙的出处说法颇多，北宋《太平御览》称，叶公好龙的典故出自于《庄子》，只是不知为何北宋之后的《庄子》中，便不见了此故事。清朝末年学者马国翰所著专门收集散佚典籍的《玉函山房辑佚书》则称，此典故乃是源于战国时期韩国丞相申不害所著《申子》一书。

目前普遍认为，叶公好龙典故的最早出处则是西汉学者刘向所著《新序》一书，中云：“子张见鲁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礼。托仆夫而去，说：臣闻君好士，故不远千里之外，犯霜露，冒尘垢，百舍重研，不敢休息以见君。七日而君不礼，君之好士也，有似叶公子高之好龙也。叶公子高好龙，钩以写龙，凿以写龙，屋室雕文以写龙。于是天龙闻而下之，窥头于牖，施尾于堂。叶公见之，弃而还走，失其魂魄，五色无主。是叶公非好龙也，好夫似龙而非龙者也。”意思是说孔子的弟子子张想去鲁哀公那里讨生活，结果不被待见，羞愧

孔子与叶公相见，乃是为了求官，但两人却“道不同”，此后两人间的交往，便没有了下文。所以可以推测，“叶公好龙”这个典故，可能是孔子的某位弟子编出来的，用以讽刺“不真心爱人才”的叶公。

之下，说了这么个故事出来讽刺鲁哀公。

叶公是谁？是子张或者他人编造出来的，还是确有其人？

《论语·述而》第七篇中就有提到叶公，说叶公向子路打听孔子的情况，子路竟然答不上来，孔子得知后进行了一番自我介绍。《论语·子路篇》

中，就有了叶公与孔子的一番“畅谈”——

叶公问政。子曰：近者说，远者来……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叶公问为政之道，孔子称为政之道就是让远近的人都快乐。这种看似没什么毛病的回答却也是没什么实际内容的假大空。墨子曾对此犀利地表示：“叶公子高岂不知善为政者之远者近者而旧者新者哉？而所以为之，若之何也？不以人所不智告之，而以所智告之，故叶公子高未得其问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对也。”（《墨子·耕注》）

由此可见，孔子与叶公的“道不同”。而由《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可知，孔子与叶公相见，乃是前者去拜访后者，目的嘛，大约是求官了。前去求官，却与被求者闹了个“道不同”，至于此后两人间的交往，便没有了下文。

所以可以推测，“叶公好龙”这个典故，可能是孔子的某位弟子编出来的，用以讽刺“不真心爱人才”的叶公的。

❖ 历史上真实的叶公

在其他典籍中，对叶公的评价很高，甚至可以称得上是一位英雄。

《汉书·古今人表》乃是班固在太史公的框架下难得的自我突破，其中古今名人被列为九等，而叶公竟然位列上等中的“智人”行列。刘向是西汉经学家，而班固是东汉时期的人，可见班固无视刘向荒诞的“叶公好龙”之说，而是根据叶公的历史记载，还其一个清白了。

而在《左传》中，更是有关于叶公伟大功绩的精彩记载：

“楚白公之乱，陈人恃其聚而侵楚。楚既宁，将取陈麦。楚子问帅于大师子谷与叶公诸梁……叶公亦至，及北门，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国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盗贼之矢若伤君，是绝民

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进。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国人望君如望岁焉，日日以几。若见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奋心，犹将旌君以徇于国，而反掩面以绝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进。遇箴尹固，帅其属，将与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国矣。弃德从贼，其可保乎？”乃从叶公。使与国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缢，其徒微之……诸梁兼二事，国宁，乃使宁为令尹，使宽为司马，而老子于叶。”

白公即春秋时期楚国著名叛乱王孙，又名白公胜。在此君叛乱之后，叶公与其他将领起兵前去平叛，结果民望所归，竟然引得白公胜的手下倒戈相向，逼得这叛乱王孙自杀而死。

叶公之伟大功绩，从其平叛之后所封官职也可以看出一二：“诸梁兼二事，国宁，乃使宁为令尹，使宽为司马”“诸梁兼二事”，意为叶公沈诸梁被楚王同时封了两个官职。从后文判断，当是令尹和司马，令尹为楚国最高官职，司马则是楚国最高武职。同时兼有军政两大要职，叶公之于楚国，可谓栋梁之于大厦了。而在楚国恢复秩序之后，叶公选择了让位于贤，最后得以善终。

更鲜为人知的是，叶公，这位早于秦国水利工程专家李冰差不多有一个世纪的楚国大夫，带领他所治区域叶邑（今河南叶县）的子民，修建了一个比都江堰早得多的水利工程——东西二陂。此工程遗址如今仍然存在于叶县境内，大体位于南北两水城处。

叶公虽然名为沈诸梁，但因为其所封地为叶邑，号为叶公，其后人便有改姓叶氏者。据叶姓人士称，此即为叶姓的起源。这种说法已得到很多叶姓人士的赞同，每到清明时节，叶县澧河之滨的叶公墓前，尽是回乡祭祖的叶姓子孙。而在中国台湾更是有名为“台北市全台叶姓祖庙”的民间团体，其对叶公史料的收集整理，颇下了些功夫，只是其整理的内容中，却不见了“叶公好龙”的章节。^①



沦陷区 | 一个更复杂的存在

沦陷区

一个更复杂的存在



1939年7月7日，南京傀儡政权的“纪念活动”集会。南京沦陷期间，日伪当局借各种时机强制举行民众集会和游行，一方面作为加强对南京民众进行控制的手段，以图潜移默化地改变民众的思想和情绪，一方面也企图以这种虚假的“万众参与”“民众拥护”的场面，欺骗世界舆论，作为其发动侵略战争的借口。南京民众受到各种胁迫，不得不参加这种活动。图//FOTOE





日本占领上海后，在1943年8月1日，对上海的法租界和公共租界进行了接管，并称为“解放”，要求上海的媒体庆祝。租界的丧失，标志着上海彻底成为沦陷区，这种要求，对中国人来说，是双重的侮辱。

二战时，日军曾占领中国大片领土。二战前在东北扶植伪满洲国，二战时又扶植汪精卫的“国民政府”，想在沦陷区推行殖民统治，为其全面侵华战争服务。对中国人来说，沦陷区是永远的痛。国土的沦陷，二战胜利后可以收回，但是一部分国人“沦陷”，成为汉奸，则成为中国文化的耻点，天长日久，而不能忘怀。尤其是对比沦陷区人民所处的困境和各种抵抗，对汉奸的恨，有时甚至比对鬼子的恨还要多一点。

汉奸的身份具有双重性。有“汉”的一面，也有“奸”的一面，已经有不少电视剧，不再把汉奸脸谱化，而是突出其内心的挣扎。因此，人们对汉奸的“恨”，包括更多的反思在里面。人们最常问的一句话是：如果每个中国人都有抗争意识，如果这种抗争能够结合在一起，抗战是不是能更早的胜利？面对沦陷区和汉奸，中国人往往会有很多思考，而在抗战胜利70年之后，一些人也产生了某种误解。

其一，认为日本在沦陷区实行了一些“改革”和“建设”，对中国的现代化有“促进作用”。毋庸置疑，日本也希望沦陷区能保持某种稳定，

但是这种希望，却是为了满足其侵略战争的需要。他们想把沦陷区变成日本的后方，为此，日本甚至在东北进行了大量的移民。在一些城市，日本也进行了城市管理方面的探索，为了宣传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日本甚至也鼓励文化建设——当然，是他们所需要、喜欢的文化。日本在沦陷区所做的一切，目的都是为了推进战争，都是为了制造下一场屠杀，并无任何“善意”可言。

其二，认为沦陷区就是彻底的沦陷。伪政权当道，伪军和汉奸横行，日本全面管控，民不聊生，中国人敢怒不敢言，只能申请“良民证”。事实上，即使在沦陷区，中国人的心也从未彻底沦陷过。以文化阵营为例，尽管日伪政权为拉拢文化人为其服务用尽了手段，但是在沦陷的上海，仍有很多文化人守住了民族大义的底线。他们拒绝为日本人服务，他们的作品遭受查禁，生活陷入困顿，贫病交加，不少人在饥饿和疾病中死去。他们没有拿起枪去战斗，但是仍然用笔迂回地坚持斗争。

长期以来，我们纪念抗战的胜利，往往更关注战争本身，关注日本的罪行和证据，关注我们的牺牲和英雄。我们对沦陷区的关注，很多时候只停留在敌后武工队的抗日上。但沦陷区是一个更复杂的存在。我们取得了那场最艰难的战争的胜利，收复了沦陷区，我们也应该深入了解沦陷区。

文 | 浦顿

沦陷区的城市管理 毫无善意的 “善政”

文 | 王月

伪满洲国的“首都”长春，日本人在城市建设和规划管理上花了相当大的力气：借鉴英国学者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规划设计、仿造巴黎建造、亚洲首个全面实施冲水式厕所的城市……日伪的目的很明确：中国东北已是“日本国土”，要永久霸占，必须有大量移民，而现代化的城市和舒适的生活环境是吸引移民的必要条件。

畸形的“田园城市”

对 于中国的城市，日本人有着自己的“规划”。1937年12月，驻留上海的日本陆海军就已经要求日本内务省，向上海派遣土木技术工程师。翌年，日本派来的包括港湾、城市规划在内的12名专家来到上海，一个《大上海都市计划》就诞生了。其后日本占领了上海租界，计划又发展成彻底改造上海市中心的方案。

为了形成纪念性的城市轴线，他们选择彻底改造北至南京路、西至跑马场的浦西英租界，拆除所有的现存建筑，全部修成巨大的板式高层建筑。巨大的轴线穿越黄浦江到达浦东地区，在两岸创造两个象征性的中心：浦西是“帝国”的行政中心，浦东则是一组纪念性建筑——“日华慰灵塔”。这种格局，正符合日本帝国主义的独裁形象。不过，这一规划由于抗日战争的结束而停



肉满时期，长春的日本官舍街。图/FOTOE



沦陷区 | 一个更复杂的存在

留于图纸之上。

在当时的中国,另一个著名的城市是长春。“大屋顶,两排树。圆广场,小别墅”,就是当时长春人对伪满时期长春市容的鲜明记忆。

对于这个伪满洲国的“首都”,日本人也是可谓“花了大力气”来建设:这是当时的中国第一座全由外国专家规划设计的城市,唯一的一座仿照外国首都(巴黎、堪培拉)建造的城市,亚洲第一个全面实施冲水式厕所的城市,甚至比日本东京还更先进。

长春的规划建设,还借鉴了英国学者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整个长春将全部掩映在绿海之中。规划中,到1942年,长春人均占有绿地2272平方米,超过华盛顿1倍,是日本大城市人均绿地面积的5倍,为世界大城市之冠!

花了这样大的力气,日本人的目的很明确:吸引日本民众移居东北。对于日本而言,东北是“国土”,要永久霸占。想要长期占领,必须有大量的移民。而要让日本民众离开家园前来东北这块陌生的土地定居,就必须提供现代化的城市和舒适的生活环境。

但实际上,东北的城市当时是严重畸形的。以长春为例,为日本人提供的一级居住区每平方公里为0.4万人,各种配套十分先进齐全;为中国人设计的居住区却是每平方公里1.2万人,基本就是原来的老城区加上日本人修的两条大马路。

受日本人居住区环境好、档次高的吸引,来东北的日本移民数量急剧增长至14万。而长春总人口也达到121.7万人,超过东京(都市区),号称“亚洲第一大都市”。

但是,这里也是反抗日军侵略最激烈的城市。沦陷14年间,长春工人和学生从未停止过抗争,少则几十、上百,多则几百、上千人参加罢工、罢课。有一次,长春地下党组织3000多名榨油工人举行总罢工,被当局惊称为伪满“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罢大工。

长春市民因地制宜,还采取了各种方式反抗

日本的侵略。

1937年,工商业者张泽多决定,在“新京”市(即长春)内开办一个酱油作坊。当时开作坊都被要求必须冠以“新京”“国都”的字样,但张泽多不理那一套,硬是把作坊起名为“长春酱园”,就是要以“酱”寓“倔犟”,以“园”唤家园,表达内心深处对家乡故园的怀念和不甘做亡国奴的民族气节。而曾任吉林省高等顾问的王西秋,伪满成立后,有人请他出山为官,遭到他严词拒绝:“我不能忘记自己已是亡国奴了,我的良心告诉我,誓死不能当汉奸!”后来为了避免日本人的纠缠,他干脆回老家农安县隐居。

1940年以后,长春民众自发的反满抗日活动更是此起彼伏:1942年冬,市内出现大量宣传反满抗日的传单和漫画;1943年秋,关东军宽城子仓库被长春人烧毁,大火足足烧了一天两夜;1944年冬,市内两名夜间巡逻的日本警察先后被杀死……





“经济犯”和“勤劳奉公”

日伪“田园城市”的好景并不长。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伪满当局缺乏财力和人力，长春一些在建的公园被迫停止建设。1943年，为了节省原料，又将大量正在建设中的建筑全部停下来，城市里就出现了大量半截子工程。又由于缺乏汽油，满街跑的公交汽车陷入瘫痪，伪满当局只好变更规划，重新发展电车运输——本来，为了美观，长春的规划是市内不发展电车，以公共汽车为主——甚至还提出过建设地下铁路的设想。

长春不复美好，是因为“一切服从战争需要”。日本战局吃紧，就顾不上“形象工程”了。原来的城市规划随意改变，后来的修建飞机场，建设重工业企业，目的就是加速掠夺东北资源。

彼时，煤铁运往日本，粮食也要运往日本，满洲地区年产粮食约2000万吨，其中一半都要作为军事用粮和对日出口。每年关东军征完粮，农民的口粮所剩无几。由于粮食供应不足，当时便实行配给制。当局规定中国人不允许运输、食用大米、白面，违者按照“经济犯”治罪。

那时，柳春在大连读书，她回忆道，大米是专门配给日本人吃的，中国人只能吃苞谷和高粱米。那时她的小妹妹刚出生，因为粮食不够，营养不良，母亲的奶水很少，便让柳春回旅顺老家一趟弄些口粮。

柳春心想自己是学生，还穿着日本学校的水手服，捎带点粮食应该没问题。她把粮食缝在一个长筒袋子里缠在腰上，藏在裙子里，但最后还是给车站的乘警搜了出来，认为她是“走私犯”“经济犯”。柳春解释说是因为小妹妹没有奶吃，对方也不听，还打了她两个耳光。柳春只好哭着跑回家。把在学校里吃的“日之丸”留一点带回去给小妹妹吃，但小妹妹还是因为营养不够而夭折了。

“日之丸”，就是一大盒白米饭，没有菜，饭正中间放一颗酸红梅，象征日本国旗。学校的规矩是每周都要吃一顿，就是让中国学生吃了这一顿饭而不忘日本天皇，不忘所谓的“大和精神”。饭前要“静坐，低头祈祷，保佑天皇，保佑日军打败仗”。柳春回忆说，他们班里的中国同学都在心中骂日本人，偷偷诅咒“小日本快完蛋吧”。

01

02 | 03

01

伪满时期，举家移民至中国东北的日本家族。图/秦风老照片馆/FOTOE

02

1939年，伪满洲国学校里听课做笔记的日本移民。图/FOTOE

03

伪满时期，长春，高级日本料理店内进餐的日本侨民。图/FOTOE



沦陷区 | 一个更复杂的存在

在学校里，最重要的有两门课：日语和“国民道德”。日语达不到三等翻译水平，就不能毕业。

“国民道德”也就是奴化教育。不过到了战争后期，更重要的是军训课。军训课合格的，入伍就有军衔。这实际就是为日本侵略者提供军事后备力量当“炮灰”。于是，学生们就整天在训练场或田野上摸爬滚打，接受各种军事训练，未达到要求，回校后就集体罚跪在操场上，经常有学生连饿带累休克。

再后来，又有了“勤劳奉公”。这就是强迫学生参加义务劳动，成了战时的“劳动军”，为其侵略战争效劳。一、二年级常被强行停课，去修战备路，到日本开拓团挖沟修渠，干农活等。三、四年级就挖防空洞，修建军事设备工程。

“勤劳奉公”并不限于学生。事实上，除被征兵者以外的青壮年劳力，都要以“勤劳奉公”名义无偿为日满的工矿、军事工程劳动。强征的劳工按户籍摊派，不限于汉族平民，满洲人聚居

地区也不能幸免。在这场对中国人劳动力的掠夺中，饿死、累死的中国人，不计其数。

日本在伪满洲国的残暴统治，连满族人也无法忍受，要起来“造反”。爱新觉罗·宪东，是川岛芳子的弟弟，末代肃亲王善耆的小儿子，就毅然加入了东北抗日地下组织，并且在满清贵族之中发展出一个规模惊人的情报网。

而东北的青年学生，更是将伪满洲国的总理府变成了东北抗日情报联络点——伪满洲国的总理大臣张景惠的儿子张绍纪，是“东北青年救亡会”的重要成员。他利用自己的住所为党组织藏匿进步书刊和秘密文件、抄写情报、提供开会场所等，还借父亲的关系在一些要害部门安插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另一方面，他还利用父亲的特殊地位，刺探到大量一般人无法得到情报：伪满公路的分布和扩建情况；伪满大汉奸和“宪特”的名单；长春市要图……



伪满时期，长春新建的马路一景。图 / FOTOE

“
 在学校里，最重要的两门课是日语和“国民道德”。日语达不到三等翻译水平，就不能毕业。“国民道德”就是奴化教育。战争后期，更重要的就是军训课。军训课合格的，入伍就有军衔。这实际就是为日本侵略者提供军事后备力量当“炮灰”。

封锁

张爱玲的上海，停留在沦陷时期。从她公寓的窗口望出去，那个旧上海似乎总是井井有条，不慌不乱的。十字街口永远是热热闹闹的，电车是按时收班的，公寓里的生活，有小孩子嬉笑打闹，要买菜做饭，要读报会客。张爱玲跟大汉奸胡兰成谈起了恋爱，很多人都为她惋惜。在当时的上海，作家都在写以“救亡图存”为主题的沦陷区苦难生活，只有张爱玲在无政治意识地写公寓生活，实在是异数。

“封锁”，是张爱玲一篇小说的名字，写的是“封锁”导致的一场电车上虚幻的爱，还挺浪漫的。但当时上海人眼中的“封锁”，是恐怖的。一旦出事，日军就封锁出事地点，实行军事戒严，大肆搜捕，不少仁人志士死于其中。普通老百姓一旦碰上被封锁了，就是成天都在封锁中，哪儿也去不了，甚至有五天五夜不许进人进车，生活自是苦不堪言。有一次，一个孩子病了，要出去看医生，结果封锁了足足4个小时，孩子就死掉了。1941年除夕，沪西愚园路发生日宪兵被击事件，日军在这一地区封锁了7天7夜进行搜查，适逢天冷下雪，冻死饿死了许多中国人，出现了难产孕妇无法送医院致死的情况。

但封锁时，日侨一律是通行无阻。当时的上海，日本人不少，享受着各种特殊待遇。日军掠夺了许多中国人的工厂、企业，又增设了许多为侵略战争服务的公司、商行、机关。从中国掠夺的能源和物资，可以给日本雇工提供优厚的工资待遇，大批日侨便举家来到上海。到后来，整个虹口尽是日侨和日本商店、公司，街上一片木屐声。中国小贩则以日本话叫卖。

日本占领了上海，加强了对上海社会的控制：颁布了《上海市大道政府警察局违警暂行处罚条文》。该条文规定了很多不能做的事：人烟稠密处，不能燃放烟花；公共场所不能高声放歌，不能横卧；夜间不许无故喧哗；不许随意便溺，不许乱倒垃圾；不准乱贴春药、堕胎药的小广告……违者罚款或拘留。这些条款相当细致，以往在道德层面的要求，现在都成了法规。

日伪政府在上海的统治相当严酷，普通中国人的生活非常不易。通货膨胀加剧，物价不断上涨，为了养活自己，很多中国人只好去日本的工厂做工。但是，日侨可以吃白米饭、饮日本酒，中国工人就只有吃着像牛马料一样的饭菜。

上海有名的杨树浦发电厂，中国工人为了要求改善生活，数度举行罢工，全副武装的日本海军陆战队立即以刺刀强迫工人劳动；在松下电气工厂和木代造船厂，都发生过中国女工因小便超过了时间便遭日本工头毒打的事情。

对此，工人以罢工来进行反抗，此起彼伏，甚至连上海邮电、自来水厂和电车这些服务公共事业的工人也要掀起大规模的罢工。1939年，日伪特务在租界制造了18起恐怖案，打死多名爱国人士。在日本占领的虹口又发生3起出租车司机被杀害事件。于是，全市40多家出租汽车公司，便一起罢工，“拒驶虹口”。他们为被害司机举行大出丧，控诉日本帝国主义暴行。

后来，日本加紧利用上海工业基础，竭力扩大军工业生产，工人反抗就是“磨洋工”，出工不出力，还故意制造各种“事故”：棉纺厂的工人暗中将肥皂头、山芋皮丢进传动皮带，使其打滑；发



电厂工人故意不去修设备，导致发电量下降；机器厂工人故意违反工艺规程，造成塑件有砂眼，不能用；江南造船所建造一艘日军急需的轮渡，工人暗中做了手脚，导致船一下水，龙筋弯曲，船体变形、渗水，日本人只好把它拖进船坞重新返工……

生意

沦陷时期的生意，真是不好做。上海一个五金店店员颜滨在日记中写道，“本号的货物因受统制的影响，生意清淡得可怜，尤其是这几天几乎是完全停顿了。所以，我们除了吃饭之外，简直毫无别事，因此无聊之极！”

但是，要维持生活，必须要做点事——当时因为日本大肆掠夺，经济环境恶劣。一旦失业，人就要马上陷入绝境，甚至妻离子散。颜滨写道，他的堂兄仁佑失业后沉迷于赌博，家破人亡，最后失踪，生死不明，妻子给人家做奶妈，老娘带着不满周岁的孩子回了乡下，生活无着。而他的姐夫“启昌兄在做的永盛薄荷公司准备在月底解散了，他家三人（爹爹、四阿哥及启昌兄）俱将因此失业，真所谓

要坐吃山空。”

统制，也就是日本推行的“强制性干预”和“管制”经济的体制，每个行业都成立一个“特殊会社”，垄断经营，又经常对市场进行行政干预。1943年，日本棉布统制会受日军委托，实施“棉布紧急统制”，封闭上海仓库。中国人所存的棉布，一夜之间顿成乌有，损失之大，难以计算，有的资本家甚至要自杀，但是日商却可用各种名目从仓库中提取棉布。

垄断之外，也要掠夺。虹口地区的日侨，大多都是强占的中国居民的房屋——如果是空屋就直接破门而入，如果有人住就让军队先赶走住户。新大祥布店变成“森永糖果店”，中国银行改建为“东洋食堂”，原新中央电影院，改为“银映座”，不准中国人入内。

日本人有钱，那就做日本人的生意。苏州菜馆倒是深谙此道。沦陷时期，餐饮生意并不好做。日军大肆搜刮，导致各种民生用品物价飞涨；日伪政府从乡村收不到税（因为有游击队），便想办法从城市收更多税，这便有筵席捐、旅馆捐等的产生，筵席捐甚至还要使用累进税制，普遍在15~40%之间，高得吓人。菜馆直接把增加的成本转嫁到菜单

01

02 | 03

01

伪满时期，在高粱地中处决抗日人士后合影的日军。图/FOTOE

02

伪满洲国新京（长春），东洋拓殖株式会社新京支店。图/FOTOE

03

20世纪30年代，大连市中央大广场。广场四周有正金银行、朝鲜银行、民政部、市役所、邮政局、法院、警察署、中国银行、英国领事馆等宏伟的建筑，是大连的地标，也是日本殖民大连的外观象征。图/FOTOE



上，利润甚至要超过 50%。价钱如此之高，但是在苏州，菜馆生意却很兴隆。哪怕后来菜馆职工公会成立，也从来没有闹过罢工或者要加薪，可见生活确实过得不错。对此《江苏日报》都大惑不解，发文质疑。其实很简单。菜馆全都开到景德路了，那边是日伪政府机关的所在地，日本人多。

原本统治苏州餐饮的，是徽菜，因为徽商多。但在抗战后期，上海菜馆大量出现，这是因为同是沦陷区，苏州物价较上海便宜，又还算安宁，很多上海人就移居苏州。北京菜馆也出现了，四川菜也传入了，但徽菜只剩一家——因为徽商的生意，早就做不下去了。

后来，日本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日伪政府只好缩减开支，实施节约生活政策，高级菜馆要改为平民食堂。哪怕物价急剧攀升，菜馆只能按限价销售——这是日伪政府的强制规定。

按规定，粮、油、盐、棉等物资都属限价物资。日伪为加强经济掠夺，一边滥发纸币，又要限价，把经济危机转嫁给中国商人。商人们为了谋求生存，便开始反抗日伪掠夺性的物资统制体系。

你限价，我就提价，这是最直接的抗争办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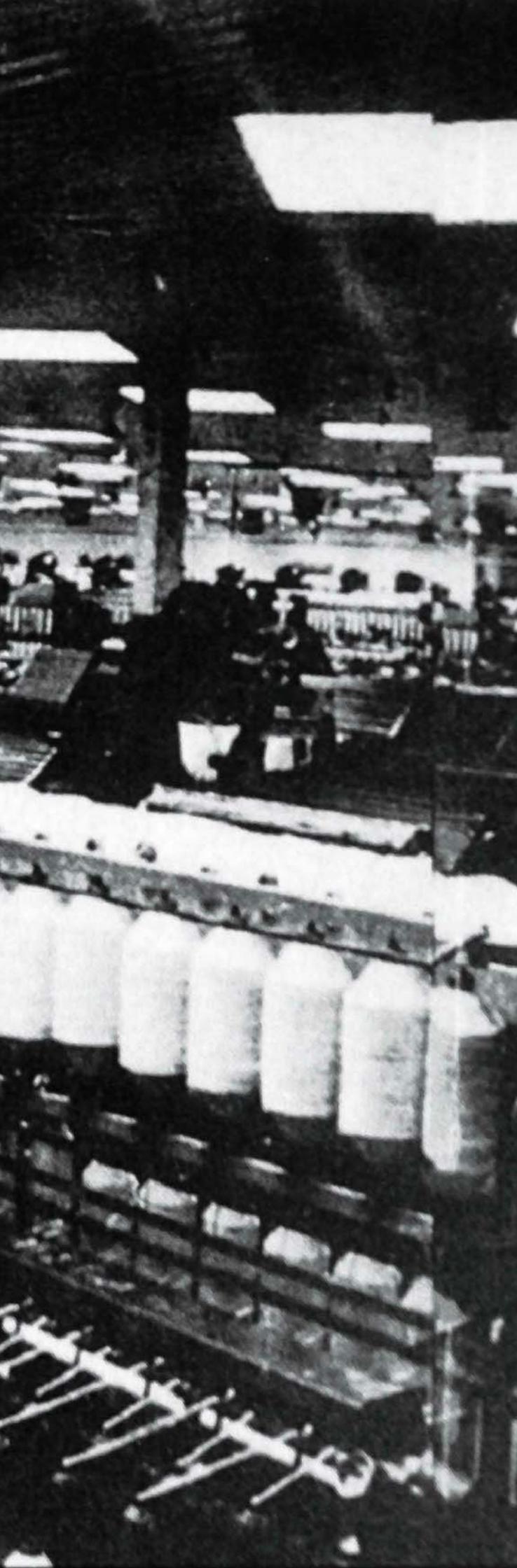
提价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只将小众、瑕疵的商品摆放在柜面出售，应付限价，而将紧缺、上等物品用于暗盘交易，比如米店公开出售的只有配给米和不在限价之列的面粉和杂粮，前者质量太差，后者非南方人主食，所以店面表面看起来营业清淡，实际上私下交易非常火爆。

另一种方法，就是以口头报价或隐藏标签的方式暗中抬价。限价的政策，要求将商品的最高限价公示于众，店里必须要悬挂标签。但商家就要么把标签挂在不显眼处，要么就发明了另一套计价体系，完全不按限价来卖。

不过，相比此前江南十多万农民举行暴动消灭日伪军的征粮队，商家的抵抗还是比较消极而且隐晦，但很快就转化为积极的行动了。原本只做黑市和走私的各路摊贩，大胆将摊位摆到街头巷尾，还大规模进军市内大商场，他们以哄抬物价的办法来反抗限价，令日伪政府防不胜防，取缔了很多次，紧接着又有摊贩加入进来，抓都抓不完。最后，限价政策名存实亡。^①

（参考：《抗日战争时期日本殖民统治下的上海城市管理体制与管理》、《抗战时期苏州菜馆业的变迁与城市空间》、《近代东北城市的历史变迁》）





沦陷区战略物资统制 疯狂掠夺 与反掠夺

文 | 潘前芝

华中地区是全国主要的粮食和棉花产地，拥有众多的棉纺织厂。日军占领该地区后，继续推行其“以战养战”的侵略政策，对棉花、棉纱、棉布等重要军事战略物资实行全面管制，对华中地区的纺织业造成了灾难性后果。

日本三井物产（三井洋行）上海支店的支店长山本条太郎于1902年收买中国的兴泰纱厂，1906年收买盛宣怀所有的大纯纱厂，并于1908年分别成立上海纺织会社第一、第二工厂。1925年5月，上海的内外棉第七工厂主借故关闭工厂、停发工人工资，不许工人上班。中国工人进厂与厂方交涉，日本大班率打手枪杀中国工人顾正红，打伤工人十多人，这一血案成为全国性的反帝爱国运动一五卅运动的导火线。这是上海纺织会社生产车间内景。图 / 吴雍 / FOTOE



日军直接插手 棉花收购业务

华 中地区的物资统制，最初是由日本单独操纵进行。侵占华中后，日军在“军管理”的旗号下，强占了各种工厂140余家，其中纺织厂67家，然后将这些工厂委托给日本企业经营。同时，日本商人在军方的支持下在上海开设了很多大规模的纺织厂。

为了保证这些纺织厂开工，日军对华中出产的棉花实行严格的管制，指导日商利用中国的棉花中间商和扎花厂商收购棉花。比如，要从南通运棉花到上海，首先必须请日本商行出面，到上海日本驻军申报领取棉花证明，再由南通的日本宪兵队查验棉花所在地及数量相符，在上海日军开具的证明上盖章，然后才能赴上海交验证明，领得“采办证”，重新回南通交宪兵队查验盖章，方可装运，送达目的地之后又由日商按照证明收取棉花之后，再盖章送缴原发证日军部队核对销证。不缴属于“违法”，手续不全“许可证”作废。

1940年2月，由日本在华纺织同业公会上海支部、日本棉花同业会、上海制棉协会、落棉协会4家棉业组织，联合成立了华中棉花协会，作为日

军华中占领区棉花的统制和收购机关，负责对各类棉花的统一收购和统一配给。该棉业协会在各主要产棉区，如杭州、南京、南通、海门、启东、太仓、常熟、安庆等设立了支部。为避免出现争购，各个支部还大致划分了各自的收购区域。但日方人力有限，直接收购活动仍通过中国棉花商人中间进行活动，这使后面的民间私下交易棉花成为了可能。

尽管在日军刺刀下进行，棉花收购情况却并不如意。华中的棉花产量尽管在逐年增加（1939年200万担，1940年300万担，1942年340万担），但棉花协会收得的棉花却逐年剧减，1939年为190万担，1940年为170万担，1941年和1942年下降到120万担。这些已经收得的棉花，当然优先保障日商或日方控制的纱厂。1941年初，上海的非日方控制的华资纱厂纱锭已不足59万枚，布机不足4000台。而日军和日商控制的华资纱厂38家，纱锭133万枚，布机18000余台，加上原有的日商纱厂，日本在上海纺织业中已居于绝对的支配地位。



“商统会” 强制收买棉纱布

1940年汪伪政府成立后，与日方进行了谈判，要求参与物资统制。日方为了新成立的“政府”的“威信”，在物资统制方面对汪伪有所让步，逐渐退居幕后，由汪伪政权的职能部门走向物资统制一线。

1941年9月25日，汪伪政府中央物资统制委员会（简称物统会）成立。物统会的任务就是对该区域准许移出主要物资每月标准之申请，对当地施行物资统制等。汪伪“实业部长”梅思平任主任委员。但日方之前成立的控制物资运销配给机构，如军票配给组合、商品贩卖协议会等仍继续

存在，这就使得汪伪所获得的权力实际上非常有限。比如，中日在“物统会”中商定：江北棉产区由日商收购，江南棉产区归华商收购。但1942年收购棉花的时候，日本商行借口江南地区早已布置过收买网点，不肯完全撤销原来在江南建立的基层收购机构，强行在长江以南地区收买棉花，根本无视之前的划区收买协议。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战局对日不利，日方为拉拢汪伪政府，决定将物资统制权移交汪伪政府，由汪伪负责供应日军所需物资。双方达成妥协：取消之前成立的物统会，转而设立物资统制审议



委员会，作为华中沦陷区物资统制的督导机关，并由汪伪政府指派中国工商界有力人士组织全国商业统制总会，作为华中沦陷区物资统制的执行机关，日方工商界不参加这个组织的上层机构。

1943年3月15日，全国商业统制总会（简称商统会）在上海成立，会所设在静安寺路999号，理事长由当时的交通银行总经理唐寿民担任。3月19日，汪伪与日方又共同成立物资统制审议委员会（简称“物审会”），其任务是“督导商统会完善地运用其技能，强化物资统制。”“商统会”成立不久，就公布了《战时物资移动取缔暂行条例》，明确把棉花、棉纱棉布列入统制之列，规定由上海地区运往苏、浙、皖三省的物资，必须向商统会申请核发许可证。当时物资统制的主要对象一是米粮，二是棉花。这两个机构的成立，标志着华中物资的“统制权”形式上正式转移到了汪伪政府手中。

“商统会”成立不久，适逢上海米价猛涨并带动了市场物价飞涨。汪伪政府当局认为这次涨价与投机者物资囤积有关，而且棉纱布及棉花原料的投机交易最为严重。4月1日，汪伪上海市政府“经济局”开始实行棉花、棉纱、棉织品等18类主要商品储藏总登记，规定“如抗匿不报或以多报少，一经查实，立予严厉处分”。他们派出了150名检查人员，对上海180个仓库进行调查。10月，南京、镇江、江阴、无锡等地，也实行了棉纱布登记。经调查，上海中日双方棉纺织厂商库存的棉纱布约为60万件，按当时黑市买卖的棉纱布价格，每件20支蓝凤牌标准棉纱约为4万元计算，估计作为投机对象的棉纱常在11万件左右。汪伪政府最高经济顾问石渡庄太郎多次召开有汪伪派员参加的“物审会”日方干事座谈会，初步作出强制收买棉纱布的建议，即对上海市场库存

在日伪统治下的上海市民在排队抢户口米。图/FOTOE



的棉纱布由伪政府公布“命令”实行强制收买；强制收买的棉纱布由“商统会”统一按计划供应各方面的需要；强制收买棉纱布的价格以当年春季未暴涨时的市价为准；强制收买棉纱布的付款最好是分期付款或国库券支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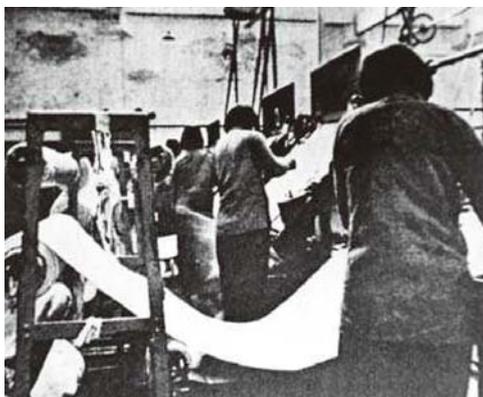
恰在此时，日本大本营与内阁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实行对华紧急经济措施：对中国市场的棉纱、棉布强制收买，并运用它作为获得紧急物资的交换物资；以金块 25 吨为限，由日本运往中国，其中 5 吨交华北运用，其余交汪伪政府用以收买华商棉纱布；日商的棉纱布，由日本公债进行收买。根据上述决定，“物审会”拟定了具体强制收购实施方案：“商统会”组织专门机构负责收购华商所有的棉纱布，日本商人所有的棉纱布由日方有关当局指定专门机构进行收购。

8 月 9 日，汪精卫在上海召开临时“最高国防会议”，通过了伪实业部提交的《收买棉纱布暂行条例》及《收买棉纱布实施要纲》。不久，伪行政院又通过了《收买棉纱布实施细则》，并首先在上海实行，而后对苏州等地商人囤积的棉纱布也加以强购。

8 月 13 日，“商统会”的“收买棉纱布上海办事处”成立，着手办理棉纱布收买事宜。9 月 1 日，办事处组织对上海市所有的针织厂和商号所存的棉制品进行缉查，至 15 日，共查仓库、纱厂、布厂、布号及针织厂 297 家，其中 41 家所存的棉纱棉布予以查封。靠着这种强制买卖的办法，日伪收买了大量的棉纱棉布。到 1944 年 6 月底，共收买棉纱棉布 120189 件。

强制收买棉纱布虽然“暂时起到了稳定物价的作用”，但给华商带来了重大损失。按当时市价，20 支蓝凤纱每件为 4 万元，而强收价格仅为 1 万元。此外，按《收买棉纱布实施要纲》“以中储券所付的半数价款在 3 年内付清”的规定，当时的中储券不断贬值，到 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汪伪政权垮台时，一共只付了 3 次，在收买中厂商损失惨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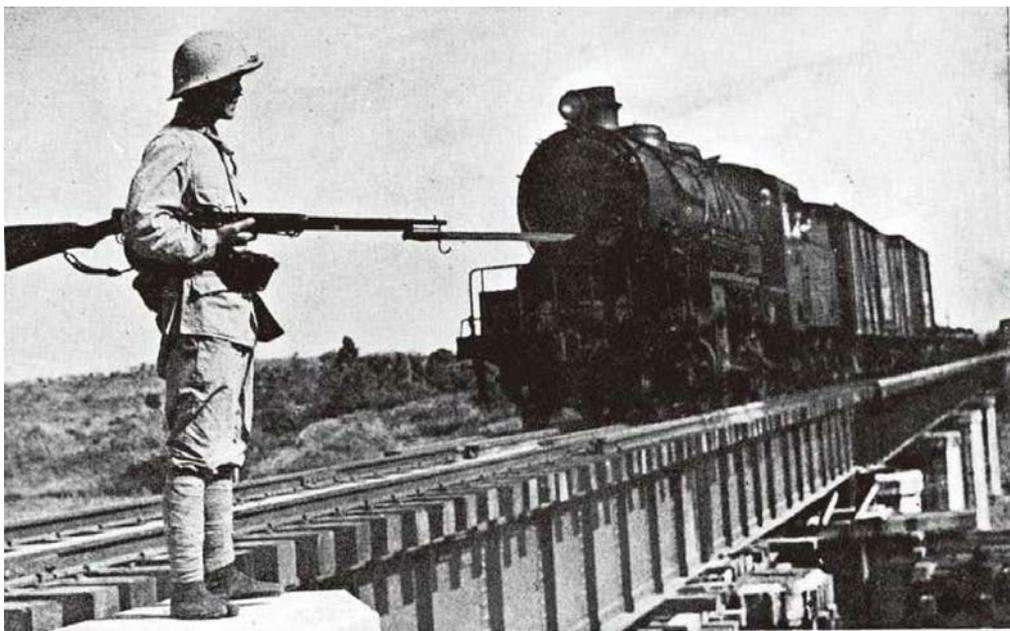
汪伪政府《收买棉纱布暂行条例》规定：1. 上海现存棉纱布一律由政府强制收买；2. 收买价格棉纱以 20 支蓝凤牌为标准每件作价 1 万元；3. 应付价款的一半分两期支付，另一半以储备券分 3 年付清；4. 强制收买的棉纱布由“商统会”负责保管；5. 零售商及使用棉纱棉布为原料的厂商，所存棉纱棉布不超过本年上半年每月平均零售或实用的一个月的数量。《条例》还规定，棉纱布占有者拒绝或者妨碍收买者，处以一年以上五年以下徒刑，并罚金 5 万元，没收其所有棉纱布。



上海纺织会社工厂的中国女工。图 / 吴稚 / FOTOF

这种强制征购，还导致华中各地城乡日常生活所必需的物资日趋匮乏。当时的报纸称：华中最大城市上海发生两大问题“一布店全体失业，无以为生；二市民欲购尺寸之布而不可得”。人们无法添置新衣，缝补旧服装也缺少纱线。

1938年10月底，日军占领武汉后对铁路实行警备。图/吴雅/FOTOE



碌碌无为的 “棉统会”

“商统会”成立后不久，出于日方加强了对作为棉纱原料的棉花“加紧控制”的要求，1943年11月27日，在上海又成立了棉花统制委员会（简称棉统会），作为“商统会”的一个下属部门，负责对华中各地出产的棉花实行统制。上海棉纱布交易所理事闻兰亭任主任委员，申新纱厂代表童侣青、日方纺织厂代表菱田逸次任副主任委员。“棉统会”的主要任务是：负责供应日军需用之棉花及对日出口棉花；华中沦陷区棉花的统一收买及配给；规定棉花的收买及配给价格；筹集收买棉花资金；制定收买棉花需要交换物资的计划以及棉花登记证的审查核发。其具体业务，由所属的中日双方纺织厂联合组织的棉花收买同业协会负责执行。

同之前的华中棉业协会相似，“棉统会”在上海、南京、启东、无锡、杭州等11处分别建立棉花公库，负责棉花的储存保管。棉花收买同业协会在各地收买棉花，由各地基层会员负责执行。

基层会员收买的棉花必须按照“棉统会”指定的地点运交棉花公库验收。即使如此，“棉统会”也无法按计划足量收买到棉花，1943年度为60.5万担，只达到收购计划数的67.2%；1944年度为20.95万担，占收购计划数的65.5%。

这些棉花60%直接交给日军使用及向日本出口，其余40%按开工数分派给华中各纱厂。由于原棉供应不足，日军控制下的纱厂开工率下降到战前的40%-50%。华商更惨，由于华商纱厂在日本军事侵略过程中受到极大破坏，劫后余生之后，又在军管期间被日方拆走大量机器设备，所以，华商纱厂在分配额中仅得1/4，也就是收得棉花总数的1/10。上海作为中国棉纺织业的中心，抗战前棉纺织厂所拥有的纱锭和织机数量，占全国总量的一半以上，但由于战争破坏和日军对棉花原料的垄断，上海的棉纱和织布产量日趋减少并难以为继。



20世纪初，日本纺绩株式会社上海大康纱厂外景。图/吴雍 / FOTO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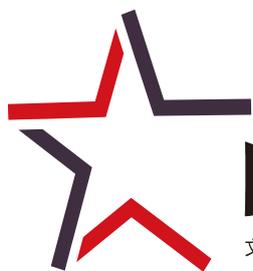
沦陷区的棉花走私

尽管日军和汪伪成立了一系列机构来加强棉花统制，但作为战时紧俏物资，华中地区的棉花、棉纱布的走私活动却一刻没有停止。走私渠道以上海为中心，通过水路的居多，通常是以长江为主要通道，把物资运往芜湖、安庆、九江等地，登岸后分运安徽、江西各地，或者直接深入沙市、岳阳等码头，再分散进入湖南、湖北各地。国统区还有另一条通道，在上海等城市采办好棉纱等物资后，先转运到浙江沿海，主要是温州，然后走瓯江水路上达丽水，再转运金华、上饶各地。

这一走私活动，在当时得到了官方默许。日方、汪伪和国民政府方面，都有一些官员利用“走私”谋利。比如杜月笙，1943年在重庆成立了通济公司，并在上海、淳安等地设立分公司。当时重庆地区棉纱昂贵，杜月笙便派人与驻在上海的日军及其特务机关“协商”，表示只要日方允许通济公司将棉纱从沦陷区运出，通济公司可以为日方从“国统区”运回它们所需要的物资。于是日方不仅同意通济在上海采买棉纱，而且提供运输工具，甚至派军队给予保护。当时国民党军统局头子戴笠是杜月笙的把兄弟，又是通济的“股东”，戴还兼任财政部缉私署长、军事委员会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处长、战时货运管理局局长。所以，通济在国统区运输走私物资自然畅通无阻。杜月笙的通济公司第一次就是从上海采购了3000

件棉纱，由日军“护送”到安徽亳州，通济公司接货人员等在界首接货，然后运往重庆。

与这些具有“走公”性质的走私不同，沦陷区内的人们为了生存，也开展了一些地下活动。譬如，华商纱厂尽管开工锭数远不如日方纱厂，但是他们在艰难困苦环境中，也在寻找一些生存之法。当时棉统会虽然有相当庞大的基层组织机构实行棉花统制收买，但是对于广大棉花产地的商贩不可能彻底控制。另一方面，过去日军和汪伪政府公布的统制棉花的法规，对于手工生产的土纱土布，并没有加以限制，在一定数量范围内可以自由贩运。各地华商纱厂由于原棉配给数量限制，棉纱产量难以满足社会需要，而棉纱需求旺盛，有利可图。于是不少华商纱厂将停工的纺纱机器拆散，在通过封锁线时买通汪伪军警，分批运往各棉花产区，与当地棉花商人合作，建立小规模土洋结合的纱厂，生产粗纱。有些资金雄厚的棉花产地的棉花商人也向纱厂购买纺纱机件，运回乡间经营。在当时上海附近的常熟、太仓等县，这种小规模因陋就简的纱厂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现。这些纱厂的锭数一般约一两千，大的也不超过三千。由于缺乏电力，一般都使用柴油动力。有些乡镇小纱厂甚至勾结汪伪军警，千方百计将棉纱偷运往后方以获取暴利。这一现象，随着抗战后期华中日军势力的衰弱而愈演愈烈。^①



日军“宣抚班”真相

文 | 王龙

七七事变后，随着攻陷中国大片国土，日本为了将占领区变成“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基地，开始实施武装侵略和文化侵略齐头并进的策略，“宣抚班”大规模投入侵华战场，直接隶属日本各驻华派遣军总部。

侵 华战争期间，日军烧杀抢掠的血火硝烟尚未散尽，一支特殊兵种应运而生——这就是专以征服中国民心为主要任务的“宣抚班”。他们如同能剧（日本一种戴着面具表演的传统艺术）中演员一般戴着面具粉墨登场，以恩威并济、剿抚兼施的手段进行“教化安抚”，欺骗麻痹中国军民的反抗意志，把“宣传战”提升到与“武力战”同等重要的地位。

1937年七七事变后，随着攻陷中国大片国土，日本为了将占领区变成“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牢固基地，开始实施武装侵略和文化侵略齐头并进的策略，宣抚班大规模投入侵华战场，直接隶属日本各驻华派遣军总部。日军的《宣抚工作指南》明确：确保日军交通和通信线路安全完备；收抚民心，培养建设“新政权”之基础；尤其要“使民众由敬畏趋向融合，进而形成合作，以收到反共灭党之实效。”

日本人选择“宣抚”一词作为发动“思想战”的代称，本身就可谓机心颇深。这个词语起源于唐朝的“宣抚使”制度，它原指唐后期皇帝派大臣巡视战后地区及水旱灾区，称宣抚使，是中央派驻地方的军事长官。日军使用“宣抚”一词，是把中国沦陷区视作“地方”进行笼络安抚，赤

裸裸的殖民味道不言而喻。

宣抚班实施奴化统治的方式是“以华制华”。宣抚班有专门编制，正副班长均由日军官兵充任，班内成员则统称为宣抚官。“宣抚官”大多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技能，有的能写会画，有的巧言善辩，有的则懂得医疗治病。至于从汉奸群体中挑选中国人充当宣抚官，日军的条件则更为苛刻。他们希望网罗“德高望重”的中国人为自己服务。一旦经过宣抚班筛选后能为日本人效劳，即可出任各种伪职，捞到不少油水。因此老舍的小说《四世同堂》中描写的大赤包夫妇和蓝东阳等寡廉鲜耻的汉奸们，才拼了老命也要钻进日军宣抚班控制下的“新民会”，从中可见这个组织能量之大，诱惑之巨。

宣抚班打着种种充满温情色彩的“宣抚”旗号，企图尽量使沦陷区百姓淡忘对入侵者的敌视和仇恨。日军把宣抚官比作“皇军”的“良妻”。日军桑木本部队的文件上说：“宣抚班的宣传材料，其价值和步兵的弹药相等……务使对民众尽力宣传，不至于有怨恨。”

从1939年开始，日本国内逐渐增多的“宣抚文学”提供了许多有关“宣抚班”的生动报道。华北日寇每占领一个地方，就由宣抚班以演说、



沦陷区 | 一个更复杂的存在



“**1939年初，华北日寇开始“治安肃正建设”，强调“不要满足于一时的宣抚，重点在于永远获得民众”。为此，日伪政权挑选“合格”的教师，选择“合适”的知识，培养反共亲日的一代“新人”。**”

唱歌、演剧以至散传单、办报纸等手法，宣传“日华提携”“共同防共”，来论证日本侵华的“合理性”。日本侵华作家岛崎曙海就用充满诗情画意的笔法描写宣抚班的所作所为：

什么是宣抚班？如果用风来做比喻，它就是春天田野上的微风。微风习习，并非席卷落叶，而是报告春天的消息。如果用微风来比喻，那么，草木就是支那的民众。在急风暴雨式的军队过去之后，宣抚班随后来到支那的村落，和屋前的阳光一起，照到支那的家屋。对在那里生活起居的男女老少，报告春天的到来，劝他们下地耕作，和鸟儿一同歌唱。——这就是宣抚班。……没有我们宣抚班，小草般的民众就不能感觉到春天的到来。（《宣抚班战记》第68页）

华北日军宣抚头目八木沼丈夫也振振有辞地教导宣抚班人员说：“你们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真心诚意。宣抚班必须经此来打破民众由于‘无知’或者‘错误思想’所造成的迷惘。”

❖ “德政”和奴化

日本作家小岛利八郎在其作品《宣抚官》中描写了一个“宣抚演讲”的场面：

诸位，我们是日本军……请看，你们的皮肤

和我们的皮肤有什么不一样吗？你们的眼睛和我们的眼睛有一点不同的地方吗？诸位和我们日本人都是兄弟民族。你们和日本人流着相同的血液。我们日本人希望和你们中国手拉起手来。但是蒋介石一派却抵抗我们。我们没有办法才拿起武器惩罚他们……诸位现在必须和日本军队合作，这是你们的义务，也是你们的幸福……如果有人暗通敌军，日本军队会毫不犹豫地吧铁锤砸在你们头上。怎么样？都听明白了吗？明白了就赶快行动吧！

这个日军宣抚官的演讲就是一份最生动的“自供状”，他们打着“同文同种”“中日亲善”“大东亚共荣圈”的招牌，不择手段地对沦陷区百姓进行欺骗劝诱、恫吓威胁。手无寸铁的中国民众面对日军阴森森的刺刀，大都迫不得已地表示服从。而宣抚班就借此机会大做表面功夫，竭力宣扬日伪政权的“德政”，向他们灌输安分守己做“新民”的奴隶意识，利用沦陷区物质极端困难的情况向他们施以一点小恩小惠：比如给老人一支香烟，给妇女一盒火柴，给小孩一块牛奶糖……

对于宣抚班这种伪善的“德政”，陶铸在1938年的《奴隶们》一文中记录了中国百姓遭受的精神痛苦——他们被强迫去领取“良民证”，“不愿作无谓牺牲的人们，老的，小的，忍痛的从各方走来，向‘武士’‘鞠躬致敬’，有90度的，有120度的，有其他角度的……”随后则是日军组织体检，“宣抚”的本来面目暴露无遗：

男的，女的，把衣裳脱得精光，在大众面前，由‘武士’检验体格。验后，各赏糖果一块。那包糖纸是一张透亮的纸，画上一条犬，舔着糖，拉长着舌头，这是多么恶毒的漫画、辛辣的讽刺哟！

宣抚班拉拢人心的奴化手段很多，除了贴标语、宣传画，发表演讲等方式外，他们还利用沦陷区民众极少看到电影这种“新鲜事物”，走村入寨巡回放映以“宣抚”为目的的所谓“慰安电影”，这些电影以宣传日军“威武神勇”、日本国力强大为主题。日本宣抚官川永濑不逢在《宣抚行》中就得意地记载：“我们拼命地费尽口舌，其效果也不



20世纪30年代末，北京，侵华日军组织的中国小学生应援团在训练。图/吉田润/FOTOE



及如此。”

日军深知，“塑造顺民”应该从青少年的奴化教育抓起。1939年初，华北日寇开始“治安肃正建设”，强调“不要满足于一时的宣抚，重点在于永远获得民众”。为此，日伪政权挑选“合格”的教师，选择“合适”的知识，培养反共亲日的一代“新人”。小岛利八郎在《宣抚官》中记述，宣抚班在江苏宿迁县成立了“宿迁县复兴小学校”，那是一所“日语学校”，由“宣抚官”任教，还培养中国教师作日语教师。小岛写道：“要真正地把日本的伟大精神植根于中国儿童心中，就必须首先牢牢把握与儿童接触最多的（中国）教师的心。”

教科书作为文化控制的重要载体，也遭到日军的全面删改，沦陷后的东北所用课本都以日文为主体。在中小学校，教科书全部由“满洲国文教部”审定，内容全是“皇恩浩荡、王道精神”一类亡国教育。北平沦陷后，由于时间紧迫，日伪来不及颁布新的教科书，当时正读小学的史会对此回忆道：

我和全班同学一样，努力嚙住就要溢出的泪水，沉重地翻动高小国文第三册课本，用黑墨一块块涂掉课本上“中华民族”“精忠报国”和“自强”“奋斗”等字样……还撕掉《岳母刺字》《阎典史》等课文。”（《日伪统治下的北平》第15页）

各地宣抚班大力开办日本控制的学校，对中国青少年进行强力“洗脑”。驻深圳日军的宣抚班不但设立日语学校，还以每人每周发3两米作诱饵，逼迫学生入学。当时许多人家饥寒交迫，只得把孩子送进了日语学校。河北省曲阳县的宣抚班则把一批饥饿的顽童少年组织起来，用日军吃剩的饭菜加以引诱，让他们为日军跑腿做事，称之为“少年吃饭队”，成员达到30多人。对于普通的劳苦大众，宣抚班则伙同“临时政府”和新民会等汉奸机构，发放一些农耕种子、提供粮食救济、实施医疗巡诊等方式笼络人心。

但是，反抗无处不在。宣抚班经常临时雇用

一些地痞、吸毒者充当密探，到各处刺探情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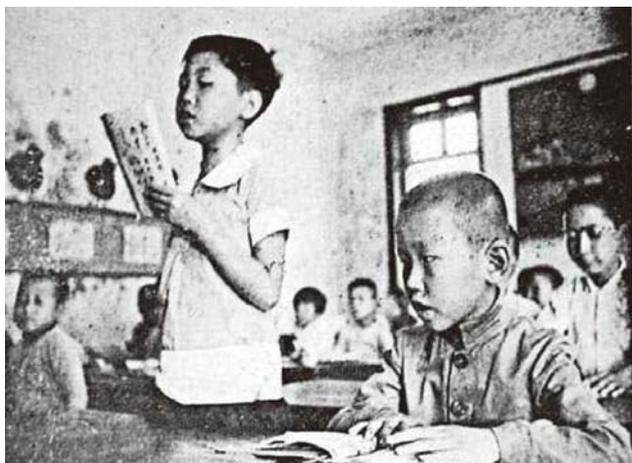
这也给他们提供了假公济私、敲诈勒索的大好机会。他们到处搜捕反满抗日志士，随随便便就能把无辜百姓送入宪兵队。战后，据在山东担任过宣抚官的汉奸张成德回忆，日本人经常抓捕一些无辜百姓，以借口私通“八路”的罪名威逼其“进贡”，交不上来的格杀勿论。

作家易鹰发表于1941年的短篇小说《宣抚》中有这样一个情节：有一天，日本的“宣抚官”来了。他们的真实目的，是四处搜求女人和钱，甚至连白发苍苍的老太婆也不放过：“铃木看看她的面相，觉得实在太老太丑，便取起一件破衣，把沈妈的头部包住，然后实行‘宣抚’。”

何其芳于1939年3月发表的报告文学《日本的人的悲剧》中写道，一个宣抚班的头目假惺惺给某村长斟一杯酒：“八路军，吃你们，喝你们。你喝一杯。”但当发现该村有一个弟弟在八路军游击队，便立即把村长捆起来，强迫他喝下两碗煤油，吃一碗盐巴，跪在太阳底下暴晒；晒了一阵又喝煤油，吃盐巴，又晒；然后斩断他的腿和胳膊，剖开他的肚子……“宣抚班”在中国沦陷区所做的一切，无论是怀柔策略，还是杀人抢劫，只是形式不同，其实质都是一样，那就是对中国人民的残酷压迫和奴役。

❖ 拉锯战

当时，八路军的四处游击，使得日军时刻感到心惊肉跳。宣抚班最初的任务以攻击国民党为主，后来转成污蔑八路军，破坏抗日根据地建设。宣抚班除了搜集情报、监控民众，便是推动所谓“铁路爱护村工作”。凡是铁路两侧10华里以内的村庄，都被划为“爱护村”。他们对村民软硬兼施，扶植伪村长，划分责任区，在铁道边建造“监视小屋”，让村民监视、阻挠抗日武装对铁路的破坏。每天早晨，“爱护村”村长要送一份情报，如没有什么情况，就在条子上写“平安无事”，



并让他们每天都向“宣抚班”汇报铁路运行情况。如稍有松懈，宣抚班便传唤他们，严加惩戒。

宣抚班“七分政治，三分军事”奴化措施曾收效一时。1941年11月1日，彭德怀在《敌寇的治安强化运动下的阴谋与我们的基本任务》的报告中承认：“在割裂我根据地方面，在封锁我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敌人均有了相当的收获。”

中国共产党为了反制日军的宣传封锁，鼓励全民族持久抗战，与日军宣抚班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思想战”。八路军不断总结经验，采取灵活有效的针对性措施，逐渐占据了舆论主动。

抗战初期，八路军的对敌宣传一度滞后于形势的发展。对此，朱德率先使用“宣传战”这一概念，并明确提出必须“在文化运动和宣传战中战胜日本”。针对日寇总是“尽量利用艺术”并“特别注意用中国形式”的艺术进行宣传，朱德认为，既然敌人能“利用它作工具”，那么我们也“应当使它成为我们手中的武器。”

调整宣传策略后的八路军开始占据上风，而“水土不服”的日军为此头痛不已。岛崎曙海在《宣抚班战记》中沮丧地承认：“北支到处都有八路军，他们有一套特异的收买人心的方法，在破坏我们的工作。”在《宣抚班战记》第二章中，岛崎曙

海谈到日方的困惑：

我们拼命想探知八路军收拢人心的手法，但在空空的城内却一筹莫展。仅仅是看抗日传单，或者是审问土民和俘虏，还是不得要领……就是说，敌人让“土民”吃了什么药，我们必须给他们吃解药。但这里又有障碍。就是究竟什么是良药？我们作为外国人，不能了然于心，为此而日夜苦恼，不知过了多少不眠之夜。

双方为此进行了长期的“宣传拉锯战”。日军宣抚班的任务之一就是到街头收集八路军的抗日宣传材料，并依此制定反宣传的策略。每占领了一个地方，他们就把八路军的标语和宣传画涂掉，或者撕下来，换上日军的宣传标语和宣传画，但张贴标语这件事，日本人也输给了八路军。小池秋羊在《北支宣抚行》中描写道，日军宣抚班的传单很大，不便携带，张贴起来也特别费劲。由于纸张质量太好，无论抹多少糨糊，在砖墙上也不易粘合。糨糊一干，就被八路军轻而易举地揭下来扔掉。而八路军因为财政困难，使用的几乎都是粗劣的纸张，反而非常适合张贴。

此外，八路军的宣传标语浅显易懂，还多配以生动的漫画，易于百姓接受。日军每到一处，中国百姓大都弃家出逃，宣抚班就把他们的出逃

01 | 02

01

伪满时期，教师向学生灌输亡国奴思想。图 / 刘炯 / FOTOE

02

1938年夏天，江苏南京沦陷后，日军搞复兴南京政策，中小学开始复课。日军指定专人编写教材，日语为必修课，只能开自然科学学科，不许设中国历史和文化课。对占领区实行双化教育。图 / 吴雍 / FOTOE



原因归结为八路军有效的抗日宣传：

我们在进入阜平县城的时候，看到的抗日文字中有宣传画，那就是日军对妇女钩乳、割乳、打钉子，××后枪杀之类，还有画的是日军在人头盖骨堆旁边持枪挎刀的样子，此类宣传极多。河北省和山西省交界处有一个名叫龙泉关的万里长城的关门，壁画上画的好像是那里的自卫剧团演戏的场面：日本兵拿着剑在追逐妇女，站在一边的孩子哭着喊妈妈。支那妇女被这种宣传吓坏了，我们这次在五台山作战的六个月间，五十岁以下的妇女一个也看不到。（《宣抚班战记》）

在这种情况下，宣抚班首要的事情就是想尽办法让弃家逃难的“土民”们回家，以便接受“宣抚”。但日军的宣传标语常常文句不通，比如“信任日军队暴寒良之善意”（意思或者是“信任日军抱善良之善意”）之类。再如当时日本人认为在对华宣传中经常使用“中日亲善”四个字，将“中”字放在前头是不妥的，这会增加中国人的傲慢心理。于是他们用“支那”一词作宣传，而这样的蔑称又往往激起中国人的强烈反感。

日军宣抚班在与八路军的宣传战中败相毕露。战后由日本防卫厅编写的《华北治安战》一书记述道，1940年秋，日军大本营陆军班在对“中共对敌新闻宣传”做了系统研究后，也不得不承认这种宣传“越来越巧妙”，“宣传材料的收集，是选择既合时机又简单，并且富有刺激性的材料……”

同样的，八路军宣传部门也在不断研究日军的战场心理。他们通过查看日军的信件、日记，与日军俘虏进行交流，发现大部分日军出身贫苦，来华作战多是受了欺骗或是被强制性驱使，天长日久逐渐产生了厌战、怠战情绪，情感也极其脆弱。八路军就会给他们送去樱花图片，上写“远海那边的故乡，樱花正盛开。家中亲人盼你生还，而不是挂着勋章的骨灰盒”的宣传词，日军许多士兵看后伤心落泪，思念家乡的情愫无法自抑。

艺术家徐灵的木刻《日兵之家》则刻画了一位侵华日军士兵的母亲，望着家中的儿媳和孙儿



默默祈祷。这是当时日本许多家庭的真实写照——母亲牵挂儿子、妻子思念丈夫，家中一片凄凉。八路军把《日兵之家》制成许多明信片，装入“慰问袋”中，通过各种渠道向日军广泛散发。结果，日本士兵不仅暗中传看，而且有些人还将其偷偷邮寄回国。

油印宣传画也是八路军的一种宣传方式。其中的一幅油印画对日军的震撼很大：画中一轮明月，月亮中是一位日本妇女，月亮下是一座孤零零的碉堡。碉堡上有一个日本士兵在站岗，旁边写着一行日文：“你从月亮中可以望见心爱的娇妻，她也能从月亮中看到你。”这张宣传漫画令不少日本士兵喟然长叹。有一名日军中佐曾作诗一首，流露了明显的厌战情绪：“百万健儿驱壮马，野战攻城尸作履。愧我何颜见父老，回思未有几人还。”

随着八路军“心理战”的加强，日军逃亡、自杀、投诚事件日益增多。1942年，日军向八路军自动投诚者占7%，到1943年已经上升到48%。

日军高层对此十分恐慌，他们禁止日军士兵接触中国共产党散发的宣传画，但是收效甚微。在日军榆次师团司令部副官会议上，一位高级将领也承认：“因为华军的反战宣传，总觉得士兵的思想似乎在动摇，实在难以指挥。”

可以说，日军宣抚班在侵华战场上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作为日军“笔部队”重要成员的作家杉山平助无奈地说，“中国人的自尊心强大到令人惊叹的地步，在被打得七零八落的时候，从老妈子到下人仆从，尽管表面上恭顺，内心里谁也瞧不起日本人，即使等到黄河水变清的时候，指望支那人从内心里向日本人屈服，那是绝对不可能的。”^①

（本文参考书籍：
王向远：《“笔部队”和侵华战争》，昆仑出版社 2005年6月出版
黄东：《塑造顺民——华北日伪的“国家认同”建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年4月出版
陶虹：《日军炮火下的中国作家》，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6年1月出版）

01

02

03

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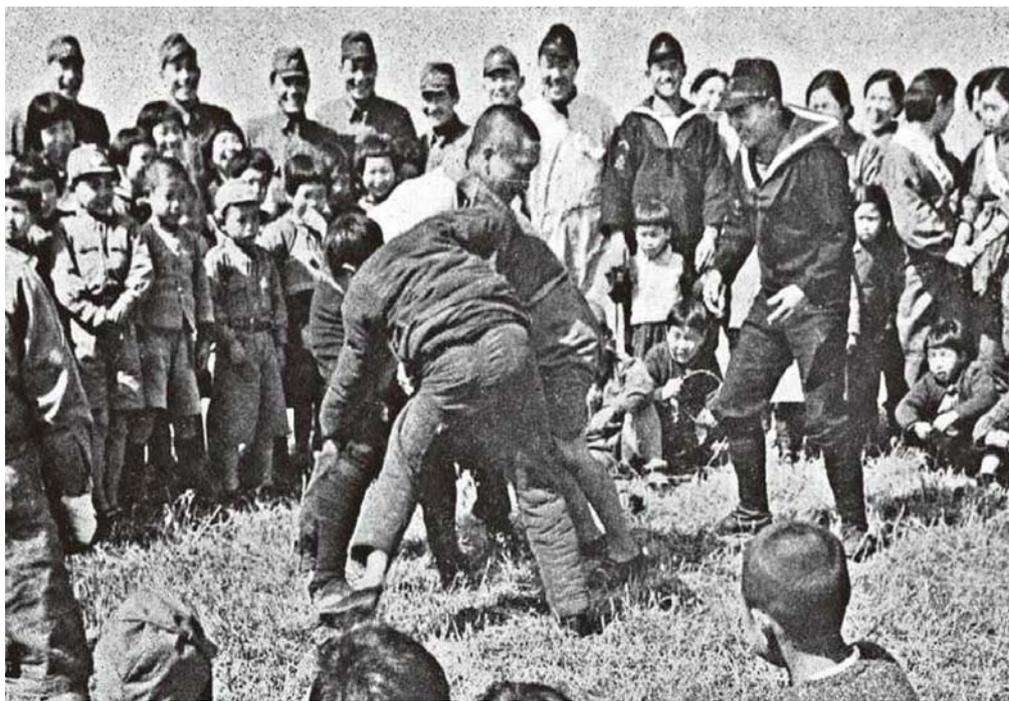
1939年3月10日，山西临汾城外，侵华日军为粉饰太平、鼓吹“东亚共荣”，胁迫老百姓参加所谓“亲善运动会”。图/FOTO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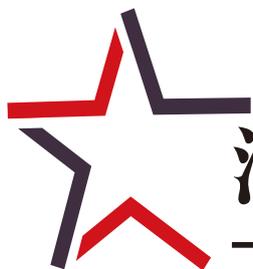
02

1938年2月5日，济南难民收容所，侵华日军的女子“宣抚班”播放音乐，以示“东亚亲善”。图/冈本/FOTOE

03

抗战时期，侵华日本海军宣抚班，为鼓吹“中日友好”、粉饰太平，组织中国儿童与战士玩摔跤。图/FOTOE





沦陷区之光

一本杂志的反抗和风骨

文 | 黄小凡

文章内容频频被日伪恶意删或故意扣押，这几乎断绝了以字为生的文人的生机，很多文人为病饿所困，面临着严重的物质与精神的双重生存危机。《万象》就是在如此困境中，成为进步爱国作家的堡垒掩体。

在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偷袭击了美国珍珠港基地，同时击沉了停泊在上海黄浦江上的英国炮艇，迅速全面占领了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都沦入日本之手，上海处于全面沦陷状态。

❖ 一篇让人琢磨的文章

实际上，日本在1937年11月淞沪会战后即占领上海，但是租界却是一块“孤岛”。租界本身是英美法等国侵略中国的结果，对中国人来说，这并不是愉快的回忆，所谓“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就发生在租界的公园内。但是在日本占领上海后，这块孤岛，又成为抗日志士的栖身之地，很多影视作品都表达过这一点。日本在全面占领上海后，于1943年8月1日全面进驻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进行了所谓的“交接”，并把这一日定为所谓的中国人民“收回”租界的“解放日”，并强行命令全上海各报纸杂志都要发表专论以示庆祝，以制造“上海解放”的假象，将自己装扮为“解放者”。

对中国人来说，这是双重的侮辱。对上海的

报纸和杂志来说，这是侮辱，又是一道难题。1943年9月3日的《万象》第3年第2期，是这样表达的：在丰子恺的一幅漫画《翠拂行人首》旁，有一篇毫无关联性的短文，很明显是临时插进去的。文章的标题是《可纪念的一日》，内容如下：

民国三十二年八月一日是一个可纪念的日子。
它值得我们的深思，感奋！

外人统治了百年的上海租借地，今日终告收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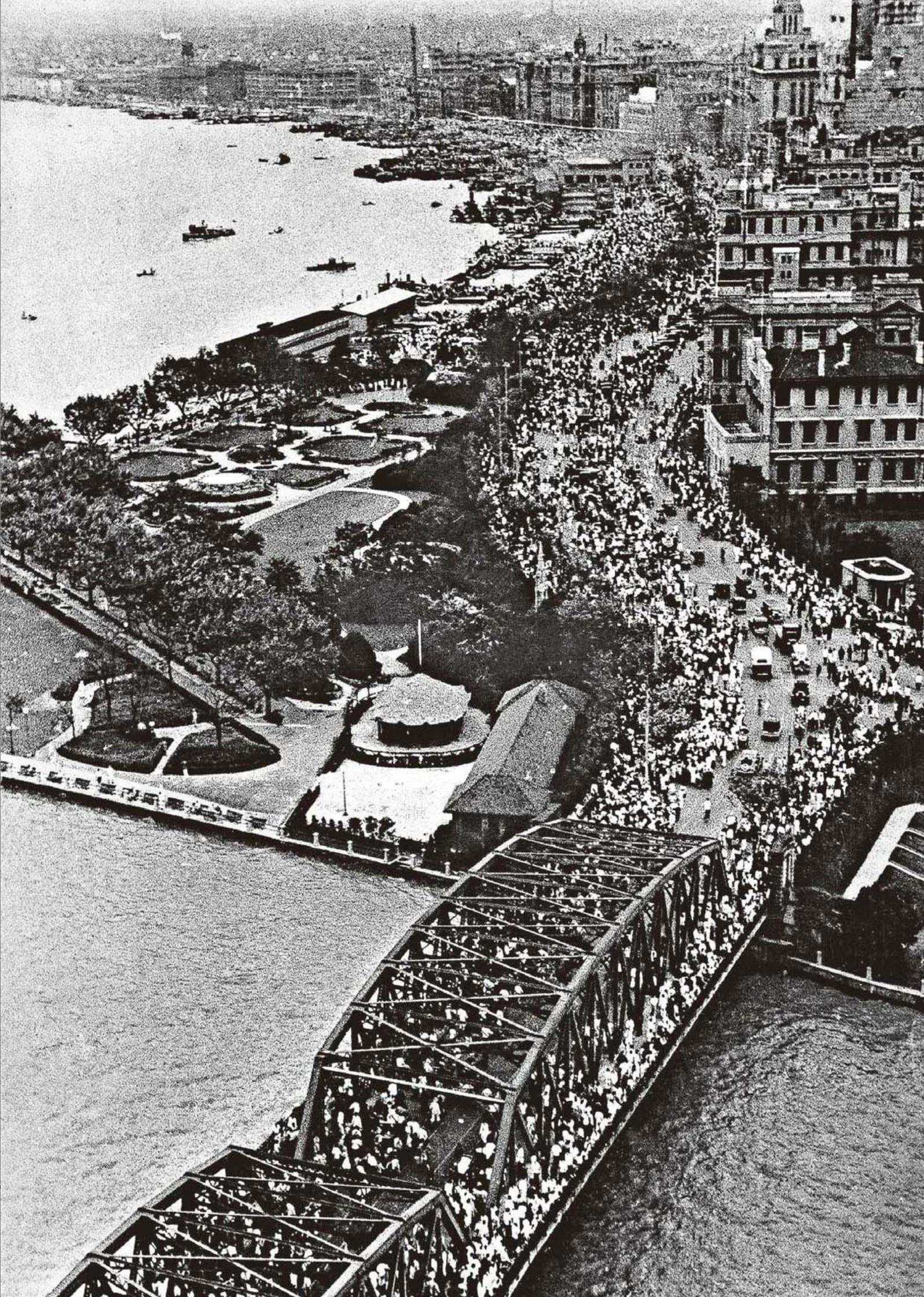
我们知道租界是一种特殊的存在，它在中国的版图以内，主权却不属于中国，它是帝国主义在华的殖民地。它几乎成为一切罪恶的渊藪，种种黑暗，罄竹难书！

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中国的土地，主权当然是属于中国，毫无疑义，然因中国历年积弱，卧榻之旁竟容他人酣睡，这是多么可悲，可痛！今日收回租界，当然值得警惕！庆祝！

独立、自主，领土完整，是中国近年奋斗的目标。可喜此种目标逐步达到，光明不远，值得吾人奋发，共同努力，卒底于成。

民国三十二年八月一日是一个可纪念的日

 1937年，抗日战争期间，上海百老汇路（今东大名路）上的难民经外白渡桥涌向租界避难。随着日本人对城市控制的加强，上海租界逐渐失控，外侨自身的安全也将无法保障。图/FOTOE





子！它值得我们深思、感奋！

这是一篇必须完成的“作文”，但并没有强调“解放”的喜悦，相反，它曲折地表达了沉痛。它强调中国人需要的是真正的独立自主，对读者来说，这样的意思完全可以领会。但是在表面上看，它也近乎达到了日本人的“要求”。这样一篇文章，是整个上海沦陷区文化的写照：必须在日本人的强制审查之下，但是却又坚守着民族底线。尽管委婉曲折，但仍然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反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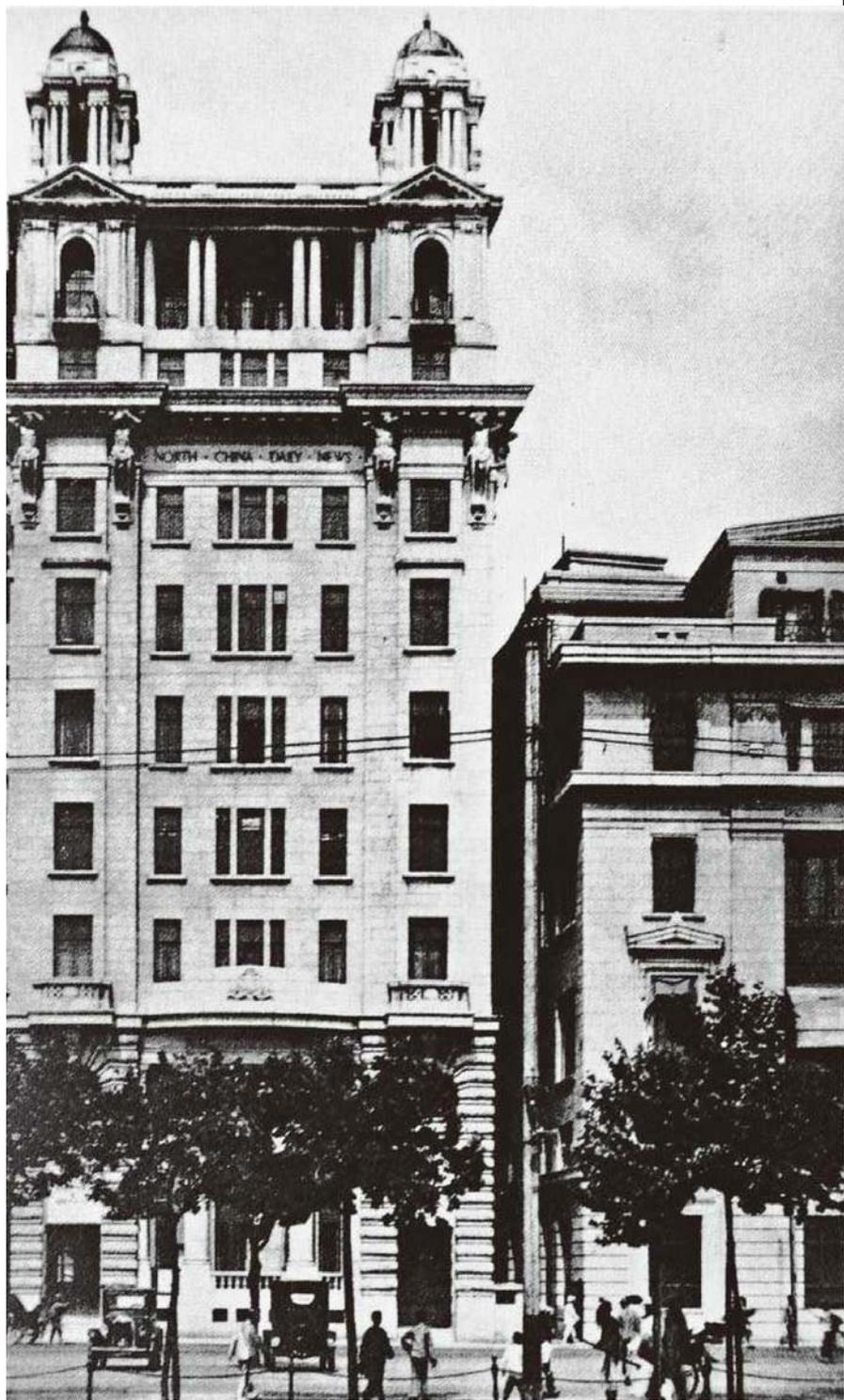
写这篇文章的，是《万象》的主编柯灵。

❖ 两种管制手段：日伪的文化控制

在日伪政权对上海沦陷区的全面思想文化控制中，舆论控制是关键的一环。他们对杂志出版实行了“强化战时出版体制”政策，所谓体制强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出版、文化事业管制的强化，而是对所谓“合理”的出版事业要尽力扶持。这就是两手，“严厉管制”和“大量制造”。

所谓严厉管制，就是要彻底肃清中国人的抗日民族意识，全面控制报纸杂志。在日本的指使下，汪伪政府先后制定了《出版法》《出版法施行细则》等，规定凡是违规内容一律查禁。凡是不利于“中日亲善、中日提携”“诽谤南京政府”的，都被视为违规。另外，还施行出版申请登记制，在县城出版发行的，要经过省政府核准，而在省城发行的，则要经过汪伪政府宣传部核准。不许直接发行散布，如果违反，发行人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而所谓的“大量制造”，就是用数量来战胜质量的政策。他们不断制造麻醉中国人的大批有毒文件，也制造欺骗自己军队的读物。在很多小型汉奸报上，日本人特别喜欢利用“春宫画”“裸体照片”来吸引读者，“嫖经”“三个女性谈性与艺术”这种类型的标题也经常见到。这种对低级色情文学的散布，其实别有用心，他们认为这样能够危害和麻醉青少年的反抗意识。在发行方





日伪政权对春宫画、裸体照片等低级色情文学的散布，其实别有用心，他们认为这样能够危害和麻醉沦陷区青少年的反抗意识。



式上，日本人采用摊派的办法，汉奸常常拿着刊物按户征订，如不订，往往说“这是上面日本人的命令，不订要吃官司”云云。

这样的“两手”，其实就是镇压和利诱，面对这样的局面，文化人的分化是必然的。出卖自身的“失节文化人”，被称为“汉奸”“落水分子”，为了保障身份和名誉及富有的生活，他们在日伪政权的庇护下，大力宣传日伪政权意识形态“和平”和“反共”思想以及“大东亚共荣圈的东亚文化意识”。

但是，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仍然有不顾危险坚持正义和自由以及民族解放的文化人。他们处于不自由的状态，有的被逮捕，并遭受到酷刑。其中，许广平被上海日本宪兵逮捕引起了文化界的紧张。

作为鲁迅夫人的许广平，于1941年12月15日凌晨5时被逮捕，这象征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文化界开始毫不客气地镇压，其程度将达到极点。最初，文化界人士尚怀有“日本人对鲁迅先生也很尊重，绝对不会对许广平怎么样”这样的希望，但是这种希望随即完全破灭了。文化界的进步人士们认识到，必须采取更智慧的斗争，不

能直接冲进去碰撞帝国主义的墙壁。许广平被捕的消息传出来后，许多文化人都隐藏起来，准备避难后继续做抗日文化工作。

在日伪控制的文学空间里，有良知的文化人为了争取文化阵地，选择了两条路，一种是在与日伪无关的纯粹文学杂志里写作，这些杂志表面上追求“永久人性”，描写日常生活，与现实政治保持一定距离，日伪政权没有理由停刊禁止，这样所谓纯文学的商业性杂志有《大众》《紫罗兰》等。另一种是中共上海地下党暗中组织、经营的报纸杂志，如袁殊等人复刊的《杂志》，表面上是以日本驻沪领事馆作为背景，实际上，杂志的主要领导人袁殊、鲁风、吴诚之等均为中共地下党员。

留居在上海的文人，经济生活大多都是非常困苦的。战时的生活是畸形的，囤货商人可以赚大钱，唯有文化事业一落千丈，尤其与日伪政权无关的出版文化事业更陷于窘困。除了汉奸文人外，日伪政权对待文人作品都采用了严格的检查。在这样的趋势下，进步文化人的作品被禁止出版，出版的刊物也经常被禁止发行。恶意删削和故意扣押，几乎断绝了以字为生的文人的生机，很多人因为饥饿与疾病所困，面临着严重的物质与精神的双重生存危机。

作家石灵的生活环境是这样的：“那间阁楼似的小房子，吱吱作响的楼梯和楼板，面色憔悴的妻子和病弱的孩子们。环境险恶、工作繁重、睡眠不足、营养不良……”著名通俗小说家孙了红患了咳血症，没有钱治疗，《万象》只得发布病情危急的消息，求助于广大读者。

《万象》甚至发表过一篇《作家、贫病、死亡》的文章，介绍了几位作家因疾病和贫穷死亡的情况。可以说，沦陷区的作家，有很多挣扎于吐血、饥饿和极度营养不良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不与日伪合作，本身就是一种坚强的抵抗。

◆ 柯灵与《万象》的风骨



20世纪初期，上海字林西报大楼。《字林西报》的前身是英文《北华捷报》，创刊于1850年8月30日，为中国境内第一份新闻报纸。《字林西报》逐渐成为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喉舌，反应英国对华政策，评述中国政局，因此对中国的态度，在不同时期多有变化。日本侵华初期，该报的报道采取纯客观的态度。后见日本军队逐渐伸向华北，并指向南方，严重威胁英国的在华利益，则转向同情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抗战期间，曾刊登不少日军残杀无辜中国百姓的报道。上海在“孤岛”时期，该报与其他的抗日报纸一样，也受到日伪特务的威胁、恫吓。图/吴雍/FOTOE



沦陷区 | 一个更复杂的存在

沦陷区的杂志，《万象》是最成功的，也是最不同的。它是商业性刊物，但又比商业性刊物更靠近政治，更有锋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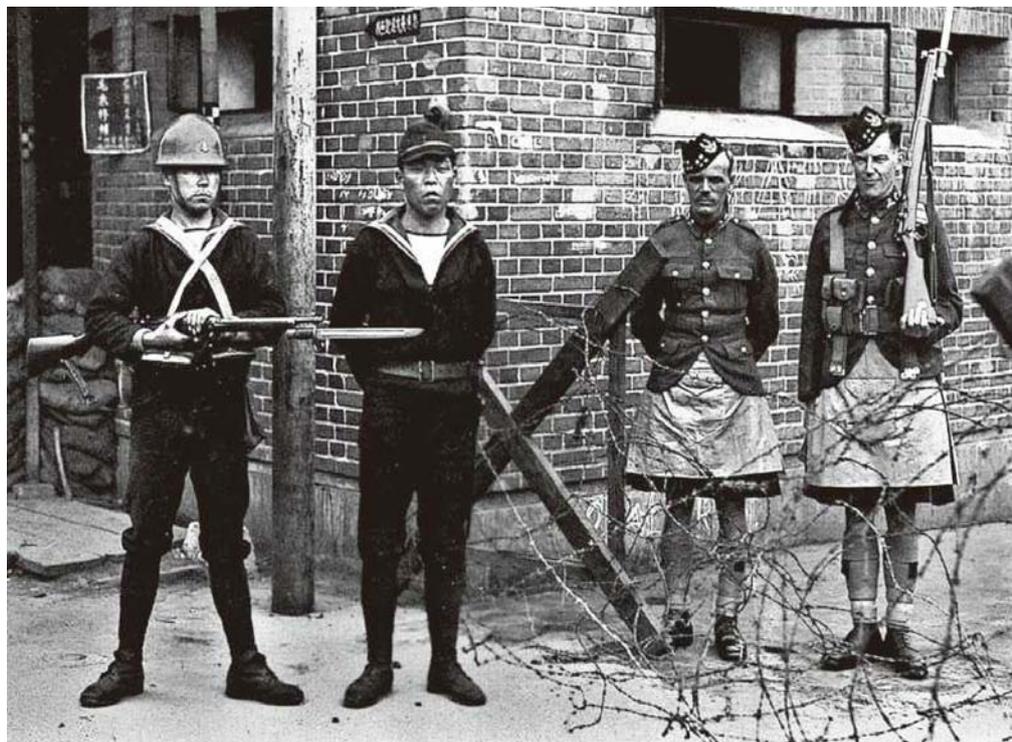
1941年7月《万象》在上海沦陷区创刊，正是上海文化空前萧条，出版界空前沉寂的时候。《万象》第一任主编陈蝶衣在回忆这段历史时，不无自豪地说：“上海出版界的沉寂空气，是由本刊的问世打破的。”陈蝶衣说，《万象》是为文化“尽一点力”而创办的，是为“保守既成的基业”而发行的，这是一次“带有自觉的抵抗意识的文化实践”。《万象》编辑部，在最初就有一种文化使命感。但是，他们也准备小心翼翼地把使命感限制在文化领域，为读者提供“精神食粮”，满足青年读者的求知欲。

到了第二任主编柯灵，就不满足于此了。“在日伪对新闻出版的严密控制下，享有相对的自由，还可以为抗战文化迂回曲折地做点工作，起点作

用，可以说是一种无形的示威”，因此，《万象》可以作为一个阵地，“使五四以来的进步文化运动，即使在日本侵略者的刀尖底下，也能够维系而不致中断。”《万象》在柯灵的主持下，成为进步爱国作家的堡垒掩体，继续培植和保护了一批有才华有影响的沦陷区新老作家。

柯灵(1909.2.15—2000.6.19)，原名高季琳，笔名朱梵、宋约。原籍浙江绍兴，生于广州。中国电影理论家、剧作家、评论家。1926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妇女杂志》上发表第一篇作品——叙事诗《织布的女人》而步入文坛。1943年7月柯灵编辑《万象》，至1945年6月停刊（本年仅出这一期），前后共43期，另有号外一期，几乎贯穿了上海沦陷的整个时期。

作为一个有独立追求的编辑，柯灵将《万象》打上了自己的烙印，他的底线是“坚决不让卖身投敌的文人在《万象》占领一个字”。作为一个



1937年，上海公共租界，铁丝网将日军与中立的英军隔开。随着日本人不断加强上海的控制，他们的军队也深入到了公共租界。图/张才/FOTOE

左翼文人，柯灵的主要作者当然是共产党影响下的进步作家。但是，当时鸳鸯蝴蝶派（以写爱情为主，与左翼进步文学疏远）中许多文人，在沦陷区都保持了民族气节。《万象》前期，这些作家都是其作者，柯灵任主编后，仍然团结了这些人。

和别的杂志一样，《万象》也遭到日伪政权的审查。特别是上文提到的由柯灵主笔的《可纪念的一日》发表后，日伪政权觉察到柯灵和《万象》“笑里藏刀”的意味，从此对《万象》更加“刮目相看”，加强了对杂志的审查，《万象》也因此不断被开天窗，被打上许多 xxx。读者读不懂，看也看不明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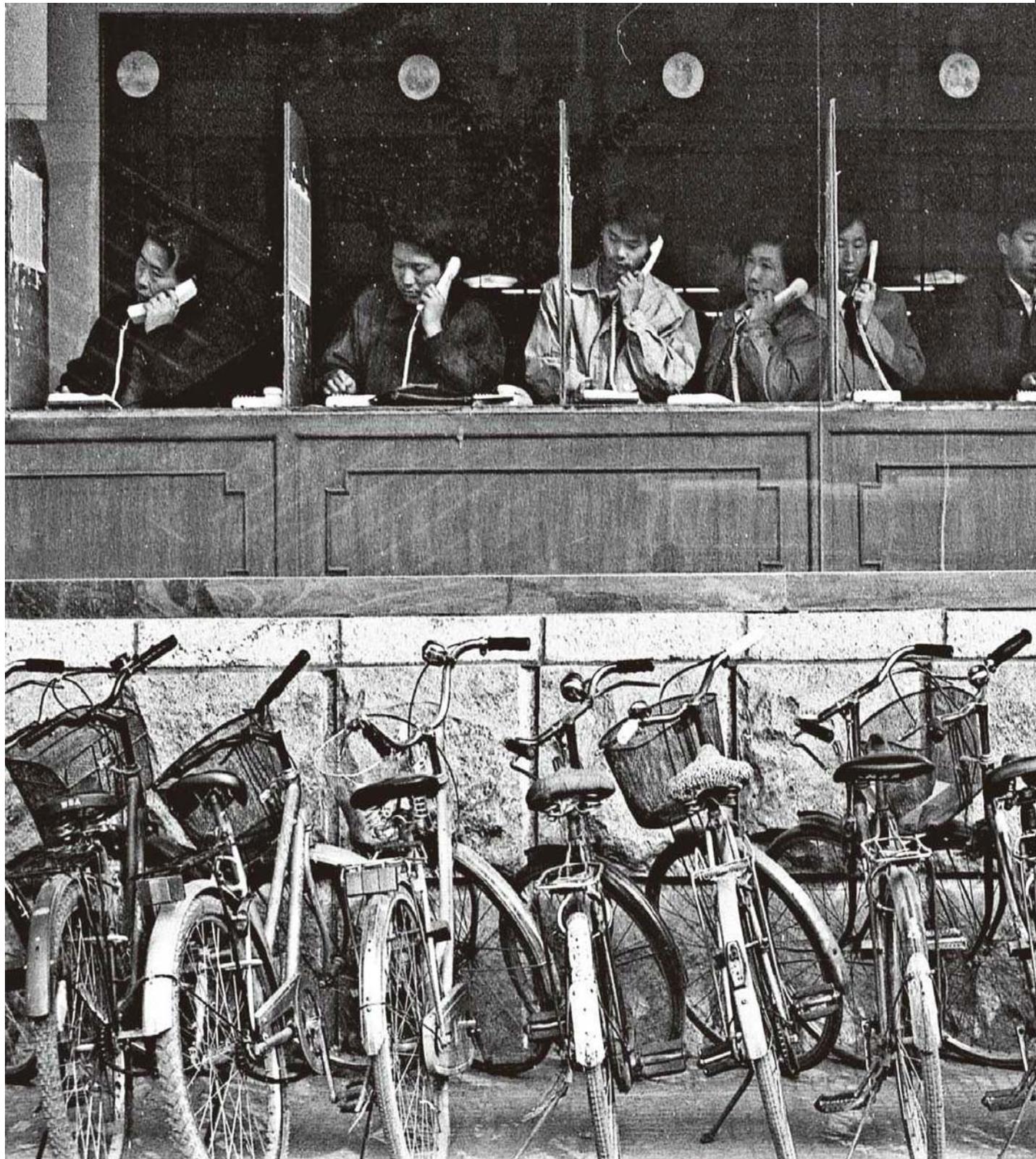
比如有篇文章叫《大荒天》，作者叙述大荒天的残酷，慨叹“大荒天，绝望的大荒天”之后，后面是数十个 xxx。如今读起来，我们根本不知道作者写的内容，只能猜测到可能是在描写饥饿的惨景，或许谈到了当时的现实，但这显然让检查官不快，

就被直接删除了事。柯灵自己则谈到，《万象》因为被检查和印刷等问题，从第三年第7期开始变得粗劣，有时内容和预告不符，因为预告有的内容，直接被抽调了，有时页码也有残缺。从杂志和阅读的角度看，这当然是很大的损失，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正是这些“残缺”，见证了日伪政权残害文化的历史。

这种频繁的删节，从另一个角度看，证明了《万象》从未被日伪政权驯服，甚至表明了反抗越来越激烈。1944年及1945年夏，柯灵两次被日本宪兵逮捕，后经营救脱险。考虑到自己的被捕会连累杂志，柯灵辞去了《万象》主编的任务。1948年，他到香港《文汇报》工作，担任副社长兼副总编辑。1949年回到上海，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曾任《文汇报》副社长兼副总编、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所长、上海电影艺术研究所所长、《大众电影》主编、上海作协书记处书记、上海影协常务副主席等职。①



① 1943年，上海，群众在宣传栏前观看“收回上海租界之先声”。1943年2月23日，法国维希政府宣布，同意放弃在华租界。6月5日，汪精卫政权先收回天津法租界、汉口法租界和广州法租界。6月30日，日本驻汪伪政权大使谷正之与褚民谊签订收回上海公共租界协议时商定，上海法租界与公共租界将同时收回。7月30日，收回上海法租界，改称第八区。历时近百年的上海法租界宣告结束。8月1日，收回上海公共租界。图/张才/FOTOF



热历史

Hot
History

中国股市30年

热历史版块编辑：黄弋
邮箱：klsbjhy@163.com

回 顾新中国股票交易历史，最早追溯到1984年。那一年，上海飞乐音响向社会发行1万股，每股50元，成为新中国第一只公开发行的股票。1986年纽约证交所董事长约翰·范尔霖访华时，邓小平还将一股飞乐音响股票作为回赠礼品赠给范尔霖。

第一个证券柜台交易点也在上海诞生，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证券业务部成为了全国第一个证券业务部。1990年3月，政府允许上海、深圳两地试点公开发行股票，两地分别颁布了有关股票发行和交易的管理办法。1990年底，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分别成立，深证指数和上证指数从此成为股民们最关心的数字。

今年上半年，股市成交量屡创新高，中国证监会拿出统计数据表示，截至5月底，中国股市市值已经超过10万亿美元。沪市也成为仅次于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股票交易所的世界第三大股市。然而，短短一月之后，持续了一年多的高涨的股市遭到重挫，开始一路下滑，未来发展如何，仍有待观察。

相比于西方许多国家，中国的股市发展时间并不长，仅有30年的历史。虽然“中国是一个经济巨人，但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无论是中国的公司、市场或是股民都还需要时间成长，强大的股市只有慢慢生长，方才成熟。

通过下面这组图片，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新中国股市那些难忘的历史瞬间。①

① 1997年11月7日，济南市经四路华夏证券有限公司营业厅，人们使用电话委托证券交易。
图/FOTOE





01	04
02	
03	

01

1991年，深圳，新中国最早的证券交易所之一。
图/宋布军/FOTOE

02

1995年，广州，证券营业部外关注股价的股民们。
图/安哥/FOTO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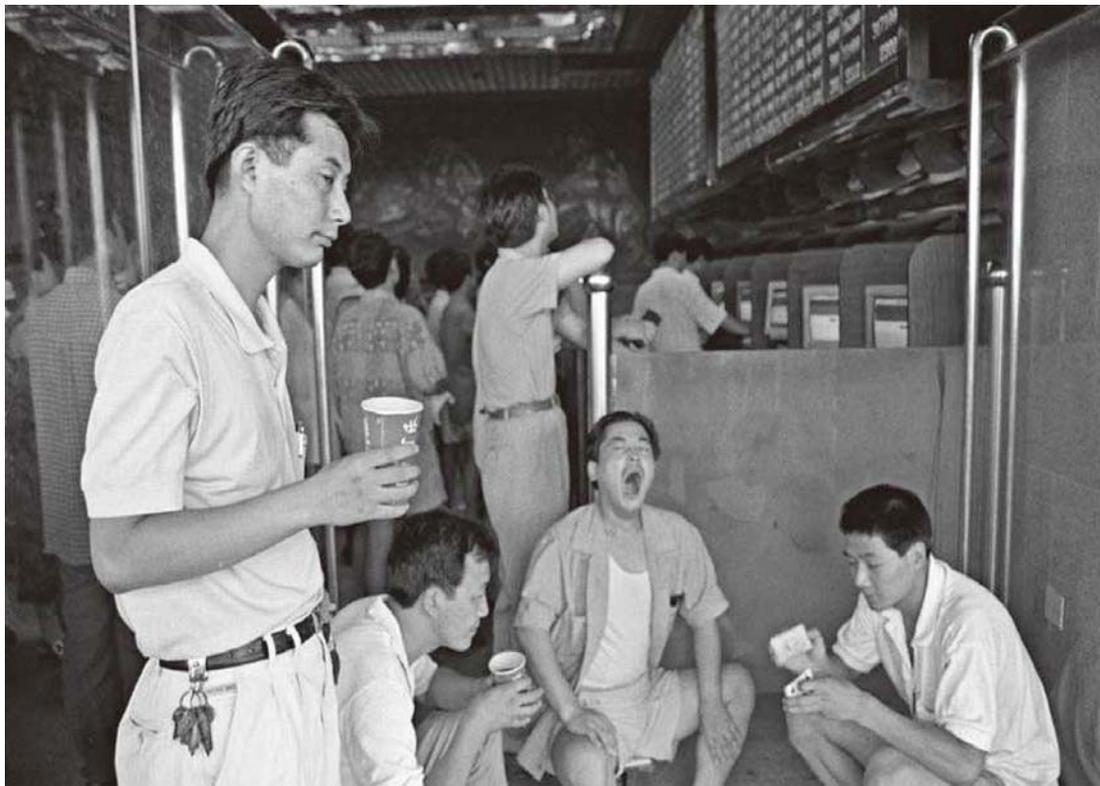
03

1994年3月27日，北京，证券营业部外认真看着
股票发行办法解答的人们。图/FOTOE

04

1992年8月9日，深圳发售新股认购表格，引得全
国各地的百姓蜂拥而至。一位便衣警察不得不用竹棍
来维持秩序。图/宋布军/FOTOE







01	03
02	

01

2002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厅内景。图/李江松/FOTOE

02

1997年，陕西西安，股市不景气时期在证券交易所内闲坐喝饮料的股民。图/胡武功/FOTOE

03

20世纪80年代，北京的证券交易所。图/黄小兵/FOTOE

袍哥江湖

文 | 张嘉友

在民国时期的四川地区，军阀混战，土匪猖獗，袍哥横行。曾是中国民间三大帮会组织之一的袍哥会的势力几乎渗透到川渝地区的各个领域，与这个地方的命运息息相关。



从秘密组织到煊赫帮会

由于四川袍哥长期以来是个比较秘密的地方社会组织，保留下来的第一手文献资料不多，到目前为止我们对它的了解还非常有限。四川袍哥起源于何时，系何人建立，其目的何在，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袍哥”是四川方言，就是哥老会在四川的别称，早时称汉流（留），到了晚清四川官方文件上称江湖会、孝义会。其他还有袍儿哥、光棍、嗨皮、袍皮等一些在社会上比较流行的称呼。

四川袍哥的起源有各种说法，大致有五种。一是诗经说。《诗经》中有“岂曰无衣，与子同袍”之句，袍与胞谐音，表示有如同胞之兄弟。二是

民国“川军三雄”（右刘文辉、中杨森、左邓锡侯）合影，三人也是四川袍哥中的代表人物。图/FOTOE

“汉留”说（即“汉流”，民间又称“嗨皮”）。得名于《三国演义》中关羽在曹营留旧袍之故事，意指入会者誓不事清，奉汉反满之心。三是“咽喉说”。“咽喉”是四川人对于游民盗窃团伙的俗称，是指以清初入川移民中的未能安家垦地的游民为主要成员形成的武装团伙。四是“创自郑成功说”，相传袍哥会是清初郑成功领导的反清复明组织“洪门”的一个分支。约在康、雍、乾（1662年-1795年）年间，随湖广、闽、粤、赣移民传入四川。五是“反清复明”说。指袍哥会是在道光咸丰年间秘密社会大融合的背景下逐渐形成的，同时受到天地会、青莲教、江湖会和白莲教较多影响。

四川袍哥在四川地区为何存续了长达百年时间之久？这与四川在满清与民国时期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地域等背景是密不可分的。清末的革命党人利用过袍哥会组织，在辛亥革命前夕的四川保路运动中对加速推翻满清政府起到一些作用。知名人士杨沧白、向楚、熊克武等都加入过袍哥会。民国建立后，特别是尹昌衡当了四川省大都督后，首先成立了“大汉公”，自认“龙头大爷”，把牌子挂在都督府大门前，其军政府被人斥为“哥老政府”。后来熊克武、周骏等人也都曾利用袍哥会力量来增强自己争权夺利的实力。各地方头面人物更是利用袍哥会组织来笼络更多的人，以丰满自己的羽翼。这样一来，袍哥会便堂而皇之地得到当时政府的提倡和保护，也得到下层人士的响应和效尤，因此参加袍哥会曾经成为一种社会风气，袍哥会组织也就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和壮大起来。

民国初年，由于袍哥会组织内部比较严谨，宣扬大义，属于带有爱国民主思想的社会组织，成为了推翻封建统治、建立民国的一支强大民众队伍，在护国倒袁、反对杂捐苛政以及反对外来势力等方面都起过一些进步作用。但在1917年防区制（省政府将各县市的武装力量、行政和财政权力，全部交给驻军，驻军在该地区可以自行委派官吏，自行收税，自行扩编部队，而省政府视为合法）以后，四川军阀拥兵自固，割占地盘，



袍哥组织在四川存在了100多年，成为一股巨大的社会潜势力。四川袍哥相当普遍地存在于四川社会各阶层，无论城市或乡村，各行各业，均为袍哥所渗透。



自成派系，互争雄长，混战不已。军阀四川井研人熊克武、四川大邑人刘湘、刘文辉、四川简阳人田颂尧、四川营山人邓锡侯、四川广安人杨森、四川蒲江人李家钰等人在割据混战中都利用袍哥会扩大自己的武装和势力范围，而形成军、匪、袍哥会三位一体的局面。

乱世中，有钱有势的人到处买枪买炮，成立团队，防匪保家。袍哥会中人则成了团丁或直接参加土匪、兵匪勾结，糜烂地方。有的土匪一旦被军阀招安，便成为某某军的师长、旅长，甚至团长，如范海廷、喻海清、陈兰亭、杨春芳、魏甫臣都是以袍哥会、土匪身份一跃而上军阀。因此，很多人便把加入袍哥会作为升官发财的一条捷径。另一方面，袍哥会亦是充分利用军阀、官僚作为靠山、护身符，互相利用。到了民国中后期，大多数的袍哥会组织与军阀、官僚以及本地的封建势力串通一气，为反动政权所利用。

袍哥会中都有一些什么人

袍哥会在清代的四川曾经是少部分人的秘密组织，自辛亥革命之后，参加袍哥的人员十分复杂，从事的职业以农民、自由职业者、小手工业者和小商人为主，会众主要包括移民和流民，也包括军阀、土匪和教民。

袍哥组织在四川存在了100多年，成为一股巨大的社会潜势力。四川袍哥相当普遍地存在于四川社会各阶层，无论城市或乡村，各行各业，均为袍哥所渗透。据有关部门1949年的统计，全川人口中有袍哥身份者在70%以上，职业和半职业袍哥有1700万人。成都有袍哥公口、分社、支社1000多个，重庆有500多个。重庆的袍哥人数占其全市人口70%-80%，专职当袍哥的估计有将近10万人。四川袍哥组织势力之大，人数之多，在当时中国会党中是少有的。

四川的土匪几乎都参加了袍哥组织，但是参加了袍哥组织的人并不都是土匪，因为袍哥分“清水”和“浑水”，“浑水”袍哥才是职业土匪，“清水”袍哥则一般不干违法乱纪的事。

四川袍哥的组织内幕

袍哥会组织的名称各地不一,初期通称为“公”或“堂”。民国初年《临时约法》订有“结社自由”,遂改成为“社”或“公社”。其办公处所,俗称“码头”。四川哥老会分五个堂口,即仁、义、礼、智、信。堂口有班辈之分。袍哥的组织,分为十牌(又称十杆旗)。有人说是:仁义礼智信威德福至宣,另有一说是:仁义礼智信松柏一枝梅。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地区,仁字号居多;以重庆为中心的川东地区,义字号居多。四川俗话说:“仁字号旗士庶绅商,义字号旗买卖客商,礼字号旗耍刀弄枪”,可见各字号之间,成员的来源、职业和所属阶层有所区别。袍哥会各个字号之间互争高下,以致同一地区的袍哥组织常见内斗。有时,同一地区、不同堂口的有声望的领头人会联合起来,组成大联合形式的“会口”,又称“合会”,用以互相联系,协调行动,调处纠纷。

四川袍哥会接收新成员加入称为“开香堂”。申请加入袍哥组织的人,必须要有“引,保,承,恩”四大拜兄认可的手续,才能举行“开香堂”的仪式。参加人必须是“身家清白,己事明了”,“没有夹灰卷口”即三代人没有红疤黑迹,没有做任何坏事,为清廷做事的人不得加入。

仪式开始时,先由总舵把子向关公等神像叩头,然后由其他舵把子依排行叩头,再由执事大哥坐在当中,其他兄弟站立两旁,管事宣布仪式开始后,要做五堂法事。第一是访山,介绍历代讲义气如三国瓦岗水浒人物的英雄事迹。第二是团江,用袍哥黑话介绍五排以上的袍哥彼此认识。第三是斩鸡公给新入会者滴血。第四是宣誓,参加人要当众发誓谓兄弟如有三心二意,违规乱纪,“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第五是出山,仪式结束。开香堂是袍哥会的重要仪式,由全公口执事大哥拈香拜把。新入会者向五排以上的拜兄一一叩拜礼表示谢恩,然后由“恩”字号拜兄赏赐排座。在排位方面,一般新进人员均称“么大”。通常,有权有势有地位的人可破格一步登上大爷或三爷

排位。这种情况叫“上山插柳”。入会后,“么大”还要照例给四大拜兄送礼酬谢,同时向公口缴纳入会金,再通告本码头各公口,经过“仁义礼智信”各堂口人的认可后,这样才是真正的袍哥成员。

按照天地会秘籍《海底》传承下来的一些会内组织章程,袍哥会经过改造创造出新的“内八堂”“外八堂”制度,有严格的等级之分。根据《汉留史》和《汉留全史》的记载,四川袍哥各堂口皆下设“内八堂”和“外八堂”。

“内八堂”为“龙、盟、香、佐、陪、刑、执、礼”。它是袍哥会公口的领导核心,主持开香堂、做方首、发会票等重大的会务。大公口按常例可设十二位大爷,分别担任:

香长:又称山主,是堂口最高负责人。

总座:又称舵把子、龙头,是日常事务负责人。

正印:又称副舵把子,副龙头,协办堂口事务。

座堂:为内八堂首席执事,掌人事升迁。

盟证:堂口盟誓的监察者。

陪堂:掌堂口经济。

元堂:掌堂口的印章、印信。

执堂:管堂口内部事务。

副堂:管交际、迎宾。

礼堂:管司仪。

刑堂:管执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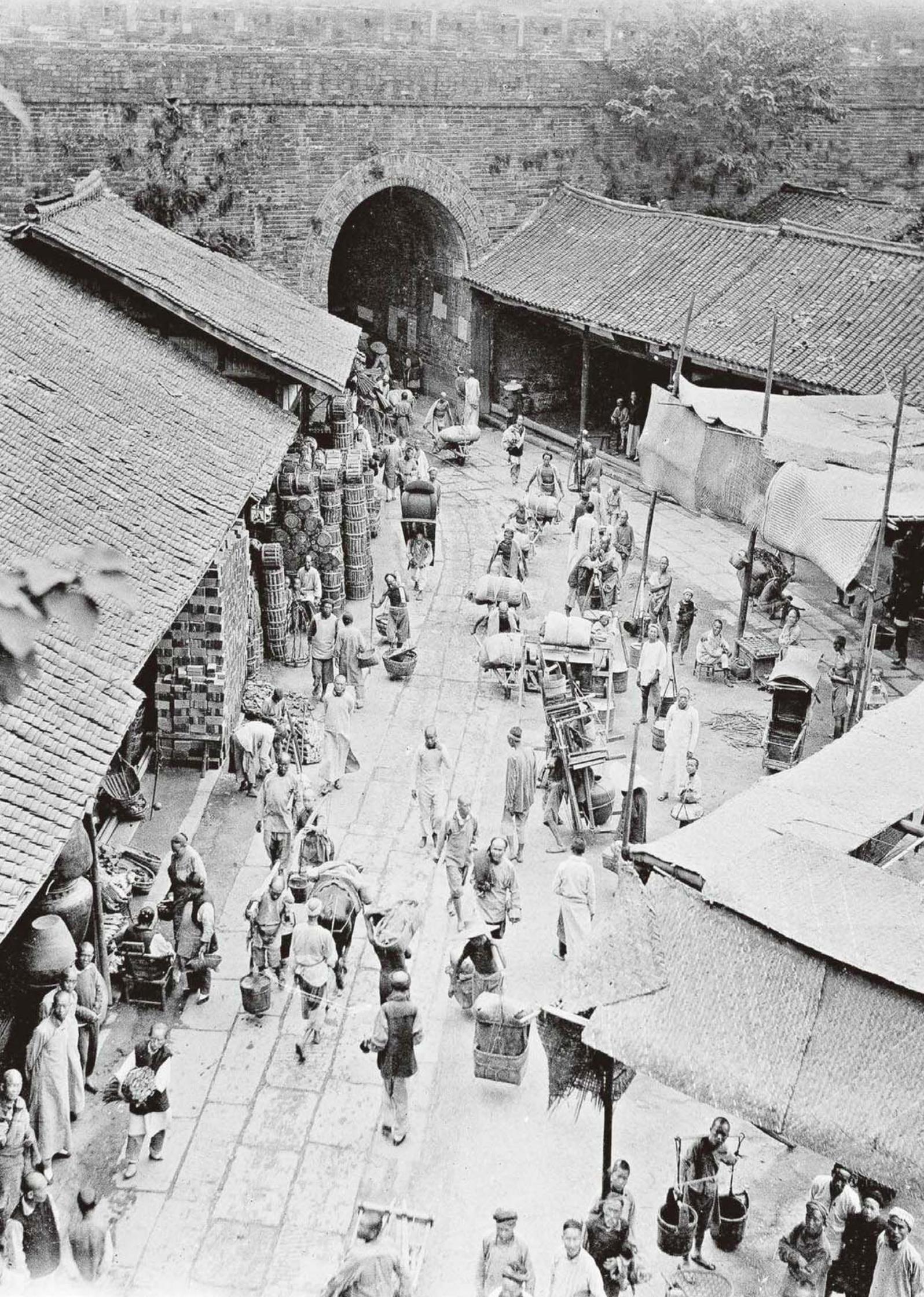
新一:协办堂口临时指派的事务,递补以上正职的空缺,亦称“通城么满”。

以上除香长、盟证、总座、正印外,其余八部,分掌八堂事务。其职位由总座提名,通过香长任命。

“外八堂”是内八堂领导下的组织机构,它有十个序列,称为十牌(也叫“十排”“十步”)。但因为袍哥会中避忌数字“四”和“七”,故无四牌、七牌,实际上只有八排:

行一,牌把大爷。分山主或社长。升到这一步,称为“出山”。当大爷的要入会时间长,从“么大”一步一步升上去。如果有功,也可以越级上升。还有一种有权有势的人,或是捐了大钱的人,虽然是初入会,却可以马上当大爷,这叫做“一步

民国时期,四川成都
北门大街。图/西德
尼·甘博(Sidney
Gamble)/FOTOE



升天”。大爷是以资格而论，在一个公口内，有多少定多少，不受数目限制。根据是《海底》说：“嗨大爷要效那昭烈刘姓，汉天子拜皇叔认为宗亲。”

行二，圣贤二爷。设一人，推选品端学粹、谨言慎行的人担任。通常仅为受人尊敬的闲散位置，他唯一的职务是在开会时敬神，由关二爷传承而来。根据是《海底》说：“嗨二爷要效那圣贤一样，在曹营保皇嫂一片热肠。”

行三，桓侯三爷，管钱粮、人事，故内部称为“当家”。上承舵把子的旨意，下督率管事办理事务。设二人，推选恩威兼具、品学兼优的担任。根据是《海底》说：“嗨三爷要效那翼德张姓，长坂坡吓退百万雄兵。”

行五，即管事，有承行、执行、红旗、黑旗、迎宾等各类管事，分掌承上启下、执法讯问、办理交际、调处纷争等职。是公口的关键性人物，上辅拜兄，下管拜弟，内管开山设堂、人事调迁、功过赏罚，外管迎宾赴会、访友、解决纠纷、协调地方关系等。故有“内事不明问当家，外事不明问管事”之说。根据是《海底》说：“嗨五爷要效那单氏雄信，为朋友日用黄金夜用斗银。”

行六，称巡风、护律，又叫蓝旗，负责侦察放哨及资格审查，还负责掌握书册、香规、仪注，帮助管事办理会中事务。根据是《海底》说：“嗨六排要效浪里白条张顺，在刘唐请医生四海标名。”

行八，称纪纲，负责纪律检查。会中有触犯纪律的，经拜兄弟认为应受刑罚的，由其执行。根据是《海底》说：“嗨八排莫学那罗成德性，不上三十二，一命归阴。”

行九，称挂牌，负责栽培新进，提升调补，登记会内兄弟排名。上四牌挂金牌，下四牌挂银牌，受处分的挂黑牌。根据是《海底》说：“嗨九排要效那九寨巴姓，巴九寨咱兄弟讲过人情。”

行十，称营门，率领大小老女充当护卫执事，听候指派差遣，负责传达。根据是《海底》说：“嗨十排要效那石秀人品，翠屏山报兄仇才算有能。”

这是正规大山堂的组织结构。民国年间，袍



哥开设的小山堂，许多都没有这样的结构，而是将香长、总座、行一集中为一人，俗称“龙头大爷”或“龙头舵爷”，将盟证、礼堂、行二集中为一人，陪堂、行三集中为一人。其余内堂的人员几乎不设。另外，无论大小堂口，外八堂均不设四、七两排。据说，袍哥的排行实际无二、四、七、八、九，其中“二”是不敢僭越关羽；“四”是桃园结义如有赵子龙当为四弟，故虚此席；“七”据说是出了叛徒，或说是瓦岗罗成；“八”和“九”是杨家将八姐九妹之称，亦避讳。

袍哥会的帮派文化及暗语

袍哥会的核心价值观是“尚义”，其最重要的帮规和章程一般认为沿用了天地会的《金台山实录》和《海底》。其对外联络的方式有茶阵、口令、隐语（江湖话）、手势、兰谱、拜贴等。袍哥会的主要成员是无业游民和下层民众，它只有代表他们的利益和要求，才能出现众望所归。袍哥把“桃园结义”“瓦岗结盟”“梁山聚义”的精神气节融为一体，自称“以传统江湖义气作纽带，结为生死攸关的利益群体”，总结出“忠信为本，义气为先”的教条，把“义”上升到行为的最高准则，把不同职业、不同身份的人组织起来，提倡“兄弟道”。

袍哥以封建伦理作为自己的伦理观，律己待人即以“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即以“仁、义、礼、智、信”为群体信条，要求会众对组织保持绝对的忠信和依赖，对大爷的绝对服从。

袍哥价值观的实质就是以人身依附形成团伙，把桃园结义作为相互关系的楷模，把关公奉为崇高行为的典范，把江湖义气作为行为准则。他们打出义气结合、豪侠仗义、团结互助、平等对待等口号，借以在君权社会里保持并扩张自己的生存权利。它要求会众对同胞的困难有无条件援助的义务，同时也有接受援助的权利。另外，为了标榜“义”，袍哥内部存在着“认盗不认偷”的

观念，即允许抢劫拦道之类的行为，却不允许偷鸡摸狗的行为，对盗匪和窃贼持不同的态度。

四川袍哥文化离不开茶馆，作为公共空间的茶馆成为袍哥的活动中心，他们在那里联络、聚集和开会，成为袍哥社会网络的一个重要部分。袍哥们利用茶馆进行各种活动，推动了茶馆文化的发展，各袍哥码头的办事场所就设在茶馆内，有些茶馆本身就是袍哥所开。袍哥大爷们在茶馆内处理这些民事纠纷，川西人叫“判公道”，川东人叫“付茶钱”。以上这些对当代四川甚至西南地区的民俗文化、民众性格、商业文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如今天的四川方言里面常用的一句口头禅是：“袍哥人家决不拉稀摆带”，用于朋友兄弟间，意思就是很耿直，说话算话。

袍哥常用的隐语包括很多日常事务，以下列举一些比较有意思的。

有关人的隐语：

“天牌”：男人；“地牌”：女人；“混子”“码子”：土匪；“上亮子”：丈夫；“底板子”：妻子；“灰狗子”：兵；“尖果”：小美女；“亮果”：美女；“三只手”：小偷；“舵把子”：袍哥头目。

有关社会活动的隐语：

“放黄”：失约；“不认黄”：不客气；“关火”：能起决定作用的人；“乘火”：顶住祸事；“抽底火”：揭露底细；“天棒”：无法无天的人；“打平火”：共同分担伙食钱；“吃欺头”：捡便宜；“下耙蛋”：说软话，求饶恕；“搁平”：把事情处理好；“扎起”：大力相助或袒护；“捡脚子”：为其庇护，处理后遗症；“不落教”：不够朋友；“结梁子”：结仇；“打让手”：原谅；“方起”：使人尴尬。

有关帮会活动类：

“跑日光”：白天行窃；“掐灯花”：夜晚行窃；“踩水”：侦察；“关火”：能起决定作用；“夹磨”：训练；“嗨皮”：参加袍哥；“坐堂”：开会；“落教”：按袍哥规矩办事；“跑滩”：在江湖上游走，无固定职业者；“插柳上山”：从小老么一步提升上去；“上山插柳”：中途参加；“吃讲茶”：发生争执的双方请大爷在茶馆内评理；“散眼子”：

01
02

01

民国时期，四川袍哥的形象（中）。

02

清末，坐在茶馆外的袍哥会成员。

散漫无组织；“操”：在社会上拉帮结党、拜把好斗；“拜把”：结拜弟兄；“拉稀”：中途逃脱，不负责任；“镇堂子”：能服众，在堂口上说得起话；“拉肥猪”：向被绑架户索要赎金；“毛了”：把人杀死；“撕票”：谈判破裂伤害人质。

四川袍哥的代表人物

四川袍哥会的成员绝大多数是男子，但也有“女袍哥”。清代宣统三年，保路运动风起云涌，大邑县赫赫有名的王三大娘以81岁高龄率领同志军，享誉川西。此外，辛亥女杰杜黄是学术界有名的女袍哥，在北京城南丞相胡同本宅开妇女茶话会，首创杜氏女子家塾，自任塾长，为京师女学发源之始。民国时期，在成都、重庆、万县、雅安等地均有女袍哥的公口，如“四维社”“三八社”“坤社”等。四川灌县女袍哥刁李成秀，在川西袍界甚为知名。崇庆县城南郊的女袍哥组织叫“妇女联谊社”约60余人。四川丰都县有个女袍哥团体，叫“平权社”，公口设在县衙门口熊瀛山茶馆内，女舵把子李志莲，共有女袍哥成员17人。

四川军阀大多是参加（或挂名参加）了袍哥组织的，军阀头目几乎都是袍哥的“舵把子”。辛亥革命前，熊克武原系同盟会员，为了做袍哥的工作，从日本回川后，由余英介绍加入袍哥会当大爷。石青阳也是原系同盟会员加入袍哥会的。邓锡侯是四川最大的袍哥之一。其次是王陵基、王缙绪、杨森、唐式遵等大军阀。这些袍哥组织了一个“川康大同公社”，这是一个全川性的袍哥组织，但并不是各地袍哥会的领导机构。它只是一个政治性比较浓厚的，不限于某一地但各地都有分社的高级别袍哥组织。

刘文辉、刘文彩是四川大邑县安仁镇刘家墩子人。刘氏祖籍安徽徽州，清初移民入川安居名山（今雅安市辖），后迁居大邑县安仁镇，世代务农。民国年间，刘氏家族平步青云、枭雄辈出，出了3个军长、8个师长、15个旅长，还有

1个省主席和1个战区司令长官。县团级以上军政官员有近50人，素有“三军九旅十八团，营连连长数不清”的说法。刘氏一家权势之盛，可见一斑。

刘文辉和刘湘叔侄，是刘氏家族最耀眼的将星。刘文辉也是大袍哥头子。刘氏在川西南的袍哥中，也有一定的威望，能掌握一部分袍哥武装。在民国时期，四川的袍哥势力是很雄厚的，西康（民国时期的一个行政省，下辖雅安市、康定城）紧邻的川西彭山、新津、温江、邛崃、眉山一带，农民有70%都是参加袍哥组织的，同时西康的袍哥（主要在宁、雅两属）不仅种植鸦片，也贩卖鸦片，而且都拥有武装，据说每个社（袍哥组织）少的有五六百杆枪，多的有上千条枪。此外，刘文辉与其他军阀袍哥的关系也很密切，如原刘湘手下的旅长、后任雷马屏司令的穆瀛洲，是义字旗舵把子，拥有武装三四万人，“自立为王”，与刘文辉、刘树成有密切的关系。刘湘驻军重庆最久，重庆袍哥与其下属官兵的关系尤为密切。著名的重庆袍哥大爷冯什竹、唐绍武、李祝三等，不仅与该部袍哥出身的师、旅长范绍增、陈兰亭、邓国璋称兄道弟，并与其他军官也有来往。

袍哥会中由大军阀组成的分支社团，不仅在社会上发展弟兄，而且吸收部属官兵参加，把袍哥组织扩展到部队中。如潘文华驻防乐山，在乐山成立“正心社”袍哥组织，他不仅在民间广纳弟兄，并号召部属官兵踊跃参加。曾官至“四川省主席”的王缙绪组织“怜民社”，自任社长，要求全师军官一律参加，并发展他的同乡西充县其他营以上军官，凡路过他防区，都邀请入社。大军阀还企图将不同旗号的袍哥联合起来，成立联合组织，以充实力量。如重庆的“孝义会”就属于这一类袍哥组织，范绍增、陈兰亭、潘文华都是发起人。军阀虽已军权在握，但要巩固其实力，仍然需要依靠袍哥为其效劳。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都很注意利用袍哥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记载说：民国十六年（1927年），刘文辉时任

四川帮办，为巩固他在成都和川西地区的统治地位，进而统治全川，千方百计地笼络各地既有声望，又有势力的地方实力派袍哥巨头，作为他的社会支持基础。

在军阀割据时期，重庆袍哥的发展较之省内其他各地尤为迅速。据记载：重庆五堂袍哥共有300多道公口，分设在城区及江北、南岸等处的各个街道，设置的地点一般都开设茶馆。截止抗日战争前，全市约有袍哥六七万人。重庆最大的袍哥是石孝先，他在重庆建立袍哥组织“国民自强社”，吸收黄埔出身的将领和军统上层人物秘密加入。在成都，袍哥中的代表人物是四个恶霸，分别是成都市东门的黄亚光、西门的徐子昌、北门的银运华（剑泉）、西南门的蒋浩澄。他们各自拥有一帮恶棍，称霸一方，“上吃王侯将相，下吃鳏寡孤独”。此外还有一个叫冷开泰的仁寿人也与这四大恶霸齐名，拥有自己的势力范围。

左汉章是绵阳袍哥的总舵把子，外号左大王、左老王、左长子，清光绪二十年前后，他出生于绵州左家岩马嘶渡（现绵阳市市中区松垭乡三村）的一个贫穷之家。

传奇袍哥范绍增，绰号“范哈儿”“大老造”，生于1894年，四川省大竹县清河乡人。自幼不喜读书，常到茶馆“听书”，对江湖豪侠劫富济贫心向往之。13岁入袍哥。1949年12月14日，任国民党重庆挺进军总司令的范绍增率所属官兵二万余人在渠县的三汇镇通电反蒋起义。解放后，范绍增历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参事、解放军四野五十军高参、河南省体委副主任等职。1977年3月5日范绍增在郑州去世，终年83岁。

如今讲起来，在那段战乱频繁、社会动荡的岁月里，袍哥的故事中既有时代的洪流，也有普通人真实的蒙昧、挣扎与情义，是研究巴蜀地区近代史极为重要的材料。^①



刘文辉旧居陈列馆，
四川省成都市大邑
县安仁。图/谭伟/
FOTOE

黄永玉谈表叔沈从文：一生从容

文 | 刘杨



在 2015年6月13日下午，已经91岁高龄的艺术家黄永玉携新作《沈从文与我》在北京单项空间与读者见面，并与到场的媒体以及读者畅聊与表叔沈从文之间的动人往事。《沈从文与我》由湖南美术出版社与博集天卷联合出版，讲述中国当代最优秀的艺术家与文学大师之间鲜为人知的感人故事。本书记录的历史再现了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与人格魅力。

❖ 常德爱情故事

黄永玉与沈从文都来自湖南凤凰，两人的亲戚关系也很近。沈从文的母亲是黄永玉祖父的妹妹，所以黄永玉称沈从文为表叔。近一个世纪时间里，两家关系一直非常密切。此外，沈从文在黄永玉父母的相识、相爱过程中还扮演了一个特别的角色。

黄永玉的父亲名叫黄玉书。在1922年的湖南常德，沈从文与黄玉书共同寄宿在一家小客栈里。

沈从文曾经在文章中这样写道：“至于那时的我呢，正和一个从常德师范毕业习音乐美术的表兄黄玉书，一同住在常德中南门里每天各需三毛六分钱的小客栈中，说明白点，就是无业可就。表哥是随同我的大舅父从北平、天津见过大世面的，找工作无结果，回到常德等机会的。”

黄玉书在常德遇见了同样来自凤凰的姑娘杨光蕙，当时杨光蕙在常德女子学校担任美术教员，两人很快便相爱了。黄玉书恋爱后，回到客栈让擅长文学的沈从文代笔给杨姑娘写情书。沈从文在文章中回忆：“每每回到客栈时，表哥便向我连作了十来个揖，要我代笔写封信，他却从从容容躺在床上哼各种曲子，或闭目养神，温习他先前的印象。信写好念给他听听，随后必把大拇指翘起来摇着，表示感谢和赞许。”

之后，黄玉书和杨光蕙的爱情进展很顺利。1923年，沈从文远赴北京追寻自己的文学梦，黄玉书与杨光蕙则在常德完婚。1924年他们的长子在常德出生，这个孩子便是黄永玉。

《沈从文与我》一书中还原了黄永玉眼中的沈从文。91岁高龄的黄永玉表示，表叔沈从文是他写得最多，也是写得最丰富生动的一个人物，他钦佩表叔坚韧的性格，欣赏他从容不迫的人生姿态。他在新书中记述了他与沈从文的诸多交往细节，沈从文不仅是他的表叔，也是其一生的领路人，表叔沈从文鼓励他完成了离开凤凰小城、回国、摆脱文革困境等人生重大改变。

黄永玉的名字“永玉”正是来自于沈从文。1946年前后，黄永玉发表作品时使用的是本名“黄永裕”。沈从文认为“永裕”这个名字意指小康富裕，更适合于一个布店老板，“永玉”则有永远光泽透明的意思。于是，黄永玉接受了沈从文的建议，在发表作品时使用“黄永玉”这个名字，一直到今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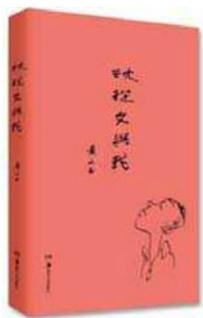
黄永玉第一次见到沈从文是在他十岁那年。当时沈从文回乡探亲，在外玩耍的黄永玉被告知自己家里来了个北京的客人。黄永玉回到家，看到沈从文和自己的祖母在轻声细语地说话。他问沈从文是从北京来的吗？坐过火车和轮船吗？后来，他被告知，沈从文是自己的表叔，是个文学家。

两人再次联系时已经是1947年初。当时黄永玉已经是活跃在上海的木刻家，他将四十多幅木刻作品寄到北平，希望得到沈从文的指点。沈从文十分欣赏黄永玉的木刻作品，并且将这些作品推荐给他的朋友和学生，比如萧乾、汪曾祺等人。沈从文的推荐对黄永玉刚开始的木刻事业起到了很大的帮助。1947年，黄永玉与汪曾祺在上海成为朋友。1948年，黄永玉在香港大学举办的人生中的第一次画展便是由萧乾促成的。

❖ 一生从容

黄永玉将沈从文作为自己的“人生标杆”。他在活动现场说：“这个人离开我们还不太久，没有多少年，但是（我感觉）这种人在今天不会再有了。”黄永玉与沈从文之间不仅有感人至深的亲友情感，还有惺惺相惜的文化情怀。在黄永玉的一生中，表叔沈从文一直占据着颇为重要的位置。三十多年时间里，他们生活在同一城市，

三十多年时间里，他们生活在同一城市。亲情、方言、故乡、相同的艺术家身份等多种因素使得他们两人少有隔阂，交谈颇深，哪怕在政治运动此起彼伏的日子里，往来也一直延续着。



《沈从文与我》，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

Tips

黄永玉：著名画家、艺术家、中国画院院士，1924年7月9日出生于湖南省常德，代表作品有《黄永玉木刻集》《猫头鹰》《这些忧郁的碎屑》《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等。

有了更多的往来、倾谈、影响。亲情、方言、熟悉的故乡、相同的艺术家身份等多种因素使得他们两人少有隔阂，交谈颇深，哪怕在政治运动此起彼伏的日子里，往来也一直延续着。

黄永玉在活动现场回忆了一段在文革时期与沈从文相遇的情景。那时他和沈从文在路上遇见，是绝对不能说话的。黄永玉说：“他也看见我过来了，两个人就在几秒钟里面，他讲了三个字：‘要从容。’这么一个温和的人，说出这三个字包含多么大的勇敢，还有包含对付将要来临的时事，那种从容的方式对待它。‘要从容’这三个字对我的启发很大，给我增加了勇气。”

有人在问黄永玉能否用几个词来概括一下他眼中的沈从文。黄永玉回答说：“我想到了钱钟书先生的一段评价：‘你不要看沈从文那么善良，温和，他不想做的事你刀子架到脖子上他也不会做。’这是真的，钱钟书先生同他来往也不是很多，但是他对他（沈从文）是相当了解，因为我们住在一个院子，有一次我到他屋子说有人骂你们两位了，你看到了没有，他说看到了。我说有什么感觉？他说我希望我跟从文一起努力，多做作品，好让他骂，要不然他就没有东西骂我们了，我们要努力工作，好提供材料让他骂。文人有一个特征，用别的力量很容易摧残的，文人很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他的思想情感的高度。”①

史景迁：不妨在古代小说中寻找“同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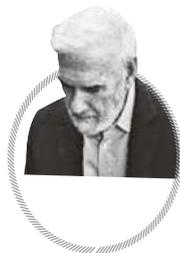
史景迁：我们能得到人们的平均收入、平均期待寿命、平均卡路里摄入量和人口方面的各种信息。但很难从这类材料中得到不同的细节，以清楚地区分出不同的人们。采访、翻译 | 卢汉超

卢 汉超：中国历来有“文史不分家”的传统。譬如说，司马迁的《史记》就既是一部史学著作，也是一部文学作品；中国文学中丰富的笔记小说类作品，也往往是珍贵的史料。在我看来，您的作品也是两者兼而有之。《王氏之死》和《太平天国》，读起来就分别像一部侦探小说和一出历史悲剧，而它们同时又是扎实的历史著作。在当前西方的中国史领域内，您的这种研究和写作风格似乎是独此一家，但我倒觉得这有点像司马迁的中国式的“文史不分家”。能否请您对此略作评论？

史景迁：我的感觉是，将历史和文学合而为一与将历史和小说合而为一是大不相同的。当我们用“literature”一词时（无论是指“文”或“文学”），我们是用它来传达一种品质、一种评判，或者是如何遣词造句。当我们用“fiction”一词时，我们是意指一种方法，而这种方法除了广义上的合情合理外不必以事实为依据。

卢汉超：但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学也包括小说。

史景迁：文学和小说往往不同。我想文学更是一种哲学传统。“Literature”一词也与一种艺术传统相连。所以，如果说我把文学和历史相结合，这只是意味着我对史学的写作风格有着激情。你可以说在历史学者中我比较注意写作的效果，我试图把一本书建立在这样的架构上，使其既在一个层次上准确，又在另一个层次上表达感情，并给所述故事以更丰富的背景。这就像运用艺术一样，使历史写作接近艺术以取得更深层的效果。



史景迁
Jonathan D. Spence

1936年生于英国，著名中国史研究专家。现为耶鲁大学教授，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是该组织成立一百四十年以来仅有的三位获此殊荣的中国史研究者之一（另两位是费正清和魏斐德）。主要著作有《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皇帝与秀才：皇权游戏中的文人悲剧》《追寻现代中国》等。

卢汉超

美国佐治亚州理工大学历史系教授。

我想这对我来说是一种自觉，因为我热爱西方传统中的文学人物。

卢汉超：大部分的中国历史学者在他们自身领域以外影响有限。您在本领域内有很高的地位，在一般受过教育的大众中也有相当一批读者。您在学界以外的影响或许可以与费正清相提并论。在我看来，“象牙塔”里的学者能对外面的大众历史作一些贡献是很重要的。但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使严肃的学术著作让一般大众能够接受的技巧和艺术。能否请您就此略作评论？

史景迁：首先，有影响和有冲击力可能不完全是一回事。有许多人读你的书，这固然是极好的事，但这不等于你对读者有很大的影响或冲击力。我愿意引起人们阅读的兴趣，但我不认为我一直有一种强有力的道德上的目的，去直接影响人们的观念。

你提到了费正清。我很幸运能认识他，他是芮玛丽的老师，而芮玛丽是我的老师，所以他是我的“师祖”。我从来没有想到我能和他相提并论。他是整个中国研究领域在美国的主要缔造者，而我并没有发展任何领域。我所做的主要是教学，尽力用我的智慧去帮助学生发展他们自己的思想，所以我从来不期望创建一个学派，如康熙学派或雍正学派之类。这是很关键的差别。费正清的大部分著作都旨在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他那本《美国与中国》尤其如此，此书极为成功。费正清写该书的目的就在于辅助美国的政策，而我写作的目标是鼓励人们了解中国。即使是一本看来有点像人们所说的通俗历史，我总是试图提供

一些进一步的读物，告诉人们应该往哪个方向走，希望他们能培养出自己的个人兴趣。我希望激发人们更多地了解中国的愿望，让美国人或欧洲人或其他许多国家的人民阅读我写的东西——这是我喜欢看到许多不同版本译作的原因。他们也许说，“我很喜欢这本书”，或者“我有点喜欢这本书”，但关键在于，他们说“我现在想要进一步阅读和知道更多（关于中国的）知识”。

卢汉超：说起《王氏之死》，您在书里用了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我当时读了有点诧异。您知道我是在中国受的史学训练。在中国，历史学家一般不用《聊斋志异》或《红楼梦》之类的材料。

史景迁：因为我们知道它们是小说。但同时我们知道蒲松龄正是生活在本书所涉的时代。尽管是小说，它代表了一种见解。我们在《聊斋志异》里看到了蒲松龄本人。蒲松龄还写了许多掌故笔记之类的东西。尽管这些不是确切的社会史，但我们却敢说这些著作代表着当时的思想概念，还是可以加以利用。蒲松龄写了他的家乡和附近的地区，他写了流浪汉、小贩、街头变戏法的，以及在社会上毫无地位、可以统称为游民的人们。我们还从他的著作中了解到他当时正在郟城（《王氏之死》一书发生的地点）。他的故事中有一个就确切地发生在郟城之南，在一个坐落于从郟城通往江北沛地大路边的小镇上。所以我想蒲松龄是他那个时代一个中国人的声音，而《王氏之死》正是为了表达当时中国人的声音。而且，蒲松龄还对中国人怎样对待和使用暴力感兴趣。所以并不是，“我猜想这事发生了”，而是，“我们知道这里有一桩谋杀案，我们知道蒲松龄很关注这类暴力，所以也许可以将《福惠全书》中的真实记录和蒲松龄的小说综合使用”。这种方法受到了不少批评。有人喜欢这本书，有人认为这种方法太过分了。

卢汉超：我们没有很多史料来写这一层次人们的生活。

我试图把一本书建立在这样的架构上，使其既在一个层次上准确，又在另一个层次上表达感情，并给故事以更丰富的背景。这就像运用艺术一样，使历史写作接近艺术以取得更深层的效果。

史景迁：确实如此。所以这是我的想法：“这里有一个非常优秀的耆老之年的中国人，生活在同一地区，思索着同样的问题。让我们把他当作一个同盟吧，不要忽视了他。”蒲松龄是个很好的同盟。他和黄六鸿（郟城县官）一样对这些问题有兴趣。黄六鸿来自精英阶层，王氏则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毫无地位的小百姓，然而黄六鸿关心这个屈死的妇女。这确实是《王氏之死》一书的目的：有这样一个县官愿意通过恰当的验尸来破案，事后又不忘将事实公之于众，并由此引出道德上的教训。黄六鸿实在是一个很好的社会批评家。所以再说一遍，蒲松龄是我的一个有用的同盟。

卢汉超：在我看来，我们对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的研究远非理想。您在《追寻现代中国》一书中有一些关于平民百姓的食物和住房的描述，但大部分有关中国近现代史的书都过于侧重研究精英阶层，对普通人民的生活则忽略不顾。在您看来，就史料而言，这种情况是因为有关日常生活的史料太多了，还是太少了？

史景迁：这方面有大量的材料，虽然它们往往是关于司法或税务方面，是那种更合适于作各种量化性历史分析的材料。这类材料中有许多是关于那些生活在接近社会最底层的人们，至少是那些远离精英阶层的人们。困难之处在于很难从这类材料中得到不同的细节，以清楚地区分出不同的人们。这不是这些人的错误，这是把他们归档入案的社会的错误，或者说是历史学家的错误。就量化的研究而言，这些是很好的材料。我们能得到人们的平均收入、平均期待寿命、平均卡路里摄入量 and 人口方面的各种信息。但是像我在《王氏之死》中用的那种材料就相对比较少了。事实上关于这个案子《福惠全书》上只有十几行字。

我的感觉是关于日常生活的材料不是太多了或太少了。有许多材料存在，但很难利用这些材料，因为它们对人物的性格不加区别。^①

（摘编自《开拓者：著名历史学家访谈录》北京大学出版社）



两万册国宝藏书 租界逃美记

文 | 泓景

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日军时常进入上海租界搜查劫掠，面对即将到来的暴风雨，为了守护暂存于租界中内的一批最重要的中国古籍善本，几个中国的知识分子勇敢打起了一场“古籍保卫战”。

1910年，上海外滩街景。远处圆顶建筑为汇丰银行，其右钟楼为江海关大楼（今海关大楼）。
图/FOTOE

今年4月9日，中国书史及印刷史学者钱存训，在其位于芝加哥的家中去世，享年105岁。

钱为学界所称道，并因为他在中国古文字及书史方面有卓越成就，是世界上最知名的中国书目和古文字学学者之一，还在于他对中国古籍所做出的另一个杰出贡献。

他曾参与一场堪称经典的“古籍保卫战”：在日本占领上海期间，冒着生命危险把数万本珍稀古籍偷运到安全地点。这批书籍上承清内阁大库旧藏，又广纳清末民国几代学人潜心搜罗的善本，珍本云集，是宋、金、元、明四朝一脉相承

的国家书藏。

钱和同仁们在当时所做的每一份努力，就是让中国的文脉多延续几分可能。

出关

1941年2月12日，上海初雪。一夜北风后，市民们没有赏雪的心情，而是急匆匆行走在大街上。细雪掩盖下，路上偶尔会看到一两具冻死人的尸体，里面既有瘪三混混，又有抽鸦片的烟鬼及弃婴。

一队穿着深色马甲的青壮男子，正开着货车沿途收殓这些马路尸体。他们后背的衣服上，无一例外印着“普善山庄”和十字标志。普善山庄由一群沪商开办，他们用募集到的善款，专门收殓这些遗体并进行火化、掩埋，想让穷人死后有一个安然的去处。根据记载，光是从2月1日到12日，该组织就收掩露尸1494具。

作为中国当年最具现代化的大都市，沦陷3年之久的上海，已是十分的窘迫和混乱：这一年，日军抢劫上海造币厂，日伪宪兵武装冲击沪上各大银行，公共租界内疫病流行夺走上千人性命……形势越加恶化。因为米价飞涨，已有地方发生饥民抢米事件。

唯有外滩13号，那座矗立在黄浦江畔、拥有典型希腊多立安柱门廊风格的江海关处，仍旧事务繁忙。每当头顶的大钟报时，江面上总能听见悠扬的英国皇家名曲《威斯敏斯特》响彻上海滩，让人恍然有置身于英国的感觉。

尽管日军在这座城市内为所欲为，但彼时江海关名义上仍由中国工作人员值守。其海关监督，是由1938年4月28日南京汪伪政府任命的李建南担任。

海关的税款保管和支付问题，实际上早就由日本暗地里敲定下来：1938年2月，日本和英国曾撤开中国，私下签订《中国海关协定》。而在李建南担任海关监督的当天，国民党政府总税务司署就正式确定这一天为“江海关沦陷日”。

戏剧的是，就在日军的眼皮子底下，从1941年的10月起，几乎每过一段时间，总有一批书籍送到戒备森严的江海关来。根据发票显示，这是由中国某个书报社代美国国会图书馆购买的一批新书，包括四部丛刊、图书集成等大部头新书。

外人所不知的是，实际上这是一些假发票。而这些箱子过关时无一开启，也无人想去探究里面究竟装的是些什么。每当这批书籍送来时，值班的总是一名张姓工作人员。报关时，他往往扫一眼发单便知端倪，匆匆盖章签字便给予放行。

整个海关，这名张先生是为数不多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宝贝的人。它们的名头说出来，也足以让任何人大吃一惊：它们是中国最重要的一批古籍、国立北平图书馆收藏的宋朝及之后的早期善本！

这批国宝级书籍可谓命运多舛，之前为躲避战火，从北京悄悄运抵上海租界内四散保存。此番出关，乃是打算运去美国保存。可以说，张先生每盖一枚鲜章，他就让中国的文脉多延续几分可能。

迁徙

在熙来攘往的江海关处，人群中总是有一双眼睛，紧张而又仔细地盯着这一切。他就是负责监督运送这批美国“新书”订单的钱存训——国立北平图书馆上海办事处处长。

31岁的钱隐藏了自己的身份，他让自己看上去更像是一个“书商”。只有当这些书籍安然出关、上船装运出口时，他才能长舒一口气。

这批善本的由来，钱存训是再也清楚不过了。它们上承清内阁大库旧藏，又广纳清末民国学人潜心搜罗的善本，其中宋刻元刊、秘抄精校荟萃，珍贵稿本、名家批校题跋本云集，其中世间仅存400余册的《永乐大典》就有60册之多。

在不少史学家看来，这批古籍也是宋、金、元、明四朝一脉相承的国家书藏。中国宋朝继五代之后，藏书其实并不很多，只是后来因收后蜀及南

唐两国的储积，并且因北宋的承平及尚文，乃至崇文院三馆所藏，竟超越汉唐。

1127年“靖康之难”，宋朝馆阁所藏，都被金人迁徙一空。幸而都是爱书之人，藏书保存完备。后元人灭金，置之大都。元人灭南宋后，临安（今杭州）图籍，也迁置大都。明初灭元，移置南京，待建都北平，又由南京移运北上，存于文渊阁。

至此，文渊阁藏书汇集了宋、金、元所储书籍的精华。明亡之后，文渊阁所藏，归入内阁大库，因为清代另建文渊阁，储藏四库全书，内阁大库藏书于清末拨归学部所创设的京师图书馆，北京政府于北伐前改为国立京师图书馆。1929年，国民政府将其改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将北京图书馆并入。

自从1931年东北沦陷以后，政府已知华北不保，于是在1934年决定将都城南迁，国宝一并转移，除故宫古物外，北平图书馆的藏书，也是其中一部分。

根据统计，当时送往上海的部分，除善本书籍约5000余种，6万余册外，尚有敦煌写经9000余卷，金石碑帖数百件（如汉熹平石经残石、周鼎、楚器、铜镜、古钱，及梁启超家属寄存碑帖等），均存放公共租界仓库，另有全份西文科学及东方学刊三四百种，约1万余册，则寄存法租界亚尔培路中国科学社。

另有一部分送存南京地质调查所新建所址，其中除西文参考书，外国官书，全份西文及日文工程期刊四五千册外，尚有旧藏内阁大库舆图及各省舆图七八千幅。为掩人耳目，对外统称为“工程参考图书馆”。

钱存训早前担任国立北平图书馆南京分馆（南京工程参考部）馆长。1938年春，他奉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的命令，调任“国立北平图书馆上海办事处”，专司保护这批藏书。

为了安全起见，钱存训把存在公共租界仓库内的中文善本，迁移到法租界内的震旦大学，因

为当时日本与法国维希政府保持邦交，所以法国人在上海的产业，未受日军没收。后来又化整为零，从震旦大学迁入租用的民房，分散掩藏，避免注意。

护宝

日军原本没有进犯租界，与各国也保持和平。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在上海设立盟国侨民集中营，关押英、美国等国侨民六千多，涉及十余国，历时两年七个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发生在上海的影响极大的世界性事件。

上海集中营始设于1943年1月。在此之前，日本人实际上早就在做酝酿和准备。例如在1941年11月22日，日本就暗自提出《国际形势骤变时在支敌国人及敌国财产处理要纲（草案）》，对战争爆发后“敌国人”的处置问题提出方案。

所谓“山雨欲来风满楼”，成天与这批藏书相伴的护宝者们，精神高度紧张。尽管这批书已安全存于租界内，但租界内的情况却自1941年起每况愈下，大家都深恐一旦日军占领租界，存书又将不保。

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未雨绸缪，想了个办法：不如将存沪的善本再度迁徙，运送到美国保管。他将这项任务委托给当时的驻美大使胡适。

1941年1月18日，胡适带着任务去美国国会图书馆拜会馆长麦克利什。胡适答应，这些书运来后，允许国会图书馆全部摄影，只不过请他一并摄影三份，一份由国会图书馆保留，另两份将来和平时，跟这些书运回一并交还中国。麦克利什同意了。

得到胡适回信的袁同礼迅速从这批藏书的拣出部分精华准备送美：计102箱，共2954种、20970册宋元明早期善本专藏，其中包括宋版150种、元版100多种、明版及清版2000多种，

另有 300 多卷明朝皇帝的起居注。

但如何由沪安全送出去，却成为一个难题。最初他们准备通过海关，交商船运送，并嘱咐海关监督丁桂堂帮忙。但私下接触丁某，丁却觉得风险太大，不敢担当风险。后又打算由美国派遣军舰到沪接运，但这么多而笨重的书籍无法遮掩日军特务耳目，也无法通过外滩到达军舰。

到 1941 年 10 月，钱存训仍然束手无策。偶然间，钱存训的妻子许文锦的同学张女士到寓所来访，闲谈中得知她有一位哥哥在海关任外勤。钱存训通过张女士的介绍认识其兄，问他有无办法相助，结果他一口答应帮忙。

张先生说，当他值班时，可把书籍送到海关，由他担任检查。如保守秘密，当不会引起日本特务注意。于是这 102 箱书，便化整为零，分成 10 批交商船运送，每批约 10 箱。而钱存训以一个书商的身份，为这批书制造了假发票。

这样从 10 月开始，每隔几天，当张先生值班时，便送一批去海关报关。前后经过两个月的时间，最后一批便于 1941 年 12 月 5 日由上海驶美的“哈里逊总统号”装运出口。

幸存

古籍出海两天后，即 1941 年 12 月 7 日，日本袭击了珍珠港，并且全面进驻租界。让所有人如释重负的是，藏书早已运送出海，大家也打了一场漂亮的“古籍保卫战”。

岂料不久，报纸上刊发了一则新闻，“哈里逊总统”号在菲律宾马尼拉被日军所俘。袁同礼、钱存训等人感觉如晴天霹雳，他们做了最坏打算，这最后一批善本恐怕已被日军掠劫。

没想到，在次年的 6 月初，上海各报刊登了一则由里斯本转发的海通社电报，说美国国会图书馆在纽约宣布，由北平图书馆送出的善本书籍 102 箱已全部到达华盛顿。

这则消息，让不少参与此事的人感到无比欣



所谓“山雨欲来风满楼”，成天与这批藏书相伴的护宝者们，精神高度紧张。大家都深恐一旦日军占领租界，存书又将不保。



喜。至于最后一批书的命运为何并不如之前报道所指，又是如何顺利到达美国，至今仍是一个谜。

这批从上海寄出的善本，其中大部分运抵美国加州，暂时存放于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图书馆，半年后全部运到国会图书馆。后来在著名版本目录专家王重民的主持下，这些善本被翻拍成永久保存的缩微胶卷，总共有上千卷之多，全世界的学者都能够查阅它们。

钱存训的命运也被这批古籍改变。1947 年，当时的教育部委派钱存训，赴美国华盛顿接运战前寄存在美国的善本古籍回国。一切手续都已办好，但因国内战争，交通断绝，未能成行。他转而由馆方推荐，以交换馆员名义到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工作。

他为馆藏的中国书籍编写中文书目，并在东方语文系兼课，同时在图书馆学研究院攻读学位。1952 年，钱存训获得了芝加哥大学的图书馆学硕士学位，5 年后获得图书馆学和东亚研究的博士学位。

当时他已 47 岁，三个女儿也已成年。其后，钱存训一直留在芝加哥大学，担任东亚系及图书馆学研究院教授、东亚图书馆馆长。在那以后的几十年里，钱存训扩大了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的馆藏，使其成为美国最重要的东亚图书馆之一和北美中国学研究的重要资料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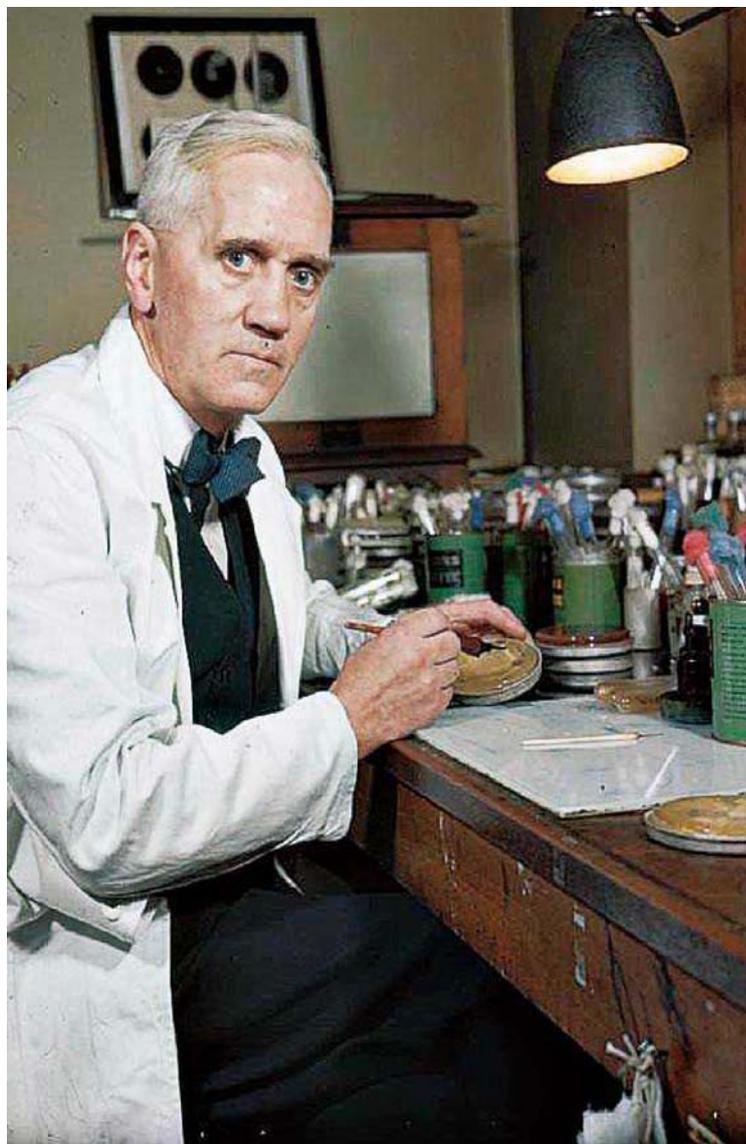
而钱本人除了在中国古文字及书史方面有卓越成就外，也是继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首任馆长（燕京图书馆的前身）裘开明之后，北美东亚图书馆学界名头最响者。他被学界视为全世界最著名的中国书目和古文字学学者之一。1999 年，中国国家图书馆授予他“终身成就奖”。2007 年，南京大学还成立了钱存训图书馆。

上世纪 60 年代，这些古籍被运抵中国台湾，目前它们保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至今，这批善本与国家图书馆分离已长达 70 余年。为了让这些书籍回到北京，回到国家图书馆，钱存训曾做过多年努力，但至今尚未如愿。①

抗生素发现史

编译 | 张晓波

近几十年来，“抗生素滥用”问题以及“超级细菌”的出现让人们感到恐惧和担忧。然而，回顾人类与病菌作战的历史，我们不可否认，抗生素的发现与应用曾经治愈了许多顽疾，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甚至曾让人们感觉走出了医学的“暗黑时代”。



二战时期，发现青霉素的英国科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在他位于伦敦帕丁顿的实验室中。

在漫长的历史中，人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知道某些疾病的缘由，在治疗这些疾病方面更是束手无策。随着医学的发展，人类对疾病的真正根源有了全新的认识。这些医学进步使得科学家发明了抗生素，人类从此有了与有害的病原体抗争的有效武器。

抗生素的诞生和发展与科学家们前赴后继的探索密不可分。17世纪，荷兰显微镜学家列文虎克首次通过自制的显微镜观察微生物世界；20世纪40年代，抗生素之父塞尔曼·瓦克斯曼及其团队发现链霉素，拯救了数百万肺结核和其他疾病患者的生命；而今天，人类已经生产出了高效的抗菌药物——广谱抗生素。抗生素的发现拯救了无数生命，它是医学对人类的最大贡献之一。

❖ 微生物与疾病的联系

荷兰人列文虎克是世界上第一个观察到细菌和单细胞生物组成的微生物世界的人，被公认为“微生物学之父”。1670年左右，他用自制的显微镜发现了微生物。列文虎克曾是荷兰著名的绸布商人，尽管缺少正规的科学训练，但他在1668年左右，对布商用来检验布匹质量的放大镜产生了及其浓厚的兴趣，并且开始将磨制透镜作为自己的一项爱好。之后，他把磨制的透镜放在铜版的一个小孔上，组装了自己的第一台显微镜。勤劳加上天赋，他磨的透镜越来越好，透镜放大的倍数也越来越高。他一生共磨出了近250块这样的玻璃镜片。

大约在1670年，列文虎克使用自己磨制的一块透镜，观察到了微生物。他和英国皇家学会取得了联系，通过数百封信件陆陆续续地将自己的发现报告给这个学会，他的很多发现都被发表在《皇家学会哲学学报》上。1673年，英国皇家学会发表了他用显微镜观察到的蜜蜂的口器和蜚刺。1680年，列文虎克被选为该学会的会员。

1822年，法国化学家路易·巴斯德出生在法国东部小城多勒。1855年，他开始了具有划时代

意义的发酵研究。他用试验表明，牛奶变质是因为牛奶中产生了乳酸。他提出假设：这是由于牛奶中有微生物。巴斯德对红酒发酵和变酸的实验研究表明，酵母菌的存在，使得葡萄中的糖分分解成了酒精。尽管同时代的化学家嘲笑他的研究，但是他关于微生物世界的这些见解后来被证明都是正确的。

路易·巴斯德也是第一位用实验表明传染病是由微生物造成的科学家。到了1862年，巴斯德通过不断地实验，断言微生物是发酵和腐败的“元凶”。在提出这一著名理论的同时，他还补充道：“关于微生物的研究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实例，表明动物和植物疾病与细菌之间有某种联系。毫无疑问，这将会是我们对谈之色变的传染病进行更深入研究的第一步。”路易·巴斯德还是第一个表明微生物可以通过空气传播的科学家。他说：“经过高温消毒的有机物一旦接触空气，这种有机物就会开始腐败变质，这都是空气中的微生物造成的。”

这个论断成了巴斯德提出的著名的“病原菌学说”的基础，这个学说认为，传染病是由微生物引起的。

德国医学家和细菌学家罗伯特·科赫成功地从奶牛身上分离出了导致炭疽热的炭疽杆菌，这一发现促使巴斯德提出一个更加大胆的设计，并且急于在实验中加以证明。巴斯德本人对炭疽杆菌也极感兴趣，因为乳品产业曾在法国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他让四头奶牛感染炭疽热，然后让兽医对其中的两头注射炭疽疫苗。然而，注射过疫苗的奶牛，一头存活一头死亡；另外两头未注射疫苗的奶牛也是一头死亡，一头存活。这让对疫苗满怀期待的巴斯德心灰意冷，称这次实验中他设计的“治疗方法没有任何效果”。在几乎就要放弃实验，承认失败的时候，巴斯德又想到了一个新的实验方式。他从炭疽热病牛体内提取了最具活性的炭疽杆菌，并将这种杆菌注射进两头存活下来的奶牛体内，注射的剂量完全足以使健康的奶牛致命。然后他等待观察实验结果，令人



疫苗的开发，使得人体自然防御机制得到增强，进而抵御疾病的侵袭。巴斯德晚年的一个宏大愿景就是为每种疾病找到有效的疫苗。



吃惊的是，两头奶牛都安然无恙。

在成功地实现了牛炭疽热疫苗接种后，他还用同样的方法实现了鸡霍乱的疫苗接种，注射疫苗的鸡也全部存活了下来。在设计这个实验的时候，他将足以致命的鲜活霍乱病菌涂在面包上，并将面包喂给鸡雏吃，鸡吃后并不会患霍乱。在研究炭疽疫苗和鸡霍乱的疫苗的过程中，巴斯德都采用了英国医生爱德华·詹纳治疗天花的牛痘接种方法的原则，并且都取得了成功。他甚至分离并培养了狂犬病疫苗，在众多被疯狼咬伤的沙俄贫农身上进行试验，除了19例没有取得成功外，其他的人都转危为安。为表彰他的功劳，俄国沙皇授予他圣安妮十字勋章，并奖励他十万法郎，用于建立巴斯德研究所。这个研究所1888年正式开放，是世界上首个专门致力于微生物研究的实验室。

渐渐地，巴斯德的研究得到越来越多的人认可。医学界因此也能按照他的研究，将一种疾病的起因与某种微生物联系起来，而寻找治疗的药物因此也有了可能。疫苗的开发，使得人体自然防御机制得到增强，进而抵御疾病的侵袭。巴斯德晚年的一个宏大愿景就是为每种疾病找到有效的疫苗。

❖ 不期而遇的奇迹：发现青霉素

1928年8月底，在结束休假返回伦敦圣玛丽医院工作后，英国科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发现，自己实验室中的培养皿里长出了一些奇怪的东西。他的同事墨林·普莱斯走进他的实验室，和刚刚度假回来的弗莱明打招呼，顺便询问研究进展。弗莱明顺手递给普莱斯一个盆子，后者发现，培养皿底部布满了黄色的葡萄球菌，而葡萄球菌上则长满了毛茸茸、蓝绿色的真菌一样的菌丝。当弗莱明仔细观察时，他发现菌丝四周没有任何的活的细菌，只有死亡的细胞。

1929年，亚历山大·弗莱明把自己的这个菌丝汁液称为“盘尼西林”，因为这种汁液是从红

色青霉(Penicillium rubrum)的菌丝中提取的。他开始了试验这种神奇的霉菌,发现它不仅杀死葡萄球菌,还能杀死造成链球菌感染、肺炎、梅毒、淋病、气性坏疽、脑膜炎和白喉的致病菌。更让人惊奇的是,这种霉菌对人体没有毒性。他请教同事拉图什,这位同事将其描述为红色青霉(Penicillium rubrum)。几年之后,这种霉菌被定名为特异青霉(Penicillium notatum)。

弗莱明原本是想在自己的实验中寻找能够抗菌的溶菌酶。因此,人类发现青霉素,完全可以说是一个幸运的意外。不过,他充分认识到自己这个发现的重大价值。他把接下去的一年时间都用在寻找有这种霉菌的样本上,这些样本五花八门,包括旧书籍,绘画作品,奶酪,面包和果酱,目的就是为了更深入地了解这种霉菌的抗菌效果。他甚至问朋友有没有长时间扔在一边不用、已经发霉的臭鞋子。1929年2月,他把自己发现的这种霉菌汁液命名为青霉素(盘尼西林, Penicillin)。

尽管弗莱明是青霉素的发现者,但是他并不是化学家,而青霉素的任何医疗应用,还必须首先对这种霉菌进行分离、凝缩,并进行化学提纯。另外由于天然状态下的青霉菌一周之后就会死亡,因此必须采取措施确保其稳定性。1938年,剑桥大学的科学家霍华德·佛罗里和恩斯特·钱恩攻克了这一难题,并试制出了纯度极高、晶体状的青霉素,浓度达到了弗莱明最初样本的四万倍以上。

1941年,佛罗里获得了美国科研机构和制药公司的资助,开始大规模生产青霉素,这些青霉素在二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自从佛罗里从青霉菌中提纯青霉素开始,科学家发现了许多类似青霉素的其他抗生素,这些抗生素的发现使得细菌感染在二十世纪下半叶极大地降低了。1945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将诺贝尔医学奖颁发给了弗莱明、钱恩和佛罗里,以表彰他们在青霉素发现和应用

过程中的贡献。

❖ 神奇药物：百浪多息

1936年11月,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公子患上了链球菌咽喉炎和急性鼻窦炎。医生甚至推测他可能得了溶血性链球菌感染,而这种细菌感染一旦进入血液,病人就将时刻有生命危险。他的医生小托比给小罗斯福注射了一针百浪多息(Prontosil),一种又称为磺胺柯衣定的全新药物,外加让其口服普罗脱林(Protolyn),一种口服性的百浪多息。小罗斯福竟然奇迹般地康复,连《纽约时报》都在当年12月17日抛出头条,盛赞这一挽救了总统小儿子姓名的“神奇药物”。这一事件,以及之后媒体连篇累牍地报道,使得美国掀起了一场持久不衰的磺胺类药物热。

1935年,德国病理学家和细菌学家格哈德·多马克发明了百浪多息,开启了磺胺类药物的未来。百浪多息,作为磺胺类药物中的第一种药物,是多马克合成的。不过,它首先并不是作为抗生素使用,而是作为工业染料使用。在20世纪30年代,格哈德·多马克是法本化学工业股份公司巴伐利亚实验病理学研究所所长。他决心生产出一种能够在杀死病菌的同时又不会对病人产生副作用的抗生素药物。多马克对能够使细菌着色并吸附在细菌表面上的染料非常感兴趣。逐渐地,他对偶氮染料产生了异常浓厚的兴趣。在他的实验中,他首先测试了一种红色染料对链球菌的效果。链球菌能造成猩红热、风湿热、链球菌性咽喉炎和肺炎。他将链球菌注入实验白鼠体内,然后对白鼠注射红色染料。结果发现,这种红色染料对白鼠产生的非洲睡眠病似乎有效果。不过,这种染料对人体的链球菌感染效果非常有限。在经过上千次失败的实验后,1932年10月初,多马克的同事约瑟夫·克拉雷尔将含硫的侧链合成在染料上。这项实验立刻取得了成功,含硫侧链和染料合成

01 | 02

01

1953年,发现链霉素的瓦克斯曼在实验室中。

02

约1870年,巴黎大学冷却和发酵啤酒的设备,供巴斯德做微生物实验。路易·巴斯德(1822-1895),法国化学家、微生物学的奠基人。发现酵母菌、乳酸菌,研发出炭疽病及狂犬病等疫苗,被誉为“现代细菌学之父”。图/FOTOE



后，立即改变了后者的效果，原来不稳定甚至无效的药品立刻成了高效的抗链球菌药物。

就这这段时间，多马克的小女儿患上了严重的链球菌感染，情急之下，他给女儿注射了一剂还从未在人体身上临床试验过的百浪多息。他女儿奇迹般地康复了。在关于这种药物药效的报告中，多马克并未提及自己在女儿身上的成功试验。一直到1935年，当其他医生在其他病人身上进行这种药物的临床试验并取得成功后，他才公布自己在女儿身上进行的药物试验。随着百浪多息以及其他磺胺类药物的发现，医学界又多了一件对付传染性疾病的有效武器。

❖ 11号实验——链霉素的发现

1943年，乌克兰裔美国化学家、土壤微生物学家塞耳曼·瓦克斯曼开始寻找一种化学物质，希望能借此杀灭结核分歧杆菌。这种病菌是当时死亡率几乎百分之百的肺结核的元凶。他已经成功地找到了链丝菌，一种在实验中能有效杀灭革兰氏阴性菌的细菌，而一般的磺胺类药物和青霉

素对革兰氏阴性菌都是无效的。这一发现能帮助人类医治诸如伤寒，兔热症，波状热等疾病，这些疾病在此之前没有任何药物可以治疗。

疫苗和此前的抗生素治疗对付肺结核无效，是因为这些治疗手段无法溶解结核杆菌的蜡质荚膜。许多科学家，包括瓦克斯曼和他的研究团队，都一度开始质疑，他们是否真的能发明一种能穿透这种蜡质荚膜并且发挥药效的药物。

1943年，瓦克斯曼和他的研究团队在新泽西的实验室中成功地找到了可以治疗肺结核的链霉素。他带领研究团队，从土壤中上万种的微生物中找到了两种能杀灭结核杆菌的放射菌，将它命名为灰色链霉菌。一种是在泥土中找到的，另一种则是在实验室活禽培养部门的一只小鸡的喉咙中提取到的。这两种链霉菌对许多革兰氏阴性菌都有明显的抵抗作用。革兰氏阴性菌可以导致痢疾、轻度肺炎、波状热、百日咳、杆菌性痢疾、野兔病、禽伤寒等疾病。更重要的是，这两种链霉菌都对肺结核菌有着明显的治疗效果。

瓦克斯曼博士和他的团队，包括从二战战场刚刚回来的年轻科学家阿尔伯特·萨兹，开始不

断地培养这两种细菌，并展开试验。在自己的地下实验室中，萨兹夜以继日，实验室烧瓶咝咝冒着气，瓶中液体泡沫涌动。通过不懈努力，他终于成功地分离出了10克晶末，并把它提供给了美国梅奥医学中心的威廉·费尔德曼医生，这就是链霉素的最早分离。

他让蒸馏瓶24小时蒸馏，自己则睡在了实验室的地板上。他甚至和实验室的守夜人商量，如果守卫发现他睡觉，而烧瓶中的液体已经蒸发至瓶体红色线以下，守卫就要叫醒他。与这种曾经杀死过数百万人的病菌打交道极其危险，甚至有生命危险。萨兹采取了当时所有可能的预防措施，据研究团队的另一名研究人员多丽丝·琼斯回忆，萨兹在结束一天的工作后，甚至使用有消毒杀菌作用的消毒水漱口。工作的时候，他必须时刻与肺结核杆菌为伍，而那个时候并没有任何的治疗方法。

关于谁应该获得“链霉素发现者”这个称号，学界存有争议。毋庸置疑，瓦克斯曼是发现这一抗生素的团队的领导者，但是据萨兹的说法，瓦克斯曼从未踏入这个地下实验室一步，而且还亲口告诉萨兹无论如何不要将菌体带到楼上去。萨兹提取了足够多的链霉素，并且将其中的10克送到了当时的梅奥医学中心。据萨兹的1943年8月23日的实验日志记载，“11号实验，拮抗性放线菌”，用这个词描述这种从土壤中发现的线状的、能产生抗生素的微生物，听来有点怪异。接下去的几页日志详细记载了有关的实验，以及他发现的两株灰绿色放线菌，他自己把他们命名为“灰色链霉菌”。每株菌体都产生出了一种抗生素，并能杀死一个皮氏培养皿中的大肠杆菌。而且，他还发现，这种菌体产生的抗生素还能杀死结核细菌。按照这一日记的记载，发现链霉素的应该是萨兹博士。

1944年1月，链霉素的发现被公之于众。两个月后，一批链霉素被送到了梅奥医学中心，威廉·费尔德曼和H.考文·欣绍医生开始在白鼠身

上使用链霉素的临床试验。今天看来，这项试验具有影响跨时代的历史意义。1944年底，这两位医生通过临床证明，这种抗生素对杀灭实验白鼠身上的结核菌有很好的效果。

到了1946年，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化学疗法小组委员会发布了一项报告，报告了链霉素在最初1000个病人身上的临床报告，而美国的医药公司此时已经达到了年产链霉素两吨的生产能力。链霉素治疗革兰氏阴性菌（如结核杆菌）的巨大成功打消了人们关于抗生素有效性的全部疑虑。青霉素可能引领人类进入了抗生素时代，而链霉素的发现则刺激了全球范围内寻找由微生物产生的化学治疗药物的热情。

❖ 广谱抗生素

到了1950年代，科学家仍然孜孜不倦地寻找效果更好、威力更大的抗生素。其中就包括了新发现的金霉素，土霉素。这些抗生素杀菌效果特别好，因为比起之前的抗生素，它们能有效杀灭更多种类的细菌。医生和科学家把这些新型抗生素称为广谱抗生素。劳埃德·科诺菲尔是美国辉瑞制药的一名化学家，他发现金霉素和土霉素的中心有着相同的分子结构。他把这个中心分子结构称为四环素，而辉瑞制药也于1955年申请了四环素的专利。这一发现又导致了一系列以四环素为中心分子结构的全新抗生素族类的出现。

科学家们还发现青霉素也有一个中心分子结构，他们称之为已内酰胺。通过固定中间的已内酰胺分子，并改变青霉素大分子的其他部分，他们生产出了全新的抗生素，如氨苄青霉素（氨苄西林）、羟氨苄青霉素（阿莫西林），这些新合成的青霉素能更好地治疗更广范围的感染。紧随青霉素之后，科学家又相继发现了头孢菌素类、碳青霉烯类和单环类青霉素。

事实上，头孢菌素化合物是由意大利科学家博兹（Giuseppe Brotzu）于1940年代发现的，当时



他发现意大利撒丁岛首府卡利亚里一个污水排水口附近的海水会周期性地洁净。他推测是污水中的某种微生物产生了一种抑制性的化合物，从而洁净了水体。他后来将这种微生物命名为头孢菌素 C，并证明它能生成一种抑制细菌生成的物质。早期的头孢菌素就是从这种菌体生成的物质合成的。

❖ 抗生素的未来

毋庸置疑，抗生素的发现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但是有个问题也随之而来：当抗生素面对产生抗药性的细菌不再起作用的时候，人类怎么办？一个让人惶惶不安的事实是，目前人类不得不面对诸如耐甲氧西林金葡菌和对多种药物产生抗药性的肠杆菌科这类可怕的致病菌。这也提醒人类一个不得不面对的事实，细菌非常“聪明”，

1945 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将诺贝尔医学奖颁发给了弗莱明（前排左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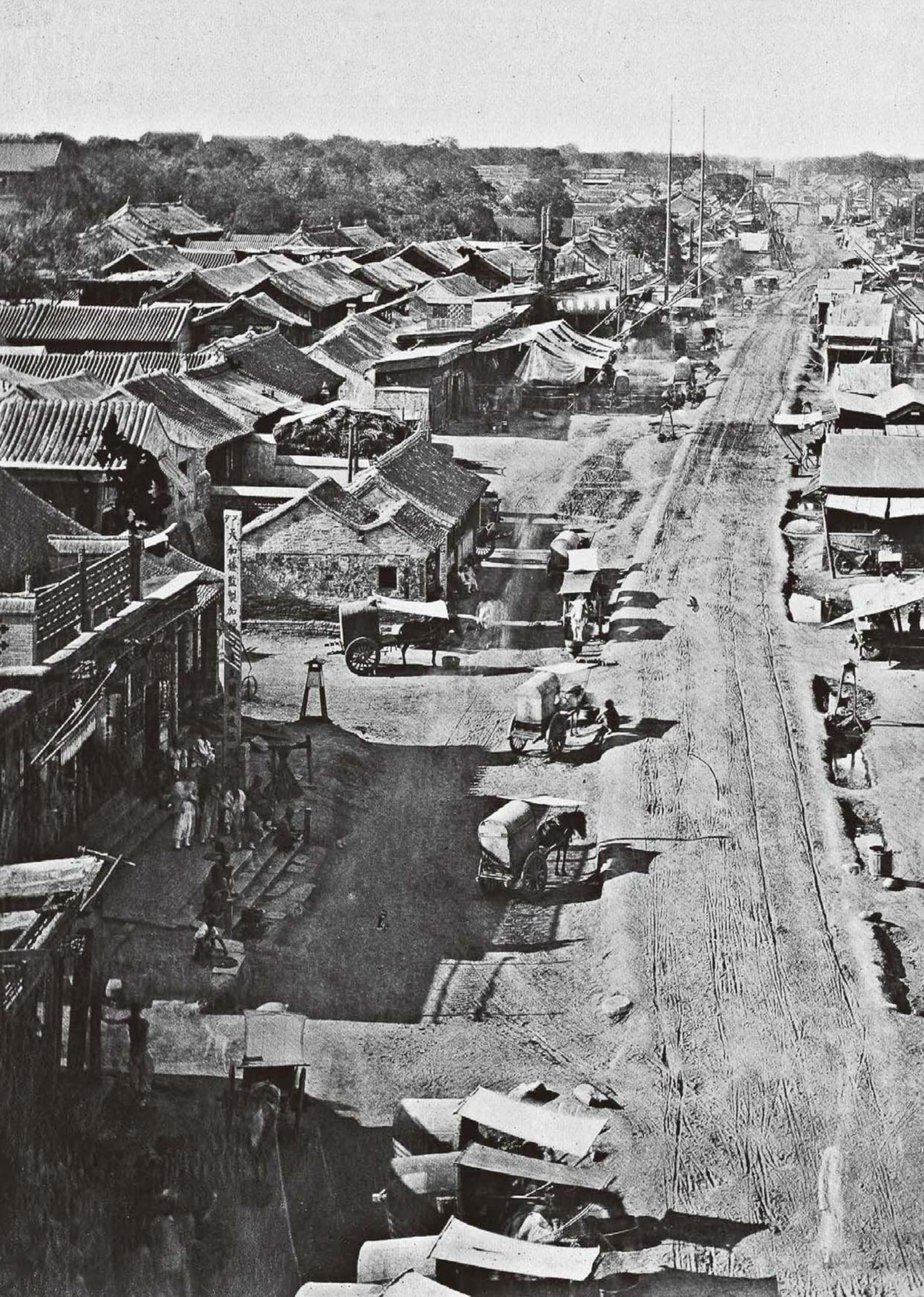
并且能很快地适应医生开出的处方中给病人服用的抗生素药物。医生把现代医学开发新药试图解决病菌越来越强大的抗药性的努力比喻为“伸出一个手指堵住大堤上的一个漏洞，却发现更大的洪水又从其他更大的漏洞冲了出来”。

要解决越来越严重的抗药性问题，方法无非有二，一是开发全新的抗生素，二是采取全新的方法应对细菌感染问题。

科学家们当然未放弃寻找新的治疗药物。从各类抗生素发现的情况看，除了甲氧苄啶，其他的主要抗生素的发现完全是运气使然：显示发现药物，然后才确定药物作用的目标细菌。很多的制药公司在寻找新药物方面仍然遵循着这一模式，并在公司内保留着自然产品部门，并由该部门负责收集全球各地的土壤样品，测试包括抗菌性的各类重要性状。这种做法逻辑的前提是，至今为止，从自然界提取的抗生素，仍是人类制造出来的效果最好的抗生素药物的基础。

科学家们目前试图通过绘制病原体染色体的 DNA 图谱，从而生产出针对某一种病菌的定制药物。这些医学专家们试图通过这种全新的分子研究途径，发现新的抗生素，从而更好地理解病菌是怎样作用于人体的，或者它们的“语言”是什么。但是，也有一些其他的实验室仍在找寻病菌的天敌——噬菌体。如果现代医学不能够做到“与时俱进”，寻找到更新更好的抗生素，那么，等待人类的可能是又一次的医学的黑暗时代。

目前看来，人类抗击具有抗药性病菌方面的努力似乎是前途未卜，但是回顾历史，没有人质疑，抗生素的发现挽救了数百万的生命，并全面革新了医药科学。如今，公众对于正确使用抗生素有了更好的认识。公众和相关的组织也在采取行动，希望延缓细菌抗药性的增强。那些曾经夺走了数百万生命的疾病，现在只需一片药片，一针注射，就可以完全消除。而新的药品，新的疫苗，仍在源源不断地被人类发明生产出来。这些努力的意义与价值，自有历史和现实共同为证。①



厚历史

Thick History

一个瑞士人眼中的 晚清帝国

厚历史版块编辑：蔡丽萍
邮箱：2010025743@qq.com

阿道夫·克莱尔（1834—1900）是瑞士人。1860年到1868年期间，他作为一家英国公司的丝绸监察员和采购员在中国工作和生活。克莱尔喜好摄影，并且有记日记的习惯。他收藏了不少晚清时期的中国影像，并留下了大量关于中国的游记。这些影像与文字资料，为今天的人们生动地勾勒出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风貌。

照片是重要的历史文献，档案馆里的照片大多记录的是一些重大事件，对那些普通的常人琐事则少有反映。克莱尔的照片中不仅有当时的重要建筑和事件，也记录了生活在城市和农村的个人。^①

（图片与文字选自《一个瑞士人眼中的晚清帝国》，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授权）

北京街道（崇文门大街）

克莱尔在7月6日出北京城，经大钟寺往圆明园方向去。这条街道或许是崇文门大街，据克莱尔日记，他们住在法国大使馆附近。晚清法国大使馆在东交民巷，离崇文门不远。有人称，这幅照片的拍摄者是英国旅行摄影家约翰·汤姆逊。



01	04
02	—
03	05

01

居庸关（关沟）风景

照片拍摄的应该是关沟的风景，远山上应是居庸关长城。长城之上，梯形的烽火台和城垛墙口依稀可辨。

02

卧佛寺琉璃牌坊

卧佛寺在今北京植物园内，此地在西山北的寿牛山南麓。卧佛寺始建于唐代，算得上千年古寺。今天的格局是在乾隆年间形成的，因藏有元代铜卧佛而得名。

照片上是卧佛寺牌坊，四柱三间七楼，单檐，歇山顶。黄色的琉璃瓦顶透露了它的身份——皇家寺院，虽然照片无法显示这种色彩与质感。照片右边的小石桥即是放生桥，桥下是放生池。

03

北京商铺

这张照片拍摄的是一家商铺，三间两柱朝天栏杆式，匾额上四个大字“天成字号”，应该是烫金的，就像克莱尔描述的，中国俗称“金字招牌”。现在难以考证店家究竟经营哪种商品。从店铺以及一旁的干果店装修看，可能并不在繁华街区。据现存于旧京城商铺的老照片资料可见一点：繁华街市中店铺不仅有牌匾，更多的是店头悬挂幌子，门柱刻写楹联。相形之下，这个“天成字号”在广告声势上未免低调了。

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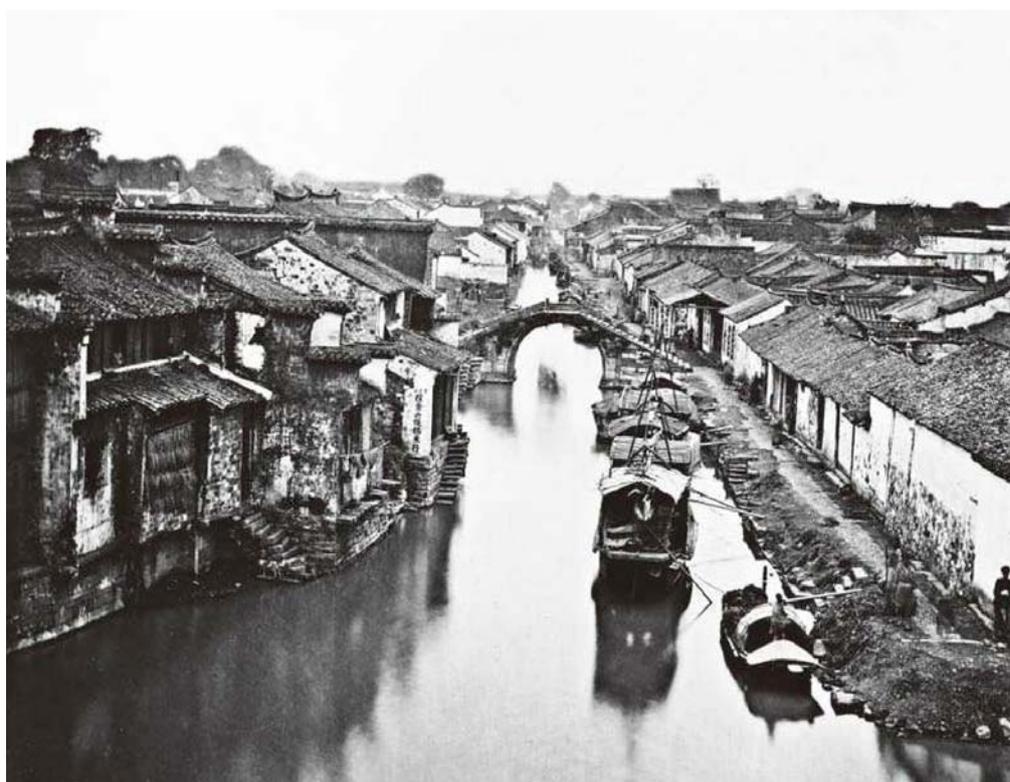
上海外滩

本照片当是从苏州河对岸看外滩，右上一组建筑十分醒目，较高的一座是共济会会堂，旁边的深色建筑是鲁麟洋行。

05

苏州水巷

照片上小桥流水人家，是典型的姑苏水巷风貌。水巷的两侧布有商铺、米行、酱菜园等。



建文帝生死之谜

文 | 胡丹

今

天存留的明建文帝时期的文字与文物，少之又少。南京中山门外的明孝陵，立着一块神功圣德碑，是永乐十一年（1413年）九月朱棣以“孝子嗣皇帝”的名义，给他父亲立的一块神道碑。全碑2746字，一言以括之，就是“歌功颂德”四个字。该碑名为御制，其实并非朱棣亲笔，碑文应出自某位翰林学士之手。

碑文最后，开列着太祖诸子及孙的名讳，倒没有将朱允炆一笔抹杀，在“孙”一辈题名里，头一位就是：“建文君允炆”，其次为皇太子朱高炽。在《明太祖实录》里，朱允炆也被称作建文君，这三个字是永乐朝官方认可的称谓法。

朱棣在入京之始，就宣布当年仍以洪武三十五年纪年。建文帝垮台了，如果再沿用其年号当然不妥，将本年余下的月日，仍用洪武年号，也可理解。称君而不称帝，是革除其帝位，如元顺帝弃位窜奔之后，就被称为庚申君。

❖ 朱棣粉饰历史

到明代中后期，皇室的这段恩怨已为陈迹，正德、万历、崇祯年间，不断有臣子请追上建文帝、皇后尊号及庙谥。但朝廷的态度并不积极，只是循例下礼部议，而不管议的结果如何，事情总是不了了之。终明之世，朱允炆都只是建文君。直到南明弘光朝时，明朝快完蛋了，才补上庙谥，称“惠宗让皇帝”，小马皇后随其夫，称“让皇后”。清乾隆元年，替古人做好事，改谥建文帝为恭闵惠皇帝，《明史》从之，建文的本纪便作《恭闵帝纪》。

“让皇帝”的“让”字，反映的不是历史的真实，仍属史上常见的蒙着眼睛哄鼻子。但



建文帝朱允炆画像，江苏南京阅江楼。图 / 刘建华 / FOTOE

“让”这个字不是完全无中生有，明中期以后，建文帝“逊国”的传说愈演愈烈。此说谓建文帝见大势已去，就主动逃走了，人称“逊国”。也不要怪此说迂腐，皇帝逃走在君权至上的时代，的确很难措辞。想那位英宗正统皇帝，领着大军出征，却叫人俘虏了，这等难堪之事，作史者犹腴然称“北狩”，说英宗“北狩不返”。那么，建文帝迫于无奈，三十六计遁为上策，而托一个“逊国”的名义，于各方都能接受。

建文朝留下来的史料极少，尤其是第一手的原始材料。朱棣即位后，将建文时廷臣所上奏疏千余通，发给阁臣解缙等人，令其编阅，只保留兵农钱谷等政事的内容，而将对燕王态度不客气，言语有“干犯”的，一切皆焚毁。

这一方面是朱棣向归附的百官故示宽大，表示既往不咎；一方面则借此洗刷、销毁对己不利的文件。他还下令重修建文时已经修好的《明太祖实录》，将其中对己不利的材料改写得干干净净。这便是第二版《明太祖实录》。

可是，朱棣不说“洗洗”就睡，过了若干年，“洁癖”又犯了，仍疑实录洗之不净，又把那“话儿”掏出来重洗，这就是今日所见的三修版《明太祖实录》。好多洪武年间的重要史料就这样佚失了，这还不算，他还随处布雷，埋设下许多伪造的材料，令一些重要的史实因为丧失了关键证据厘之不清了。

经过这一番严密的文网过滤和筛除，现在所能见到的洪武末至建文朝的史料，不仅相当缺乏，而且多是胜利者的一面之词，许多根本就是诬词。

❖ 建文帝“为僧遁去”？

死人不会翻身起来抗议、投诉，可朱棣岂能料到，万世良心不会泯灭，后来的人们叹息国初史事就展开想象力，著文章、编故事，把可怜的建文帝从沉冤百年的地下请出来，让他复活了。

经过朱棣一番严密的文网过滤和筛除，现在所能见到的洪武末至建文朝的史料，不仅相当缺乏，而且多是胜利者的一面之词，许多根本就是诬词。

在正德、嘉靖年间，也就是靖难之役过去一百年后，许多关于“革除遗事”的私人撰述累累而出，大家一起创作，一起凑材料，其中不乏传奇故事。如称刘伯温建南京宫城时，察其风水不利，殿基不稳，将来难免要迁都。明朝原都南京，朱棣始迁北京，刘伯温的话里已暗含了对靖难之役的预言。

那本不太可信的《传信录》还写道：太祖一日问刘伯温：“汝有何术以教朕，使守天下？”“刘大师”怀里岂会无宝，马上道：“有。”即拿出一只小箱子，上挂一把灌了铁汁的锁，说后世非有大变故不可开启。

这是捣鬼军师的典型做派，诸葛亮不是还有三个锦囊吗？在民间讖纬书《烧饼歌》里，朱元璋也令刘伯温说说后事，刘老先生滔滔不绝，竟然把未来五百年的大事全提溜了出来。多数预言隐隐讳讳，费人猜测，但有些事情说得很明白，比如靖难之役，他道：“文星高拱日防西”，说京城当防。朱元璋怪道：“朕今都城竹坚守密，何防之有？”刘道：“臣见都城虽巩固，防守严密，似觉无虞，只恐燕子飞来。”燕子指燕王，燕子飞来，即燕师之来袭也。

靖难之师果然来了，建文帝打开小箱一看，里面藏着一件袈裟、一份度牒，还有一把剃刀，不禁叹道：“此伯温教我也。”遂拔剃遁去。

这是典型的宿命论，刘伯温早算出建文帝命里有此大劫，逃之不过，只求保命，于是留下僧服、僧人身份文件和剃头刀。建文帝逊国故事，大体都是沿着这一思路展开的。

还有一说，称城破之时，蜀王秘密派兵来，将建文帝偷偷接走了（王鏊《王文恪公笔记》）。我想蜀王未必有此胆量，也未必有此能力。但故事为什么单推出蜀王来呢？因为皇十一子蜀王朱椿素有贤名，是诸王中少有的贤王，朱元璋称他为“蜀秀才”，所以人们把这个美誉献给他。然而事情却是子虚乌有。

入蜀说只是“逊国传说”中的一根小分枝，因为太难以置信，所以影响不大。在传说中，

建文帝去得最多的地方，是云南。这是有根据的：一则云南在天日之南，天高皇帝远；一则云南是黔国公沐家镇守，沐家与耿炳文是姻亲，同情建文帝。故传说多把建文帝安排到云南去避难。

建文帝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人们又非常同情他，痛恨朱棣上台之后的暴政，所以还在永乐初年，就已有建文帝未死的传言，顶着东厂、锦衣卫的高压，倔强地冒了出来。

据《明史·姚广孝传》讲：朱棣刚入京，就有人对他讲，建文帝实“为僧遁去”，并且揭发了一位知情人，即建文帝的主录僧溥洽（主录僧是代皇帝在寺庙修行的替身和尚），甚至有人说，建文帝就藏在溥洽那里。

这大约是建文帝“逃禅”的最早传说，建文既“为僧遁去”，自然令人怀疑他的主录僧溥洽。钱谦益《初学集》甚至说，建文帝出逃，就是溥洽替他剃度的。

朱棣将信将疑，因不便大搜寺庙，就借他事将溥洽抓起来严讯，也没问出个所以然。溥洽可苦了，一关就是十七年。

溥洽的好朋友姚广孝（道衍和尚）是朱棣称帝的第一功臣，一直为此内疚。到永乐十六年（1418年）临终前，朱棣问他有何遗愿，他唯一的请求，就是赦免溥洽，这才使其逃脱牢笼。其实，要说朱棣把溥洽关这么久，就是为了追查建文帝的下落，并不可信。朱棣对政敌绝不宽恕的性情，才是他久系溥洽的原因。

❖ 民间“复活”的建文帝

永乐朝的许多政事，也被人往建文帝身上附会，如明末人张岱《石匮书·胡濙列传》记：当时有传建文帝驾崩的，也有称他逊去的，旧臣多从之而去。朱棣疑心转重，便派胡濙“巡天下”，名义上是寻访张邈邈（张三丰），又称搜求异书，实为奉了密旨，遍行郡县，密察

人心，并访问建文帝下落。

因为建文帝在云南的传言尤其多，所以胡濙在南方待的时间特别久。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胡濙还朝，适逢朱棣北巡，驻蹕宣府（今河北宣化），胡濙星夜驰至行在。

朱棣已经就寝，但一听胡濙来了，急忙披衣起床，召之入见，赐座与语。而胡濙说：“不足虑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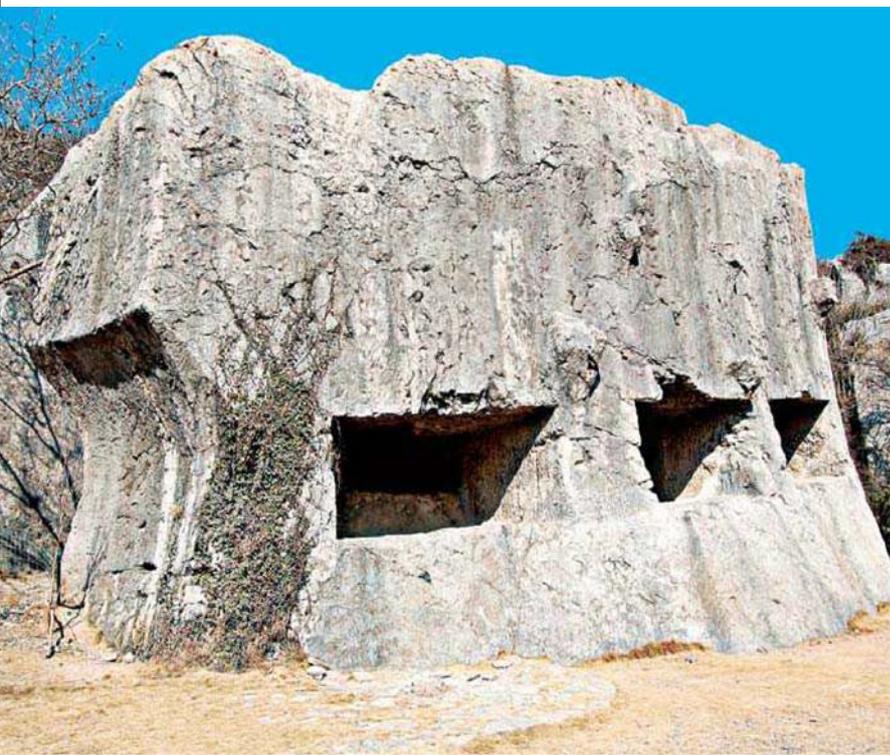
同书还说，胡濙未复命之先，朱棣又听到“建文蹈海”而去的传闻，乃分遣内臣郑和等浮海下西洋。直到胡濙带回“不足虑”的确信，他才完全放下心来。

这故事活灵活现，恰似真事一般，并为《明史》采信。但从其所记来看，朱棣办事似乎轻重不伦：大明王朝那么大地盘，就派一个胡濙跑单帮，访了二十年，胡子都白了，能跑多大点地儿？而另一方面呢，郑和去海外搜寻，披甲数万，战艘数十，迁延数年，往复数万里，阵仗又太大了些。一内一外，一静一嚣，甚不相称。

别看现在没什么人再信郑和下西洋是为了“踪迹”建文帝，然曾几何时，信的人蛮多呢，学者写文章，也热热闹闹探讨过。明代的“掌故大家”郑晓，在《今言》里就笃定地说：“成祖大举下西洋，不亦劳乎？其实派郑泛海、胡濙颁书，是因为国家有大疑，不得不如此啊！”

胡濙在宣德、正统年间做了十几年的礼部尚书，北京地区这一时期现存的碑刻，有许多是他撰写的，基本上都是一些应酬文字。从这些碑文看，此人好交际，且交游广泛，为人性格随和，是个老机灵，无论是佛还是道，他都好一口，标准的好好先生——这样一个人，显然不是密探的底子和材料，如果让他去访建文帝，人选首先就失败了。不过此人溺仙好道，让他去访张三丰，实至名归，访建文帝，应绝无之。

那么，永乐二十一年，他对朱棣说什么“不足虑”呢？看官试想：朱棣皇帝已干了二十二年，其间数度北征，与北虏硬碰硬，还降伏了安南；



江苏南京阳山碑材的碑额，又名孝陵碑材，是明成祖朱棣为颂扬其父朱元璋功德而凿的。图 / 春晓麦 / FOTOE

他调发全国之力，营建北京，又集成《永乐大典》，做出惊人的文化建树。如果这样一位“文治武功一大圣”，还为了一个失了国、逃到鼠洞子里的建文帝忧惧，未免太小看他了！

他所“虑”者，非别人，皇太子朱高炽耳。朱棣对太子很不放心，有确凿的证据表明，他曾命赴南京出差的胡濙，密察在南京监国的太子行事如何。胡濙是根老油条，自然不肯说皇太子的坏话。而皇太子知道他的秘密使命，也是防着他的。等到登基了还记得此事，于是点察御前机密文书，检出胡濙当年的密奏，却见上面说的尽是太子的好话，乃大为感激，胡濙也巩固了他在新朝的宠信地位。

明初的许多故事与史实，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纠缠在一起，令人莫衷一是，难以辨别。

而建文帝可能没有死的消息，却很快在社会上流传开来，成为民间饭后谈资的一种。

英宗正统五年（1440年）时，有一个云南僧人自动站出来，来顶建文帝的包。那时，朱棣死了快二十年，时过境迁，此人不必担心被害，反想借此掇取一份天大的富贵。但假货经不起验，到朝一问，破绽百出，如他说自己年已九十余，而建文帝是洪武十年生人，当时不过六十四岁，相差太远。一打问，才知此人真名杨行祥，河南钧州人，与他同谋的十二人，都是云南、广西一带的僧徒。此人不久死在狱中，同伙流放辽东为军。此案说明，关于建文帝流亡的传说，在当时已经深入人心，就是边防之地的山村野夫都是晓得的。

成化年间，仍有类似的假冒案发生。据梁亿《遵闻录》记载，成化某年，逃亡云南多年的建文帝已经是八十多岁的老翁，不想再躲躲藏藏了，一天他跑到布政司衙门，称自己就是建文皇帝。三司官员大惊，问他现身的目的，他说：“久在外，思归。”云南三司在同黔国公商量后，用囚车将此人送到北京。老头在路上还写了一首诗，其中有“流落天涯八十秋，萧萧白发已盈头”等句。此老上京后，结局如何，该书没有交代。而《从亡随笔》一书，则明白写道，建文帝得获善终，被迎入大内奉养起来。

如此等等，建文帝逊国故事，渐渐从一丝轻风，变作一股劲风；又由一张草图，渐而设色，成为一幅人物众多、场景复杂多变的长卷。终于在万历时，一幅完整的建文帝逃亡路线图被绘制出来，并把随帝逃亡之人、逃亡期间的故事、逃亡所经的人与事等等，交代得环环相扣、清清楚楚。而社会上一般人，也多倾向于接受出亡说。如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说：建文帝“天位虽不终，但自保之智有足多者”，即婉转地表明了态度。“自保之智”，是说建文帝善于躲猫猫，朱棣就是抓他不着。^①

（摘自《大明王朝家里事儿》太白文艺出版社，有删节）

蓝鲸行动：美刺杀蒋介石秘闻

文 | 潘前芝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与美国是同盟国，共同抗击日军。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在二战后期，美国人曾经想过刺杀蒋介石，并拟制了一份详细的刺杀计划。只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个计划并没有付诸实施。

◆ 刺蒋计划的内幕

最早曝光这一刺杀计划的是曾任中国远征军副司令和参谋长的多恩（Frank Dorn）。他在1969年5月7日一封写给美国陆军部的信中透露，当年他在史迪威的授意下曾经拟订过一项可行的刺杀蒋介石的方案并得到了史迪威的同意，代号“蓝鲸行动”。

这份刺杀计划方案是：利用蒋介石夫妇1944年3月中旬应邀访问印度的时机，当蒋介石座机飞临喜马拉雅山上空时，佯称飞机发动机发生故障，机上所有乘客弃机跳伞，而给蒋介石夫妇准备的降落伞事先做过手脚，到时候全部打不开，两人必然坠地而亡。当然，为增加事故的真实性，其他几具降落伞也会失灵，因此要搭进去几名美军军官。

为此，他们特意找来当时在中国的美军14航空队情报处处长莫瑞特，共同研究每一个技术性细节，并决定，为防止泄密，要到行动时才对飞行员下达命令。

该计划的执行期限为三个月。不巧的是，到3月初，蒋介石正准备访印时，日军发动了豫湘桂战役，中国战局趋于紧张，蒋介石被迫取消了访印计划。三个月的期限很快过去，这项计划也就不了了之。

刺杀蒋介石的命令是谁下达的？据多恩回忆，史迪威让他拟制刺杀计划时，并没有具体说是谁下的命令。不过史迪威强调，是来自最高层。

1943年底，史迪威从开罗回来后，来到昆明



1943年，蒋介石视察远征军，与史迪威握手。

的远征军司令部向在那里的多恩传达了一道绝密的口头命令。史迪威对多恩说：“你如果无法与蒋相处，又不能把他换掉，那就一劳永逸地把他干掉算了。你明白我指的是什么，选派一个对你言听计从的人去执行吧。”依据当时的情况，不难推测，这个“最高层”应该就是美国总统罗斯福。

罗斯福果真给史迪威下过这样的命令吗？从目前已解密的各方档案和文件资料中，都找不到相关的证据。那么史迪威所传的口头命令是哪里来的呢？

1943年底，罗斯福在参加了德黑兰会议后返回开罗，并召见了等候在那里的史迪威等人。史迪威在他的日记中详细地记录了这次会谈的内容。罗斯福问史迪威：蒋介石能够挨多久。史迪威回答：情况很严重，如果日军重来一次去年五月的攻势（即浙赣会战，1942年5月14日，日军第13军率先向浙赣路东段发起进攻，其目的主要是占领或破坏浙江一带机场及其他交通线，防止美军轰炸机借由浙江机场威胁日本本土——作者注），

蒋介石可能会垮台的。罗斯福说，那么我们得寻找另外一个人或者另一个团体去继续。史迪威的政治顾问约翰·戴维斯也参加了这次会谈。他回忆：当他问假如蒋介石被推翻，美军司令部应该采取什么行动时，罗斯福回答，谁接替他的职位，我们就支持谁。

这两者都没有出现多恩所谓的“干掉”等词语。所以，真实情况可能是这样：史迪威从这次会谈中罗斯福的一些语意含糊的话语中，认为领会了罗斯福想除掉蒋介石的暗示，于是作为命令传达给了他的副手多恩。

❖ 刺蒋计划真正的主谋

罗斯福真的想除掉蒋介石吗？或者说，史迪威所领会的暗示是罗斯福真实意图的表达，还是史迪威自己断章取义呢？

综合当时会谈的语境看，罗斯福应该是没有想过要除掉蒋介石的。

在与史迪威会见前，罗斯福先后参加了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在开罗会议上，中、美、英三国商定“1944年雨季前，盟国将使用陆、海、空军，尽快作出努力以重新打通经由缅甸至中国的交通”的计划。罗斯福还特意单方面向参会的蒋介石保证，缅甸战争必定会包括海军攻击，而且登陆作战时间也会提前。然而，随后召开的德黑兰会议，这个计划就被否决了。此时，中国还蒙在鼓里。罗斯福作为大国领导人言而无信，按常理推断，他的心里肯定有愧疚感。所以在谈话中问起蒋介石还能支撑多久时，他应该是担心美国对缅甸战争失信，可能会危及蒋介石的前途，而不是落井下石地想把蒋干掉。而且，在这次会谈中，他还提出增加驼峰航线的运输量，意图就是在物质上对失信中国的补偿。如果罗斯福真的下令让史迪威刺蒋，史迪威就不会在当天的日记中这样失望地评价他的总统：“老天爷，他真是糟糕透顶，我们走出门的时候快要作呕了。”

因此，刺蒋命令很可能是史迪威自作主张、假传命令了。史迪威之所以要这样做，源于他和

蒋介石之间的深刻矛盾。

蒋与史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应蒋介石要求，美国派史迪威来华担任参谋长。随后，史在与蒋的共事过程中，双方在人事任免、军事指挥以及援华物资调用等方面冲突不断，加上二人的性格不合，双方矛盾不断加深。蒋介石评价史迪威“不法无礼”“无人格已极”。史则因为蒋的光头给其取外号“花生米”，并在日记中骂蒋是“小杂种”“响尾蛇”。在这种情况下，史迪威产生了换掉蒋介石另立他人的想法。早在1943年3月的一天，史迪威就曾对他的副手多恩说：“为了进行战争，我认为要将那些绊脚石统统搬掉，何应钦——搬掉，甚至连那位蒋委员长——也要搬掉。我们应该使陈诚在美国的支持下当权。”

德黑兰会议后，罗斯福致电蒋介石，对英美两国违反开罗会议承诺和导致缅甸作战必须延期一事表示道歉。这让一直强烈盼望尽快开展缅甸战争的史迪威很受打击。自从中国远征军在缅甸对日作战失利后，史迪威做梦都想打回缅甸去一雪前耻。当蒋介石表示坚决不肯由中国单独负担在缅北作战任务时，史迪威长期积累的怨气终于爆发，很有可能就是他抓住罗斯福的只言片语，把他扭曲成为授权制定一个暗杀计划，必要时除掉蒋介石。

这个事件已经过去70多年，离多恩首次公开刺杀事件也有40多年了。奇怪的是，除了多恩的回忆录，找不到任何能直接证明这项计划存在的证据，在罗斯福、马歇尔、史迪威等当事人的档案中也找不出任何蛛丝马迹的证据。

即使如此，笔者认为，多恩所曝光的刺蒋事件并非是他自己虚构出来的。因为这件事在他的军旅生涯中并不是什么突出的业绩，他没有必要杜撰这样一个莫须有的事件。罗斯福下令刺蒋尽管从情理和逻辑上讲不太可能，但大国间关系的微妙以及领导人想法的多变，就在于变不可能为可能。史迪威除蒋行为符合情理，但也缺少直接证据。目前，美国军方仍有不少未解密的文件。也许，就在某一份尚未公开的档案中，存在着足以支持多恩说法的证据，会在将来为我们再次揭开这段尘封的历史。①

费孝通： 中华文化诊疗的践行者

文 | 陈杰



中华文明有着悠久的历史，在这漫长的文化形成过程中，中国文化形成了一种类似汉堡包的结构：上层的统治阶级文化、下层的乡土文化以及将这两种文化扭结在一起的中国乡绅文化。中国历来不缺乏对于上层统治文化的研究，从古至今的正史典籍都可以看作是对于上层文化的记载和研究，而对于下层乡土文化的研究则仅仅是散见于一些野史、小说中，即使所记载为真也缺乏可靠的证据支撑。因此，进入近代以来，随着西方社会科学的传入，对中下层传统文化的研究变得紧迫起来，毕竟当时的中国有 80% 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广大的农村。

由于中国的最主要阶层是农民，所以对于下层文化的研究也就要求研究者不得不深入到未知且落后的乡下进行实地考察。费孝通作为“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一员，正是这种文化研究方法的倡导者与践行者，他一生都致力于进行对中华文化的艰难而又硕果累累的诊疗之路。

❖ 弃医从文

1910 年 11 月 2 日，费孝通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县松陵镇一个开明士绅家庭。他的父亲费璞安在清朝废除科举制后，曾经东渡日本留学，在“教育救国”思想的影响下，他选择了教育专业。费家与清末实业家张謇交情很深，张謇的儿子属“孝”字辈，为纪念父辈友情，费璞安的小儿子取名为“孝通”。

费璞安留学回国后，曾应张謇之请，于 1909 年 1 月到张謇创办的通州师范学校执教。后来，他回到家乡创办学校，直到年迈离开公职，他把相

当多的心血用于教育事业，是江苏近代教育史上
一位著名的教育家。

费孝通的母亲杨纫兰出身于当地名门。她自幼在家中学习，后来毕业于上海务本女学，受到良好教育。二十世纪初，妇女解放的思潮激荡着中国的思想界，杨纫兰的思想也发生着强烈的共鸣。她创办了一所蒙养院，类似于现在的幼儿园，目的在于以先进的理念辅助家庭教育。

费孝通的父母这一番以天下为己任的作为，在社会上是唤醒民众的呼号，在家里则充满着启蒙的教育气氛。费孝通呼吸着这样的空气，在母亲创办的蒙养院中，一天天长大。在这个教育为先的家庭中，所有的费用支出都是先扣除教育费用之后，再以余钱做其他安排。为了在家庭收入微薄的情况下，使孩子们都能得到正规的教育，杨纫兰让五个孩子间隔开求学，上大学和读专科交叉安排，因为上专科可以不用家里花钱。正是这个开明的家庭给他未来的写作提供了充足的一手资料，比如，因为他的姐姐费达生和姐夫郑辟疆在江苏吴江的开弦弓村（学名江村）的蚕丝生产，他完成了奠定其学术地位的《江村经济》，他的乡绅家庭帮助他完成了《中国乡绅》一书等等。

1928年，费孝通在东吴大学附属一中完成了中学教育。中学毕业后，他进入了东吴大学医学预科，并成为东吴大学学生会秘书。

东吴大学是一所教会学校，身处教会学校的进步学生们关注着祖国命运，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反帝国主义强权的情结，这导致他们和学校当局时有冲突。

1929年，一次个人间的冲突引发了学生和校方的激烈对抗，酿成学潮。大体过程是，费孝通的室友孙令衡去校医院看病，被一个校医打了一拳。学生们表示抗议，学校当局却袒护校医，最终导致学生罢课。后来，校方要开除罢课活动中的学生会成员，费孝通也在名单上。由于他平时学习成绩优异，被从轻处罚，免遭开除，只是被勒令转学。

这件不公平的事刺激着费孝通的良知，他不得不去想，医学到底能不能成为自己一个安身立命的所在？渐渐地他意识到社会的当务之急绝不会是对个人身体的疾病进行治疗。1930年，他由东吴大学转学到北京的时候，他放弃了协和医学院的成就名医之路，而是选择了燕京大学的社会学系，开始了对于中华文化的诊疗之路。

❖ 瑶山之痛

费孝通的一生都在做两件事：实地调查和写文章。然而，在这两件事开始的时候却是他人生中极大的不幸，这也成了他一生的痛。

1933年，费孝通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毕业，由于全国只有清华大学开设了人类学课程，于是他进入清华大学，师从俄国著名人类学家史禄国进行人类学训练。在燕京大学最后一年，费孝通结识了女同学王同惠，后来，王同惠成了他志同道合的女朋友。王同惠考入燕京大学的动机既有求知的欲望，又有不一样的想法。有一次，她在和费孝通翻译外国学者对于中国的研究著作时说：为什么我们自己不能写出这样的书？

后来，费孝通两年的研究院生活结束，在出国深造之前，他获得了一次到广西瑶山进行当地少数民族调查的机会。王同惠表示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于是她决定和费孝通一起到广西进行实地考察。

1935年暑假，费孝通和王同惠的婚礼在燕京大学临湖轩举行，临湖轩是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住宅，司徒雷登是他们婚礼的证婚人。婚礼进行之后，他们一起踏上了广西少数民族实地调查之路。

广西当地自然环境恶劣，语言不通、水土不服，费孝通和王同惠凭借着对科学的热爱，在重重困难中心平气和、积极有效地逐步推进研究计划。1935年12月16日，这次调查研究计划却因为一次不幸而中断了。在从古陈到罗运的途中，

01
—
02

01

费孝通。

02

费孝通在江村考察。

费孝通和王同惠走错了路，误入一片竹林之中。天色逐渐暗了下来，他们摸索着向前行走，看见一处像门一样的东西，以为是到了村庄。费孝通靠近观察，没想到那是村民为捕捉野兽而设置的陷阱，机关触发，巨木大石把费孝通压在了下面。慌乱之间，王同惠奋不顾身把木头石块逐一移开，但费孝通已经站不起来了。王同惠再三安慰丈夫之后，连夜下山找人前来救援，途中却不幸坠崖身亡。费孝通艰难等待一夜，次日破晓，他忍痛向外爬行，竟爬了一天而未见人。直到薄暮降临，才遇到一村民，把他背到家中。村民一边安排救治，一边派人四处寻找王同惠，终于在七天之后，在一处山涧中发现了王同惠的遗体，那一天距离他们结婚仅 108 天。

王同惠的不幸离世给费孝通带来了极大的影响，他在给自己的老师吴文藻的信中说：同惠为我而死，我不能尽到保护她的责任，就应该追随她而去；但是，不知为什么我屡次求死不能，这应该是同惠在天之灵，留我在人世完成未尽的责任，我将会以同惠的名义，将社会研究进行到底。正是这次调查，使得费孝通完成了他的第一部著作《花篮瑶社会组织》。

❖ 初心不改

瑶山调查使费孝通付出了新婚妻子殉职、自己身负重伤的天大代价，这一切没有阻止他沿着自己既定的调查研究路线前进。而他在养伤期间完成了对他未来学术至关重要的江村调查。他对中华文化的诊疗也从少数民族地区的小试牛刀转变为对汉族地区的宏大视角的观察。

为了养伤和平复自己内心的痛苦，更为了出国学习做准备，费孝通于 1936 年夏天回到了家乡江苏吴江的开弦弓村。在住下之初，他没有想过去做调查。在这个村子里，他的姐姐费达生作为蚕丝专家正在帮助村民创办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这个合作社的生产场面使费孝通亲眼看见了传统

农民与现代缫丝机器的结合。他为现代工业进入中国农村生产和生活而激动，并被强烈吸引。他觉得面前的事情意义重大，应该记录下来。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费孝通进行了如鱼得水的实地调查。到结束这次调查时，他搜集到的关于经济生活和社会制度的材料，已足以供他作初步分析之用。

王同惠连夜下山找人前来救援，途中却不幸坠崖身亡。费孝通艰难等待一夜，次日破晓他忍痛向外爬行，直到薄暮降临，才遇到一村民。七天之后，在一处山涧中发现了王同惠的遗体，那一天距离他们结婚仅 108 天。

后来，费孝通带着江村调查素材到英国留学，师从当时国际著名的人类学领军人物马林诺夫斯基，马林诺夫斯基一眼就看出了费孝通江村调查所具有的非凡价值。在导师的指导下，费孝通以江村调查为题材，顺利地完成了博士论文，并在 1939 年以英文出版，后来这本《江村经济》成为了国际人类学经典著述。

1938 年 10 月，费孝通从英国学成归国，因为抗日战争，他不得不乘船从越南登陆，并辗转来到昆明，见到了先他而到的恩师吴文藻。在吴文藻的安排下，他以云南大学教授的名义在云南大学和西南联大任教，并继续他的实地研究。

1940 年，昆明遭到日军的轰炸，费孝通不得



1947年12月，北平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学生到胜因院39号费先生寓所请教时合影。前排左起：费孝通、费孝通妻子。图/张祖道/FOTOF

不带着“云南大学—燕京大学社会学实地调查工作站”迁出昆明，疏散到昆明附近的呈贡县农村里去。这年冬天，工作站安置在呈贡县的古城村南门外一座魁星阁里。费孝通和他带领的研究者在恶劣的环境和纷飞的炮火中坚持进行着科学研究。

1939年，费孝通第二次结婚了，他的妻子叫孟吟。孟吟不属于学界先进的人物，但也受过专科教育，是个知识分子。在1940年底，他们的女儿出生了，为了纪念王同惠，他给女儿取名为“费宗惠”。

抗战期间，费孝通经历着精神与物质的双重压力。日军的轰炸使他的家面目全非，他不得不随时准备着躲避轰炸，物资的短缺使他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来维持抗战时期的艰苦生活，他不得不多写文章来补贴家用。最困难的时候，他甚至在云南大学校门口的茶馆里设立摊位，等人前来约稿。

1943年，费孝通作为云南大学的教授代表出访美国，这给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后来他写成了《初访美国》一书。从此，他开始以文化比较的观点来重新审视中华文化。

抗战胜利后，经潘光旦介绍，费孝通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当时，民盟的主张是拥护团结、反对内战，并支持学生运动。对此，蒋介石恼羞成怒。于是，蒋介石决定用谋杀手段，除掉民主教授中最敢讲话的人，在暗杀名单中就有费孝通。在抗战与内战时期，费孝通面临着艰难的环境却写出了大量的学术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是1947年的《生育制度》和1948年的《乡土中国》及《乡土重建》。

同众多的知识分子一起，费孝通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华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这给了像费孝通这样的知识分子以很大的希望，费孝通选择留在大陆的原因是：他可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作。

◆ 暮年之旅

“春到人间，老树也竟然苗出了新枝。”这是费孝通在1957年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那篇文章《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里的一句话。这句话仿佛预言了他即将到来的生活。

1980年，曾经历过磨难的费孝通获得了解脱，但是随之而来的却是一种紧迫感。正如费孝通说的，他还有十块钱。十块钱象征着他还有大约十年的时间进行工作，来日无多。所以，最重要的是十块钱该怎么花，他选择通过他最擅长的方式进行实地调查，以此来为农民的丰衣足食和建设小康社会建言献策。

于是，从1981年到1985年他先后七次重访江村，在一次又一次的访问中费孝通不仅看到了乡

土中国的变化，更看到了乡土重建的速度。他为农村生活的逐渐现代化而欣喜，中国的农民找到了一条不同于欧美的现代化道路，那就是在农村自发产生的乡镇工业。“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乡镇工业被费孝通成为“草根工业”，他不断地呼吁对乡镇工业的重视。乡镇工业变成了新时代农民致富的重要手段，得到国家的认可与支持。

费孝通的晚年是在忙碌中度过的，他的主要工作内容就是实地考察，以此来推动农民的小康化建设。但是，费孝通毕竟不是一个经济学家，他天生有着一个文人所拥有的人文关怀和文化自觉。因此，即便是不断地处在为农民丰衣足食而奔波的道路上，费孝通的脑子里也在为更深的文化层面的问题而思考。

在农民家里聊天、和基层干部座谈时，他用



费孝通（左一）和瑶民在一起。

费孝通生平 +

1910年11月2日

出生于江苏吴江。

1928年

就读于东吴大学（现苏州大学），读完两年医学预科。

1930年

就读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

1935年

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生院社会学人类学系，师从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

1938年

获伦敦大学研究院哲学博士学位。论文的中文名《江村经济》。

1938年

回到中国，任教于云南大学社会学系。

1945年起

历任西南联大教授，清华大学教授、副教授。

1952年至1957年

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

1982年

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1985年

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

1999年11月

任上海大学上海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2005年4月24日

在北京逝世。

通俗的语言问了一个问题：“富了以后怎么办？”到目前为止，这恐怕是大多数追求财富的人也没有想过的问题，大家想的是怎样追求财富和怎样消费财富。同以前一样，费孝通又一次在社会问题上超前了。这可能是因为改革开放后的社会变化使得费孝通确信了中国农民的未来是富裕的，但是传统文化的缺失将会成为社会的主要问题，他不得不为此而担心。

费孝通终于又回到了他的中华文化诊疗之路上，如他所言：中国的问题根子上是文化的问题。这样的思考让他促成并出席了“现代化与中华文化研讨会”。1983年3月7日至11日，首届研讨会在香港中文大学祖尧堂举行，有三十二位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的主要问题是讨论在不同的政治背景和意识形态下，中华文化的角色是怎样的？中华文化的延续和转化会怎样？

费孝通一共参加了六届研讨会。1999年11月2日，费孝通90岁生日这天，第六届研讨会在费孝通的家乡吴江举行，会议的主题也就成了拥有包容性的文化重建。

2004年整整一年，费孝通是在医院里度过的，对于他这样一个进行了一辈子实地调查的学者来说无疑是痛苦的。

2005年4月24日，一个早春寒冷的天气，费孝通走完了人生路程。老人在中华文化诊断的道路上走了很久，虽然中间有过艰难的坎坷与长期的停滞，却依然给后来走上这条道路的人留下了宝贵的经验财富。

文化建设是社会研究的重要课题，对于中国而言，不仅是文化建设，更重要的是文化的重建。如费孝通所言，中华文化的诊疗之路他也只是完成了“破题的一步”，这条路还很漫长，需要更多的人参与到这条中华文化的诊疗之路上来。^①

（本文参考文献：戴维·阿古什著《费孝通传》、费孝通著《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和《乡土重建》等）

上海江湾机场：60年风云沧桑

文、图 | 应民吾

江湾机场成为当时远东最大的军用机场，有4个指挥台，其跑道长1500米，用三合土与沥青混合浇铸而成。多条跑道组成“米”字形，飞机可以从各个方向起降。



江湾机场航拍图，右边为黄浦江。

在 1945年9月4日夜，一架美军C-54运输机降落在上海江湾机场。这架飞机上的主要人物是中国军队第三方面军的两位副总司令张雪中和郑洞国。他们前来接收被日军占领了8年的上海。

27岁的上尉参谋黄仁宇和其他24名军官士兵也在这架飞机上。黄仁宇后来在《黄河青山》《大历史不会萎缩》等书中回忆这一刻时写道：“我们的C-54下降时，看到边缘尚有20多架驱逐机一线排列整齐，机翼、机腹上的红圆徽令人触目惊心。”“前来迎接我们飞机的日本陆军及海军军官，一点没有我们预期的不快或反抗态度。他们举止体贴有礼，甚至显得快活。”

这是1937年11月上海全境沦陷以来，中国正规军军官第一次踏上上海的土地。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通过广播发表《停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在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签署投降书。

黄仁宇也许知道，他当年踏足的江湾机场，在8年前淞沪会战时并非机场，而是一个水乡小镇。

❖ 两次淞沪会战

江湾机场所在地，原来叫殷行镇，又名殷家行，得名于明朝人殷清。殷清是松江府上海县人，明正德年间任上林苑录事，后抛下这个从九品的

小官返乡从商，在宝山县虬江（今上海杨浦区内的一条河流）一带开店。此地因而慢慢形成集镇，称为殷行。

殷清经商后富甲一方，但乐善好施。嘉靖年间，殷行地区两度遭受灾害，殷清均出银出粮，赈济灾民。他对村民说：有能够挑土来堆在我屋后的，我拿粮食换。灾民知他不愿给人以施舍的感觉，遂纷纷肩挑送土而来。两度赈灾之后，其屋后有了一座土山，灾民还为土山砌石、植树、修筑亭阁。宝山境内仅两座山，一座是宝山，一座就是这座“依仁山”。殷清去世后，葬于依仁山。

到了清代，殷行镇最盛时，东西向的镇街有三里长，附近形成了20多个自然村。镇上庙宇林立，人烟稠密。光绪十年（1884年），殷行还开办了宝山（当时属于江苏）境内最早也是上海最早的牧场陈森记。

到了民国年间，由于殷行与繁华的虹口、航运枢纽吴淞、工业区杨树浦等地邻近，此地开始城市化，道路、电厂、实业先后兴建办起。1928年，殷行从宝山县划归上海特别市，称殷行区，面积30.27平方公里。

此时的上海，刚刚进入民国“黄金十年”（从国民政府1927年4月18日定都南京，到1937年11月20日迁都重庆）的大建设时期。政府欲在其无权管辖的租界之外，建设一个文明程度足与匹敌的新上海。殷行距政府的“大上海计划”拟建的新市中心——五角场不远，前景正是一片看好之时。

然而，很快就发生了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中日在上海首次交战。这场战役期间，殷行处于日军驻军（虹口、杨树浦）和增兵（吴淞）的地点附近，成为中日军队拉锯战涉及的区域。时任第八十七师第二六一旅旅长的黄埔一期生宋希濂后来在其回忆录《鹰犬将军》中提及了两军在殷行附近的部署与交战：“本旅接防后，积极增修工事，并派出少数搜索部队渡河去，施行侦察，与日军警戒部队常有小接触，在殷家行附近的日军炮兵，常不断向我射击。”“而我左翼部队的绕袭，更使在殷行镇附近的敌军炮兵阵地感到威



美军飞机成了上海日军的噩梦。据上海地方志记载，从1944年7月起的一年间，美军至少12次轰炸上海的日军目标，其中多次针对包括江湾机场在内的5个机场。



胁。”

不过，“一·二八”之战被双方控制在一定规模内。当年3月，中日停战。此战似乎对殷行镇破坏不大。

1937年8月13日，第二次淞沪会战开始。在此次战役前期，殷行北面的吴淞是日军的主要登陆点，到了9月6日，日军在离殷行更近的虬江码头登陆后，殷行南边不远的复旦大学、江湾镇成为中国军队“以血肉作长城”的又一阵地。历史在此处有一个巧合：在这一区域作战的中国主力部队——36师的师长，正是宋希濂。这次其部队的战区，与1932年时相去不远，多有重叠。36师血战两个多月，部队多次补充新兵（如第212团原有2000多人，迭次补充的新兵也达2000多人），阵地巍然不动。直到11月5日，日军在金山卫登陆后，36师才随全军撤退。

此次战役中，殷行北面的吴淞、宝山、罗店，西面的大场，西南的江湾、南面的杨树浦等地，都打得天地变色，死伤枕藉。而殷行居于腹地，并非要冲，故而未见有重要的战斗载于史志。

❖ 日军在华最大机场

殷行镇的灭顶之灾出现于日军占领上海之后。1939年，日军强行驱逐殷行古镇和周围几十个村的村民，将这个有400多年历史的古镇付之一炬，圈地7000亩建造军用机场，两年后完成，称为江湾机场。

据统计，1933年，殷行镇有正户3629户、附户3425户，共42229人。到了1940年，居民减为4130户，共20114人。人口的锐减，是日军杀戮和驱逐村民所致。

江湾机场成为当时远东最大的军用机场，有4个指挥台，其跑道长1500米，用三合土与沥青混合浇筑而成。多条跑道组成“米”字形，飞机可以从各个方向起降。

对于日军在上海的5个机场，当时的中国空军尚无力远道前去奔袭。但1941年12月珍珠港事变之后，美国卷入战争，情况就不同了。在原先

美国航空志愿队（飞虎队）部分人员的基础上组建了美国驻华航空特遣队，1943年3月升格为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陈纳德任少将司令。

太平洋战争期间，日军在中国大陆沿海及中国台湾的机场，对美军构成了威胁。1944年7月8日，美军飞机首次空袭上海的日军。11月10日，美军飞机对日军进行大规模轰炸，主要空袭江湾机场、龙华机场和停泊在黄浦江中的日军军舰等。日军只进行了零星高射炮射击，未升空应战。

1945年初，美军侦察机的照片显示日军正在上海郊区扩建机场。情报人员认为，扩建机场的目的是将菲律宾的日机转移过来，以防它们在那儿被美军摧毁或缴获。

日军的扩建之举得到了史料的印证。上海市民陆金生2012年在报纸上撰文说：“而1944年，也是我们陆家难以忘怀的一年。这一年是离日本战败日子不远了。然而日本侵略军为了作垂死挣扎，原本占据了大量江湾乡农民的土地已建造了江湾飞机场（江湾机场最初强占的土地除殷行镇之外，还包括江湾等附近乡镇的一部分——笔者注），现在又要扩建江湾机场。我们陆家宅位于淞沪路桥西首，也未能幸免于难。日本侵略者把我们陆家同其他附近村的农民从家园上赶走。手无寸铁的普通农民有什么办法呢……”

1月17日，陈纳德麾下第14航空队第23战斗机大队的20架“野马”P-51战斗机从位于江西赣州和遂川的基地奔袭而来，轰炸了大场、虹桥、龙华这三个日军机场，共有73架日机在地面和空中被摧毁，成为第23战斗机大队历史上最成功的一次攻击行动。

3天后，第23战斗机大队再度飞临上海上空，这次把江湾机场和丁家桥机场也纳入了攻击目标，但上海上空的大量烟尘造成的低能见度阻碍了攻击的顺利展开，结果战绩非常不理想。

美军飞机成了上海日军的噩梦。据上海地方志记载，从1944年7月起的一年间，美军至少12次轰炸上海的日军目标，其中多次针对包括江湾机场在内的5个机场。

其实不止美军飞机，当时中美两国空军组建了一个混合团（中美空军联队），中国空军史上的传奇人物——击落过日军和美军飞机、在开国大典上第一个驾机飞越天安门上空受阅的邢海帆，作为该混合团第三大队第二十八中队分队长，就曾奔袭过江湾机场。

1945年4月上旬，日军频频从上海出动轰炸机和自杀敢死队性质的“神风”攻击机，轰炸在琉球群岛登陆的美国海军舰艇和登陆部队。为配合美军作战，4月1日7时，邢海帆率队驾驶40多架刚换装的P-51“野马”战斗机，从陕西安康



01
—
02

01
1928年的上海区划图。

02
美军第14航空队部分飞行员。

基地起飞，经湖北、安徽、江苏，历时4个小时飞临上海上空。邢海帆率队冲向江湾机场，发现一架日机正在跑道上强行起飞。他立即瞄准攻击，日机中弹起火，坠地爆炸。邢海帆及其战友拉起飞机后又与日机进行空中格斗，击落多架日机。此次行动持续了3天。

◆ 鼎革前后

1946年3月，黄仁宇随调任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的郑洞国前往锦州。大约两个月后，国民党军宪兵六团从南京来到上海，等待去东北的船。这个团中有个叫王鼎钧的21岁新兵，是前一年10月初中毕业、投笔从戎的。他在江湾机场看到，机场在遭受多次轰炸后尚未修复，仍由日俘继续施工。这时的江湾、杨浦一带，原先日军的军事设施尽被中国军队接收，日俘也主要关押在江湾的集中营。

1945、1946年的江湾机场，见证过陈纳德、陈香梅的小别重逢，还迎来过蒋介石。1946年5月，蒋介石的专机“美龄号”载着蒋介石视察南京、上海和北平。所经之处，迎接的人流如潮。一次在上海，大场机场因欢迎的人太多，专机只能改降江湾机场。

光复之后，江湾机场驻扎过国民党空军的第二地区司令部和多个大队。1947年底之前，美国空军也曾驻扎在这儿。

这个机场还送走过到东京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进行公审的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1946年5月27日晨7时，代表团一行15人来到江湾机场，乘坐中国空军第8大队派出的B-24轰炸机飞赴日本。

在机场，有记者问代表团团长、陆军中将朱世明，为何不坐客机而坐军用轰炸机？朱世明答道：我们是以战胜国的姿态去的，我们乘坐的B-24轰炸机除不携带炸弹外，机关炮是不能拆卸的，以示我们进出日本，显示国威军威。

时间很快走到了鼎革之时。1949年的一天，

国民党空军从江湾机场、南京明故宫机场空运55.4万两黄金到台北松山机场，并入蒋介石秘密运往中国台湾的400多万两黄金之中。5月16日上午，蒋经国坐专机离开江湾机场，前往浙江定海向蒋介石汇报上海军情。当他5月22日乘飞机想降落在江湾机场时，接到了地面指挥部的紧急报告：江湾机场已经落下解放军的炮弹，不可降落。飞机只好折回中国台湾嘉义机场。这成为蒋经国与上海的最后告别。

在解放上海之前，中共地下组织曾有策反国民党上海驻军起义、实现和平解放的计划，其中江湾机场就是重要的一环。当时，国民党军队第四兵团中将副司令兼参谋长，曾任蒋介石侍从的中共地下党员陈尔晋有一整套方案：策动驻在江湾一线的装甲部队，在适当时机开进江湾机场，截断空中退路，策动第四兵团、第五十四军等守军，在解放军接近上海时停止抵抗。但1949年5月，地下党内出现叛徒，向上海警察局长毛森交代了陈尔晋策动起义的计划。陈尔晋夫妇被捕后于19日就义。

5月24日，国民党军队撤离上海，炸毁了江湾机场的油库。王鼎钧在其回忆录《关山夺路》中说：“通往吴淞口的公路上……一路上右方和后方远处几处火头，后来知道国民党烧毁了汽车千辆和机场仓库里的物资。”

王鼎钧爬上一条意外而至的运兵船，仓皇而去，后来成为中国台湾著名的散文家。而黄仁宇则在那个从香港前往横滨，加入中国驻日代表团，两年后赴美读书，后成为历史学家。

江湾机场后归解放军空军第四军使用，1994年6月起停飞（3年后机场用地交还上海市政府）。因多年来一直是机场，这块近9000亩的土地上植被繁茂，河泾自流，加上此后近10年的荒废，居然恢复到了400多年前殷墟来到此地时的面貌，成为上海市区最大的一片湿地。直到2003年，推土机隆隆而至，此地开始兴修基础设施、大规模开发房地产，这个区域，现在称为“新江湾城”。^①

潜龙飞天 ——潜水航母的传奇

文 | 匡济

潜艇与飞机是伴随工业文明出现的两大新式武器，一个潜入水中，以隐蔽性见长；一个翱翔天际，打击力强大。若是能将两者结合，造出一种能潜水的航母，其威力可想而知。在潜艇、飞机刚刚问世不久的岁月里，便有许多军事强国试图造出这样一种武器来，这种努力到至今都在继续，以致于许多人都坚信，未来的海军之王，不再是浮在水面上的航母，而是这种藏在水下的航母了……

❖ 先行者——轰炸目标是伦敦

潜艇的起源很早，传说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就曾设想过要制造一个出来，近代意义上的潜艇则是美国人所发明，而将其发展成一种极具威

力之战争武器的，则是德国人。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人就已开始大规模应用潜艇作战，而潜水航母的灵感，也就是萌芽于他们的灵机一动。

当时德国有一位名为弗里德里希·冯·阿诺德的海军空勤部队中尉，当他于1914年年底，带着麾下两架 FF.29 型水上侦察机到达德军占据的比利时泽布勒赫港时，其锐利目光似乎能穿越两百来公里的英吉利海峡，直达英国本土，没看多久便萌生出要用他的飞机去炸伦敦之念头。

需知当时距离莱特兄弟发明飞机还不过十来年，这种还比较原始粗糙的东西基本上只用于侦察，主要武器是飞行员的手枪。但阿诺德中尉却天才地预见飞机具有将战火烧到敌国本土的能力，那就是轰炸。



一战时，搭载 FF.29 型水上侦察机的德国潜艇。

说干就干，阿诺德中尉遂利用手头的工具，对飞机进行改装，将陆军用的 M18 式木柄手榴弹当做炸弹弄了上来，满满的装了二十来颗，载弹量在当时算是惊人了。

1914 年圣诞节，阿诺德中尉亲自驾机出击，目标：伦敦。依靠他的飞行技术和英国人的懵然无知，飞机成功靠近伦敦，眼看英国人就要成为史上首次水上飞机轰炸的受害者，却不料飞机发动机传来阵阵异响——快没油了，再不返航就要掉海里了。阿诺德中尉不得不将他那一堆“炸弹”扔在了伦敦郊外的荒地上，炸没炸就不得而知了。

匆匆返航归来的阿诺德中尉，又将目光放到了一艘刚刚抵达泽布勒赫港的德军潜艇 U-12 身上，灵感乍现——不就是燃油不够、航程不够吗？我把飞机弄到这艘潜艇上，让它运着飞机靠近英国本土，然后再放飞飞机不就得了？反正都是水上飞机，有浮筒，从水上起飞并无大碍。

行动派的他马上找到这艘潜艇的指挥官瓦尔特·福斯特曼，后者也对此奇想产生浓厚兴趣，一拍即合。于是，在对飞机和潜艇进行匆忙改造之后，1915 年 1 月 15 日拂晓，U-12 带着一架飞机出击了。

这是创造历史的日子，只不过有些出师不利。

本来原计划是要开到足够靠近英国本土才放飞飞机，至少也要过了海峡中线，不料那天上帝似乎有意站在英国人一边，海上掀起了惊涛大浪。U-12 潜艇属于近岸小型巡逻潜艇，全长不过 50 多米，而它所带的飞机却是翼展面积接近 60 平米的大家伙，不得已飞机只能横着架在潜艇前部。在海浪拍打之下，很有些摇摇欲坠的危态，连带着小小的潜艇也剧烈摇摆起来。福斯特曼立即催阿诺德赶紧飞走。

无奈之下，阿诺德只得发动飞机，与此同时福斯特曼则操纵潜艇，让其半潜入水中，而且前部朝下、后部翘起，如此才能方便水上飞机依靠浮筒起飞。一番极其艰难的动作之后，阿诺德终于驾机起飞了。

由于此次纯属实验性质，没有携带炸弹，也



作为一战战胜国，日本瓜分到了 7 艘德国潜艇，还采取种种手段，获得了许多德国先进潜艇图纸……大费心机的结果，便是让史上第一种实用型的潜水航母，于 1932 年出现在了暗流涌动的大洋之上。



就没有必要深入英国本土，阿诺德便驾机悠悠地沿着英国海岸线飞行，在他那锐利目光的扫视下，对于下一次大规模空袭的地点已经有了些打算。而英国人似乎根本就没想到有一架飞机正在窥视他们，直到阿诺德又听到发动机传来异响，才“依依不舍”地掉头返航。

有了这两次经验，阿诺德和福斯特曼合写了一份报告，交给上面，极力建议给他们派人派钱派设备，推进潜水航母的实验。谁知上面却以技术上根本不可行为由断然拒绝，大约那些还沉迷在战列舰对轰中的上司，觉得这两个小军官的想法太荒谬了。

但两人并未死心，三年之后，当战争陷入僵局时，德国开始实施无限制潜艇战，希望以此绞杀英国，大型远洋潜艇纷纷投入作战。而在茫茫大海上寻找敌人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当时没有雷达没有卫星，全靠肉眼和事先的情报估算。两人又发现了“商机”，立即制定出一个给这些潜艇配备水上侦察机的方案，四处推销。其具体方案是在潜艇上隔出独立舱室，将折叠后的侦察机收纳于其中，需要放飞时，潜艇浮出水面，取出飞机展开组装，放飞。这个方案很快引起了上面的注意，因为此时德军的战列舰龟缩于港中根本不敢动弹，海上的存在力量只有潜艇了。

很快，两种潜艇专用的水上侦察机就进入了试飞阶段，但它们并未迎来出击的日子，因为一年后战争就结束了。

当时英国人通过种种渠道探听到了德国人的这种新式武器，也搞了些类似的实验，只不过英国当时依靠数十艘战列舰横行大洋，根本就看不起潜艇这种暗杀型的武器，更遑论研究什么潜水航母了，他们只是精力过剩，玩玩而已。其实验的最大成果就是将两架水上飞机装到了一艘潜艇后甲板上，但前提是潜艇不能下潜，要一直带着这两架飞机在水面游荡。这与德国人已经发展到真正携带飞机潜入水中航行、浮出水面放飞的技术相比，差得太远了。

但德国人战败了。其庞大的潜艇部队除了自

沉者外，许多都被战胜国瓜分，潜水航母的资料也随之流入各国手中，其中有一个最为热心的国家——日本。

❖ 狂梦者——要毁巴拿马运河

日本穷兵黩武之下拼凑出来的庞大海军，一直被视为英国海军的翻版，但实际上那只是针对水面舰艇而言，其潜艇部队真正老师是德国人，潜水航母的老师，也是德国人。

作为一战战胜国，日本瓜分到了7艘德国潜艇，其中有排水量达1100余吨的大型潜艇，大约就是阿诺德和福斯特曼心目中潜水航母的改造平台之一。日本还采取种种手段，获得了许多德国先进潜艇图纸，挖来许多潜艇技术人员，其中便有德国潜艇设计大师泰黑尔。大费心机的结果，便是让史上第一种实用型的潜水航母，于1932年出现在了暗流涌动的大洋之上。

此艇名为巡潜1型改，编号为伊-5，排水量高达2000余吨，需知当时列强的潜艇都只不过是七、八百吨大小。弄出如此大的个头来，自然是为了带飞机。在吸收消化了德国大量技术成果之后，伊-5成功地实现了将一架小型侦察机收纳在密封隔间内，能够潜入水中航行也能浮出水面放飞。

虽然相关技术还显得很粗糙，那侦察机也没有携带武器，严格来说只能算是迷你侦察型水下航母，但毕竟是一个巨大突破。2000余吨的潜艇本来就是威力十足的水下杀手了，何况还带了一架侦察机，能打能搜能藏，在战争中的价值不可小视。

随着对华侵略战争的扩大，以及与英美矛盾的加剧，日本对别的国家没有的秘密武器兴趣更加浓厚，这种潜水航母即是其中之一，接连造出了十多艘来。在这些军国主义分子的幻想中，这些潜水航母将在太平洋战火燃起时，充当急先锋，用携带的侦察机对英美主力舰队的活动进行侦查，创造主力舰队决战的良机。

而这些潜水航母在战争中也确实有不俗的表现。如在日本偷袭珍珠港前，便有多艘潜水航母前往珍珠港外海设伏，意图截杀逃出港口的美军航母。在扑了个空之后，这些水中恶狼又受命越过大洋，跑到美国西海岸，浮出水面来炮击美国本土，攻击美国商船。遭到美军猛烈反击之后，它们转而退回，参加在南太平洋的海陆空大搏杀。结果是美军航母“萨拉托加”号被击伤，“黄蜂”号被击沉，而美军当时在太平洋的航母仅有六艘！此前已有“列克星敦”号、“约克城”号战沉，加上日军潜水航母的一通乱搞，美军能作战的航母锐减到了两艘，因为这番雪上加霜，美军战史将这一年称为“航母灾难年”。

潜水航母的表现有目共睹，日本海军的核心人物山本五十六更是对其青睐有加，他深知战争拖得越久，日本就会输得越惨，唯一的胜算在于迫使美国求饶。为了达到该目的，就必须将战火烧到美国本土去，让美国人吓破胆，能完成这一任务的只有潜水航母。

于是，在他的极力推动下，名为“潜特型”的潜水航母应运而生。其排水量高达6500余吨，接近一艘巡洋舰，为核潜艇之前最大潜艇。携带的燃料足够绕地球一周半，能轻松从东京杀到美国东西海岸，是一种全球化兵器。最大的特点则在于其巨大的机库，内藏三架折叠水上轰炸机，用起重机回收。由当时日本主力飞机制造商爱知特别研发的这种轰炸机，能携带八百千克重的炸弹或者鱼雷，美其名曰“晴天”，意思就是晴天霹雳。因为在山本五十六的狂想中，这些突然从水底下冒出来的轰炸机绝对是美国人预知不到的，如同晴天霹雳一样。

山本五十六原计划建造18艘“潜特型”潜水航母，编成一支能放飞五十多架轰炸机的强大潜水航母舰队，但没等到他看到第一艘下水，自己便先一命呜呼了。主谋者一死，剩下的人对此兴趣索然，眼看美军航母越来越多，还是将宝贵的钢铁拿来造正规的航母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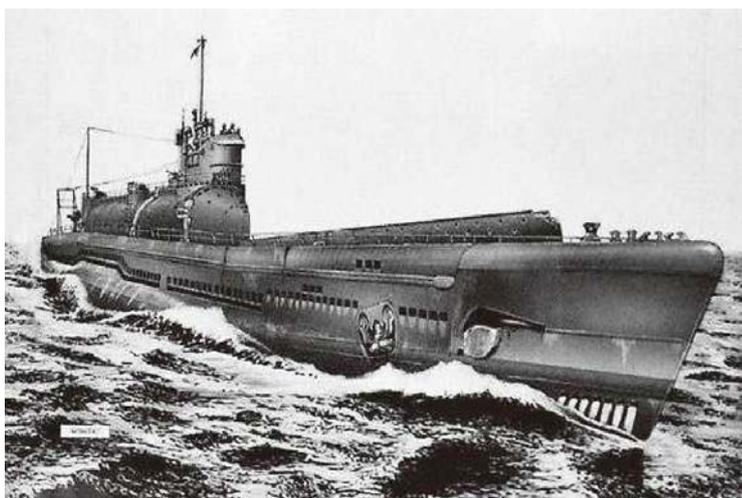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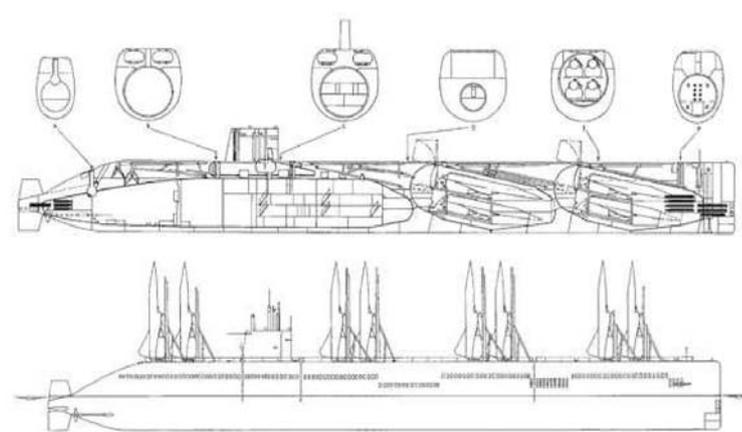
01
02

01

美国波音公司的潜水航母设计方案。

02

日本“伊-400”潜水航母。



结果便是潜水航母舰队的规模一减再减，最后减到了3艘而已，其中真正服役的只有两艘，编号为“伊-400”和“伊-401”。

当时已到1945年，日本正走在穷途末路上，绝望之下，指挥海军的小泽治三郎企图用这两艘潜水航母创造一些“奇迹”出来。他先是制定了一个PX特攻计划，主要内容是将细菌武器装到“晴岚”上，用潜水航母偷偷运到太平洋上美军控制的岛屿附近散布，或者干脆弄到美国本土去。遭

到高层否定之后，他又想到运用潜水航母突袭巴拿马运河，将其破坏、瘫痪，达到削弱美军的目的。

其实从海军战略的角度而言，该作战计划堪称高明，因为美国地理的缘故，太平洋、大西洋都得布兵，其海军兵力调动主要靠一条巴拿马运河，若是将其破坏，那么至少半年内美军两洋海军都得各自为战。从理论上讲，巴拿马运河也确实存在脆弱点，那就是船闸，因为这条运河不同于苏伊士运河，是通过船闸调节水位才得以通航，一旦船闸有损运河便告报废，而这些两米厚、二十米高的大家伙在鱼雷面前不堪一击。

问题是，此时已是1945年，美军都打到你家门口来，根本就不需从大西洋调动太多兵力过来，真要去破坏的话，偷袭珍珠港时就应该干了。美军在运河地区的设防情况也不清楚，如果有战斗机和雷达布防的话，那么“晴岚”靠近的几率微乎其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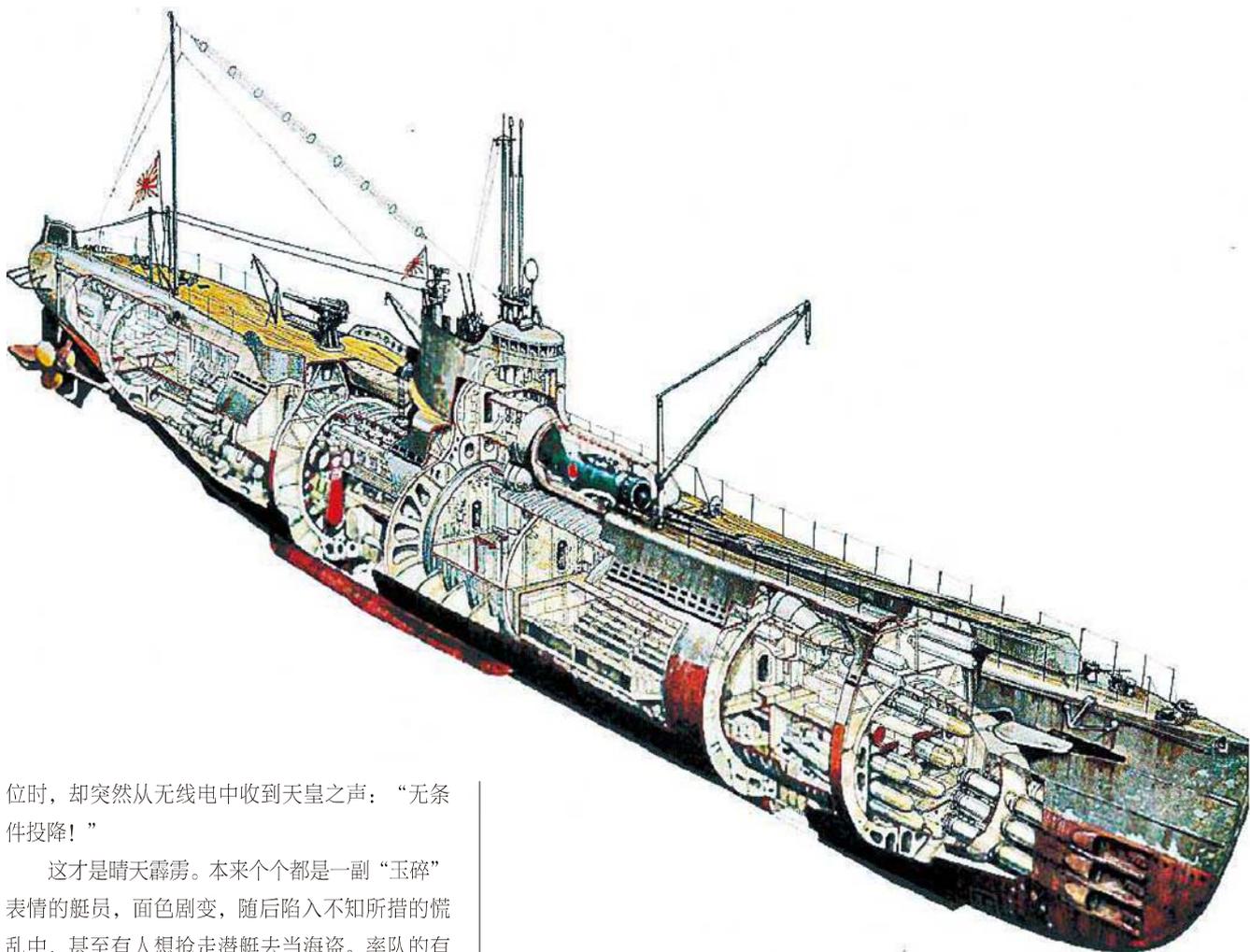
如果山本五十六的18艘潜水航母大舰队已经建成的话，还“值得”一试，现在却只有两艘。小泽治三郎却是越想越兴奋，非要去炸不可。

为了加强攻击力，他又调来两艘迷你潜水航母，加强之后也能各自带上两架“晴岚”，如此一来，便有10架轰炸机的阵容。信心满满之下他开始布置训练、收集情报，甚至还找来当年参加过巴拿马运河的日裔工程师打探，搞出了一个船闸模型来当靶子演练。

谁知还没练几天，燃油便不够了，只得派出一艘潜水航母四处搜刮燃油，倒霉的是路上又撞了水雷。待到好不容易演练熟悉，凑够燃油，那美军已经攻占冲绳，准备大举登陆日本本土了。

此时袭击巴拿马运河还有何用？小泽治三郎只得将攻击目标转移为美军舰队集中停泊的乌利西环礁，做一番垂死挣扎。于是，四艘潜水航母编成的小舰队，出发了。

这是一条绝路。还没走多久，便被美军击沉一艘。另一艘则以侦察为名脱离了战线。剩下相依为命的“伊-400”和“伊-401”，到达攻击阵



日本潜水航母构造图。

位时，却突然从无线电中收到天皇之声：“无条件投降！”

这才是晴天霹雳。本来个个都是一副“玉碎”表情的艇员，面色剧变，随后陷入不知所措的慌乱中，甚至有人想抢走潜艇去当海盗。率队的有泉大佐稳住局面后，决定服从天皇的命令，但天皇的秘密武器要尽可能的消失，不能落入美国人手中！他下令将所有的鱼雷射入海中，轰炸机也扔到海里，然后浮出水面，用无线电联络附近的美军舰艇，等待投降。

闻讯而来的美军驱逐舰布鲁号，首先就被这种吨位差不多是它三倍的大家伙给吓住了。独吞了日本海军潜水航母的美国人，对这种秘密武器进行了详尽的研究，如果不是苏联人表示也要来插一杠子，美国人甚至还有将其改装成为美式装备的念头。结果是苏联方面表示要派一个工作组前来检查这些战利品之后，美国人在1946年6月4日将其以鱼雷实验为名击沉在了珍珠港附近。

但潜水航母的故事却并未就此结束。

❖ 争斗者——核弹来自大洋底

虽然苏联人并未得到一窥日军潜水航母的机会，但他们发展这类新式兵器其实已经很有些年头了。

早在卫国战争初期，艰苦卓绝的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中，苏联人就已经大规模运用潜艇执行运输任务，积累起了丰富的运载经验。需知航母的英文缩写为：aircraft carrier，直译就是飞机运载船，只要把起飞和回收问题解决好，便能从运输船摇身一变为航母了。

而如果苏联人采用水上飞机上潜艇的模式，

他们造出潜水航母的进度未必会比日本人晚多少。因为这方面的情报和技术并不难搞，在战争爆发前，德国人曾经和苏联人有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军事合作。

大约就是因为这种积累，在战争中苏联人先后开发了许多运输潜艇，虽然并无一艘下水实战，却明显有向潜水航母加速前进的趋势。结果战争刚刚结束没几年，苏联的第十八中央设计局便搞出了一个颇为成熟的 621 潜水航母方案。

该方案设计的潜水航母水面排水量接近 6000 吨，大小与日本的“潜特型”相差无几，其技术性能则高得多。能运载 700 多名步兵外加 10 辆坦克、12 门榴弹炮，最强之处则是能带 3 架拉-5 战斗机。这种战斗机并非如“晴岚”一般量身打造出来的水上飞机，而是货真价实的空军用常规战斗机，放置于机库中，能直接弹射起飞。苏联人能够实现跨越式发展，绕过水上飞机直接上常规战斗机，在潜水航母方面的潜力由此可见一斑。

鉴于 621 方案的成熟度，美国情报部门一度十分忧虑苏联如果大规模开建这类舰艇的后果。美国军方曾有评估，认为如果苏联潜水航母发展到能携带喷气式战斗机，那么便能实现用喷气式战斗机装上小型核弹，用潜艇秘密运输抵近目标进行突袭。在还没有发明潜射核导弹的那个时代，这一招堪称最难以防范的核打击战术。即便苏联潜水航母只能携带一架喷气式战斗机，也能轻而易举地毁灭一个美军基地。

那美国人在干嘛呢？这个最早实施核打击的国家，在草草研究了一番日本“潜特型”潜水航母之后，便对这种兵器失去了兴趣。直到核潜艇的面世！这种能长时间潜伏于水下，真正意义上的潜艇，让美国海军有了新的危机感。他们的对手苏联海军一直偏重发展潜艇，核潜艇更是重中之重。故而美国海军终于将心思放到了潜艇部队之上，同时也开始再度尝试起潜水航母来。

美国人最初拿出来的方案是将一架水上喷气式战斗机塞入核潜艇巨大的导弹库之中，弹射起

飞，用起重机回收，平时飞机是折叠存放在导弹库中。更加先进的方案来自大军火商波音公司，其代号为 AN-1，排水量接近万吨，全长 150 多米，是一个庞然大物。内部设有两个巨大的机库，能携带八架 F-11 喷气式战斗机。其发射方式十分特别，乃是采用垂直发射器外加助推火箭发射，类似于用运载火箭发射航天飞机，如此高难度，不知道飞行员受不受得了。

最为神奇之处在于，波音公司还在设计蓝图中提出了飞机直接降落于潜艇甲板的构想，因为垂直发射出去不可能也垂直回收回来，那飞机又不是水上型，怎么弄？索性把潜艇甲板设计成类似航母飞行甲板一样平坦，再加上一些特殊的拦阻手段，进行“硬回收”。显然，对于飞行员而言，这是比弹射出去更加危险的高难度任务，搞不好就会机毁人亡。

一筹莫展之际，英国人发明的“鹞”式战斗机带来了转机，波音公司将其引入，推出 AN-2 方案，换作携带 8 架垂直起降战机，起飞回收难题都解决了，而且成本低廉。但美国海军说，不造了。

原来当时核导弹技术进步神速，直接用此武器便能实现突然打击，何须还要用潜水航母偷偷摸摸地跑到对方眼皮子底下放飞机？再加上美国情报部门已经探明，苏联人早就没搞这东西了，正开足马力在造核导弹呢！

就这样，潜水航母在美苏争霸的风起云涌之中静悄悄地退场了。但潜水航母的故事还是没有结束。

随着无人机的大规模应用，携带无人机的潜水航母再度引起军事强国的重视，美军早就进行了这方面的实验，并已设计出名为“鸬鹚”的潜射无人机，能装在核潜艇的导弹发射筒中进行垂直发射，采用隐形设计，外观十分科幻。只不过美军声称在 2010 年前后就会将其装备，时至今日却都无消息，是早已悄悄部署还是因为缺钱无疾而终了？^①





酷历史

Cool History

影像记趣

英国足球趣史

酷历史版块编辑：黄弋
邮箱：klsbjhy@163.com

英国是现代足球起源地。关于起源，有一个听上去不乏荒诞的传说：在11世纪，英格兰与丹麦之间有过一场战争，战争结束后，英国人在清理战争废墟时发现一个丹麦入侵者的头骨，出于愤恨，他们便用脚去踢这个头骨，不过他们发现头骨踢起来脚痛，于是用牛膀胱吹气来代替它——这就是现代足球的前身。

12世纪初，英国开始有了带有娱乐性质的足球赛，通常在两个城市之间举行。“主持人把球往空中一抛，比赛就算开始。双方就会一拥而上，大叫大喊，又踢又抱，哪一方能将球踢进对方的闹市区，哪一方就算胜利。如果球中途窜入居民屋里，运动员也就一窝蜂地冲进去乱打乱踢，常常把屋里的东西砸得稀巴烂，房主只好自叹倒霉。”当时，球赛一来，人们就关门闭户，一直到球赛结束，才恢复正常。这样的球赛遭到市民的强烈

1914年4月15日，英国足球比赛上站在木桩上观赛的球迷。这场比赛伯恩利队以1:0击败利物浦队。图/FOTOE

反对，英国政府便下了一道禁令，规定足球比赛要在空地上进行，进入闹市区者重罚，于是就出现了专门的足球场。

1841年，英国的伊顿公学进行了一场11人制足球比赛。当时在学校里每套宿舍住有10个学生和1位教师，因此宿舍之间就进行11人对11人的比赛，这就是现在足球“11人赛制”的由来。

1862年，英国诺丁汉郡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足球俱乐部。1863年10月26日，英国伦敦成立了第一个足球协会（英足总），并统一了足球规则，这一天被人们称为现代足球的誕生日。这次制定的足球规则共14条，它是现今足球规则的基础。

如今，足球在英国早已是全民的运动。每个英超俱乐部在赛事当天都会有一份比赛日观战指南。体育场周围的酒吧都会在比赛前就把电视调到直播的频道，营造看球氛围。去现场看球的球迷会穿戴上主队的队服、围巾，不能到现场的球迷也会穿上队服去酒吧和陌生人一起支持自己喜欢的球队。

在足球运动中，英国人仿佛撕掉了“保守”“拘谨”的标签，表露出了澎湃的热情，也留下许多趣事。①

01	02
----	----

01

1910年，英国伯恩利足球俱乐部门前的驴子。当时，球迷都喜欢给喜欢的球员冠以“驴子”的这一称号。图/FOTOE

02

19世纪80年代英国的一些足球装备。其中有些装备已不再使用，比如皮带。图/FOTOE



GEO. G. BUSSEY & CO., Manufacturers.

SHIN GUARDS.



LARGE SIZE. P pair.
 173 B 1st quality Leather ... 2/6
 173 C 2nd " " ... 2/-
 173 D 3rd " " ... 1/6
 173 E Strong Canvas ... 1/-
SMALL SIZE.
 173 H Superior Leather ... 1/6
 173 K Strong " " ... 1/-
 173 M " Canvas ... 7/0



LARGE SIZE. P pair.
 173 BA 1st quality Leather ... 3/-
 173 CA 2nd " " ... 2/6
 173 DA 3rd " " ... 2/-
 173 EA Strong Canvas ... 1/6
SMALL SIZE.
 173 HA Superior Leather ... 2/-
 173 KA Strong " " ... 1/6
 173 MA " Canvas ... 1/-



GOAL KEEPERS' GLOVES.

173 GK White Leather, Red Rubber ... per pair 5/9
 173 HK Buff Leather, Black Rubber ... per pair 5/-



FOOTBALL EAR GUARDS.

173 EG Gold Cape ... 3/- each.
 173 FG Chamois ... 2/3
 173 UG The "University Guard," netted head ... each 3/-

ANKLE GUARDS.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ankles when ordinary boots are worn.
 173 AG, 2/3 per pair.



Superior Cowhide, 371 C 14/6
 Good Cowhide, 371 D 12/6
 Waterproof Duck, 371 G 10/6
 Waterproof Canvas, 371 K 8/6



THE "UNION" BAG.
 Strong, Light, Handy, Waterproof.
 401 UB 5/- each.

Roomy Shape, Size 13-inch.

FOOTBALL PLAYERS' BAGS.

FOOTBALL BEL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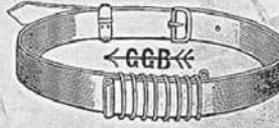
63 MS Web, 2 in., single strapped ... 1/- each.



63 PS Web, 2 in., wide strap, new pattern ... 1/3 eac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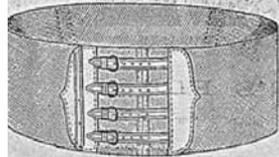


63 OSR Web, 2 1/2 in., double strapped ... 1/3 eac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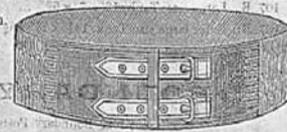
BUSSEY'S PATENT SPRING ATHLETIC BELT.

63 NP 1 1/2 inch wide ... 3/- each.
 63 OP 2 " " ... 4/- "



63 T Regulation Spring Belt ... 8/- each.
 63 Q Web Belt, 3 inches wide, 2 buckles 2/3
 63 R " " 4 " " 3 " 3/6
 63-S " " 5 " " 4 " 4/8

REGULATION SPRING BEL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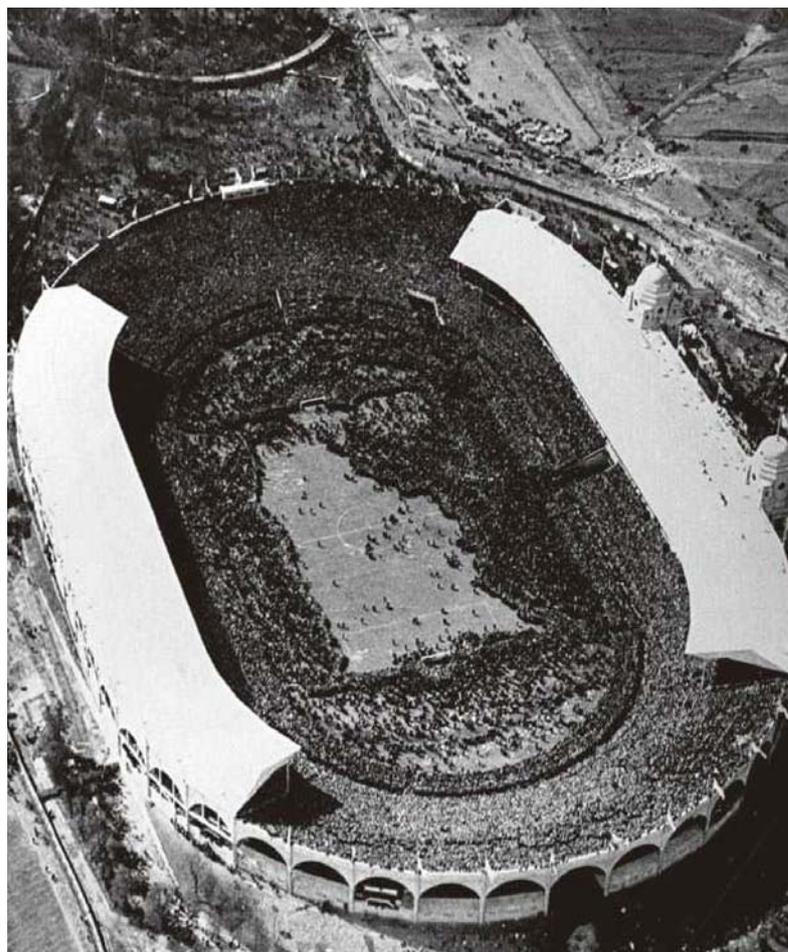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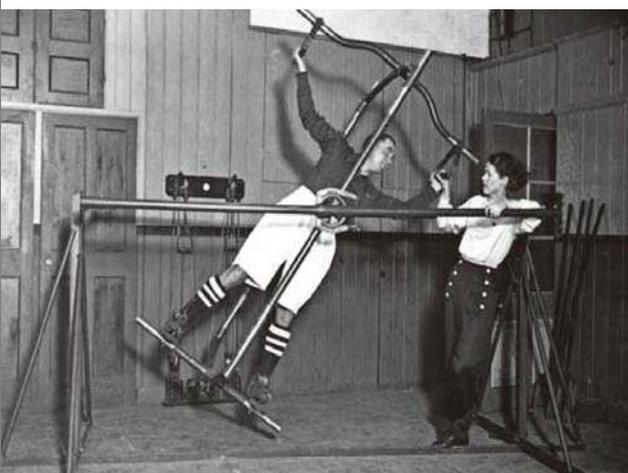
LAW'S OF FOOTBALL.

64 KP, 2d. each. Orders must state whether "Association" or "Rugby" are required.

SPECIAL TERMS GIVEN TO CLUBS AND SCHOOLS FOR CASH.



1938年，英国，在足总杯比赛输给阿斯顿维拉的伊普斯维奇队的队员在公共浴池洗澡。图/FOTOE



01
02

03

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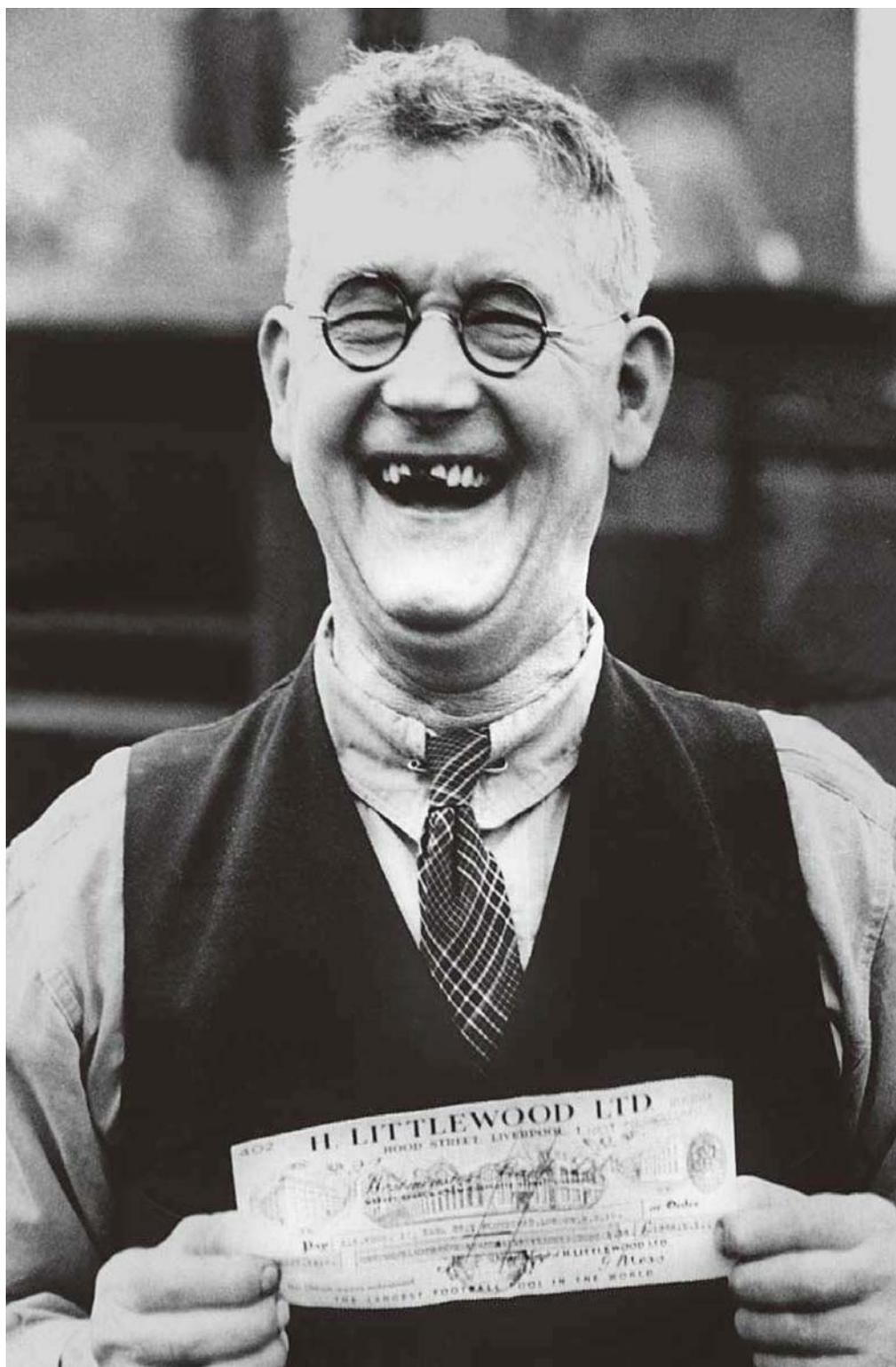
19世纪70年代，身着条纹服饰的英国哈罗公学的足球队合影。足球运动在这些公学中颇受欢迎。图/FOTO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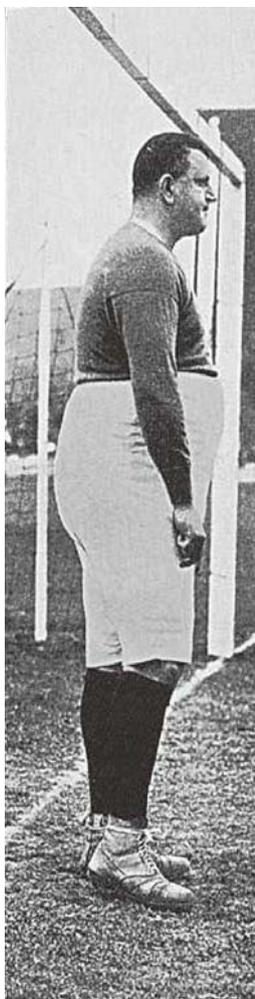
02

1932年，英国足球阿森纳队球星亚历克斯·詹姆斯在海布里球场测试新的强化肌肉训练。图/FOTOE

03

1923年，英国温布利球场举行的足总杯比赛现场俯瞰。设计容量为12.7万人的温布利球场居然涌进了24万名球迷，观看了这场比赛。图/FOTOE





01	02 03 04
----	--------------

01

20世纪30年代，英国赌球的胜利者。他手里拿着的是李特尔伍德公司的足球彩票。
图/FOTOE

02

1904年的英国足球运动员比利·福克。当时他为切尔西队担任守门员，人称“胖子福克”，体重140千克。
图/FOTOE

03

20世纪40年代，英国守门员弗兰克·斯威夫特（Frank Swift）。1958年2月6日，他和曼联队友在慕尼黑因飞机失事而遇难。图/FOTOE

04

伯特·特劳特曼（Bert Trautmann），曼联队门将。他带着颈伤上阵，帮助曼联队赢得1956年的英国足总杯冠军。图/FOTOE

七十二寨侗女绣衣中的密语

文 | 陶晶雯

侗族人没有文字。在过去，侗女甚至难得走出自己生活的寨子。但她们似乎已经约定，用绣衣和其他纺织品来传递信息、记录历史。



隆冬，对于辛苦劳作的侗族人来说，正是一年中最平静安详时光，农田里的稻谷已经收割，稻田中放养的鱼也在“干塘”后做成了腌鱼，用来修建重整吊脚楼的杉木、竹木，早已从山林中砍好拖至楼下，等着来年开春使用，

而村中红白喜事婚丧嫁娶的事宜也已大多完毕，在贵州省黔东南自治州榕江县的乐里镇归基寨，剩下的事，似乎就是靠在温暖的火塘边，男人们聚在一起抽抽烟，弹弹牛腿琴，话话古；而女人则聚在一起，为自己准备来年所需的全部新衣。

春节期间，榕江乐里归基寨的母亲带着女孩参加月也（集体走寨作客）活动。
图 / 吴建亮

❖ 七十二寨侗女的独特刺绣工艺：“diuluo”

侗乡七十二寨，指的是榕江县北部的“六里”（即乐里、往里、仁里、瑞里、保里和本里）中的大小侗寨。在这区域生活的侗族女性所着衣服，外观上非常相似。日常衣物的面料大多是自种、自织、自染的家织土布，只有蓝色或者白色两种颜色，素雅大方。由于织法较为稀松，因此具有很好的垂坠感。外衣是典型的大襟右衽款式，圆领宽袖，颈部非常贴合脖子，但胸以下就逐渐散开，变得宽松惬意。衣服没有纽扣，在领口和衣服一侧以三粒盘扣系合。日常的衣服仅过腰，下着长裤，而盛装则从质地、款式到颜色都复杂精致许多，除了穿长裤，还要系绑腿和过膝的围裙。这种服装款式世代流传，千百年来没有大的改变。仅有的与时俱进的变化来自于袖口以及领口至衣襟处宽博的手工刺绣装饰，运用了平绣、编带、绞绣、打尾绣、堆绣等多种刺绣技艺，既端庄大气，又清丽雅致，流淌着浓郁的古韵和诗意。

对七十二寨的女人来说，她们几乎所有的服饰，便只有这种全手工缝制的衣裳，一年四季，不同场合，穿的都是这样的侗衣。似乎是一种自觉的承续，让她们完全远离了外面世界中那些让人眼花缭乱的时尚选择，而是回归到最质朴的侗布，完全一样的衣型款式，以及用自己一双手一针一线绣出来的繁复又古老的花纹。

这种刺绣名字叫“diuluo”，至今没有准确的汉语翻译。这种刺绣也仅仅流传于七十二寨，而与其他地区的服饰截然区分开来。千百年来，它早已深深融入了七十二寨女人的日常生活中，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锤炼和承继里，侗女们发展出了精湛高超的刺绣手艺。刺绣，甚至成为判断她们是否是一位合格的侗族女性的标准。而这种手艺，不仅源于她们的生活环境，她们的文化习俗，还来自于她们对美的体验，对自身生活的认同，以及对装饰和技术的融会贯通。技艺之间，所有的选择看似偶然，却似乎再也找不到更合理、更美好的替代方式。



七十二寨的侗女们在自己衣服上所花费的心思，绝不输于任何一件来自世界顶级品牌的高级定制礼服，对她们来说，日常所穿着的这些衣物，本身就是为自己和家人定制的独一无二的礼物。



❖ 侗女绣衣中特有的抽象图案

当你有幸被邀请走进七十二寨任何一户家庭的火塘中，会发现他们火塘上挂着的除了腊肉之类的食物，就是一条一条的棕色底布，布上描绘的是犹如文字或者画符般的抽象图案。这些图案描绘的，多是植物和动物：梨花、杏花、竹叶、鸳鸯、蜻蜓、鸟、金鱼……几乎侗女生活中一切美丽的事物都包含在这些图案之中。但和其他地区侗家衣饰完全不同的是，它并非是一般的平绣，也并不是具体象形化地对实物的临摹，甚至不是写意手法，而是用高度凝练、简洁而抽象的花纹盘曲旋绕，每一种花纹都有着相对固定的画法，按照不同的方式组合起来，便成为了不同主题，表达不同心境的语言——而这，是唯有七十二寨侗女们自己能看懂的语言。

如果你要问她们是如何构思布局这些图案的，她们会吃惊地望着你，一句话也说不出；但若你向她们请教这些图案代表的意思，她们就会笑着告诉你，这个是蝴蝶，蝴蝶周围环绕的是桃花，桃花外还有竹叶溪流，而包围着蝴蝶桃花溪水的外层图案，则是云朵的纹饰。听上去，仿佛是绝美的侗寨春天景色。

当然，一件衣服的图案也会随着穿它的场合和穿它的人而有所变化。若是一件嫁衣，衣服上主要的主题则是龙凤呈祥、鸳鸯戏水；年轻女孩喜欢烂漫的花卉，而年纪稍长的女性，衣服上便多是金鱼虫鸟之类。衣服的大小，穿衣服的人的胖瘦，都会微妙的影响到纹饰的选择。每一件衣服正是用这些刺绣图案，展示了所穿女性的情趣和个性。

❖ 制作侗族绣衣

寨子上能将这种底布画得很好的人，大多是老人，她们从10岁左右就开始学画这些纹饰，对于所有的纹饰表达，都了然于心，绝不会画错蝴蝶的一只翅膀，也不会把抽象的桃花画成梨花（即

使在外人看来几乎没有分别)，虽然岁数大了眼睛不好，还是能提笔就画，画出来的线条流畅细腻，所有的布局既合理又富有美感。所以每逢婚嫁、新年盛装之类的重要场合，这些寨子上富有声望的“艺术家”就会被请去为衣服绘制底布，还有不少侗女不仅能画，还能飞快地剪出一整幅完整的刺绣花样——当然，这种好与不好的判断，也只能来自于侗女之间，因为若是不了解她们的生活，大约一点也看不懂这些图案表达的意思。

在底布画好以后，首先要制作好能够盘出纹样轮廓的绕线。将棉制的卷线多次加捻后，再选用棉线、麻线或是尼龙线用针穿好，拿在手中，作为芯线，而将加捻的棉线作为绕线。绕线和芯线收尾相连，在绕线和芯线的下端坠上重物，只需要捻动针，旋转芯线，绕线就会自然而然地绕在芯线上。这种绕线的制作手法也为周边地区的水族和苗族所共同使用，水族的马尾绣（以马尾做芯线）更是入选了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区别于苗族或是水族相对光滑的绕线，七十二寨侗女的绕线捻度更高，线的效果并不平滑，却更具凹凸质感，亦可呈现更多别具一格的曲度变化。

在绕线盘出图案前，侗女们会先在她们早已设计好的，认为需要重点强调的部分，用堆绣或者圆圈式辫绣的手法加以突出。无论哪种，其流程都非常复杂——若是堆绣，需要将布剪成长条状，再涂上糯米淘洗后的水上浆，晾干后，再次上浆，再晾干，再上浆——反复十余次，才能得到挺括又能折叠出极富立体感的褶皱的长条布料。将长条布料多次揉皱，加捻，再用绕线固定，看上去，便如羽毛一般细腻华丽，又如落下的花瓣般浪漫诗意。若是用辫绣，则需要用12股线反复编织，编织出来的辫线以绕线为中心线，按圆圈式固定。无论是哪种方法，都可以使形成的纹样堆叠满实，具有浮雕般的独特立体感。

在绕线盘出图案的轮廓后，再用拉尾打籽绣（一种以线打结，可以呈现图案立体感的手法）

来填充图案之间的色彩。但即使是填充，也完全不能马虎，一件越用心的刺绣作品，便会在这填充之间呈现愈多的变化，以不同色彩的丝线，进行不同层次的叠加……一幅刺绣，至少会使用十几种不同颜色的丝线，而其他侗家女人的绣衣，往往只会使用到几种颜色。于是这些图案便越加绚烂鲜艳，犹如盛开的花朵。

一件刺绣作品大致完成后，细节的处理更需要侗女的想象力。她们往往用金线、银线加以黑色的亮线锁边，这种锁绣能够绣出细小、整齐而灵动的纹样，亦能提亮整幅刺绣构图的光泽。她们也会用辫线以及一些布带装饰留白处，使图案层次更加饱满丰富。散落拈绣在纹样上的珠片，过去的传统是将铜片打制成很小的圆薄片，但近年来，这些铜片被买来的五彩塑料珠片所替代，整幅刺绣便由端正古朴而显得跳脱又斑斓。

用这种刺绣方式，若是制作一幅盛装上的围裙，往往需要花上大半年的时间，而即使只用于日常衣物上的普通袖口，也需要一个星期到大半月的时间——七十二寨的侗女们在自己衣服上所花费的心思，绝不输于任何一件来自世界顶级品牌的高级定制的礼服，或许对她们来说，日常所穿着的这些衣物，本身就是为自己和家人定制的独一无二的礼物。

❖ 侗女的绣衣 VS 流水线成衣

实际上，这些用刺绣精心装饰的衣物本身也和高级定制礼服一样，美丽却脆弱。因为丝线会褪色，绕线会变形，浆洗过的堆绣经不起水的浸泡，而更不用说那些珠片会掉落——这些衣物，几乎是不能清洗的，再珍爱、花费再多心思做的衣服，洗过两次后便会全部走形。于是，侗女们便不断制作新的衣服替代。每个人，至少都会拥有两到三件必须花费一年以上时间制作的盛装（踩歌堂、吹芦笙、走寨吃相思时穿着），以及至少十几件日常穿着的普通衣物；当然，若是一些重要的如婚丧嫁娶的场合，虽不会穿盛装，也比平日隆重，

萨思怡和乃思怡制作的一件夏装，图案以蝴蝶和桃花为主。绿色有褶皱的立体堆绣部分描绘了龙凤身体的一部分。这件衣服在归基寨姑娘的夏装中，只是最简单朴素的一种。图/陶晶莹



那也要新的衣饰。在这个只有五六百人的寨子里，女人们对于美丽的追求，也绝不会输于国际大都市中争奇斗艳的模特和明星。相反，她们更用心地用自己的手维护自己的美丽。每逢听到有什么人做了或穿了一件花样更新鲜更别致的衣服，或是在哪个隆重的场合遇到一件刺绣手艺卓绝的衣服，她们就会立刻兴奋地聚在一起，甚至议论上大半月，然后相约向制作者请教探讨。

今天作为女性的我们，也许能拥有一件接一件来自流水线上的漂亮成衣，若是有足够的经济实力，也可以买到来自设计师为自己精心打造的服饰。但我们却体验不到七十二寨的侗女们那种参与这份美丽形成全部过程的兴奋和珍惜。一件衣服，是她们所有生活的体现，生活和衣服，都由她们自己一手创造。

❖ 侗族人一针一线间的生活

思怡、乃思怡、萨思怡——这是一户侗乡七十二寨人家中三代女性的名字。侗人的称呼，都来自于她们家庭中最小辈分的孩子，所以这三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思怡、思怡妈妈、思怡奶奶。她们的年龄，分别是两岁、二十七岁以及五十三岁。

虽然年龄经历都不相同，打开侗女们的衣箱，都是一样的蓝布底有着繁复刺绣装饰的侗衣。她们自出生后就穿着这样的衣服，也将穿着这样的衣服无忧无虑地玩耍，直到到寨子外面的镇上上学。而一旦她们离开学校，预备像她们的母亲、奶奶那样做一个传统的侗族女性度过自己的人生时，她们就又开始穿着这样的衣服劳作、歌唱、休息、玩耍，然后慢慢变老，直到死亡来临，在她们的女儿或媳妇为她们穿上这样的衣服后，她们便归于终生亲近的大地。

当她们还小的时候，是母亲、姑姑、阿姨、奶奶、外婆还有家族中其他的女性长辈为她们准备好所穿的衣服；但当她们几岁时，母亲就会要求她们学会绕线，学会编辫线，学会搓揉堆绣所用的绣片，学会用绕线绞出各种图案；而当她们十几岁时，

学习之余，她们也要拿着笔，跟在母亲和奶奶旁边，开始一笔一画地临摹那些一辈辈传下来的程式化的抽象图案——当然，若要理解这些图案，并能自如地将这些纹饰排布组合，来表达某个确定的意思，需要花费一生的时间。等到她们快要出嫁，不仅长辈们要替她准备，她自己也得开始走家串户地学习，那些精致的线脚怎么处理，那些绕线怎么才能贴服，那些锁边怎么才能整齐，用什么样的颜色互相搭配才好看。手艺和生活的心得，会随着这些手艺，从长辈向这些待嫁的少女们传递。当她们走出去做客、参加社交活动或是节日的踩歌堂，她们身上所穿衣服的好坏，将会和她的仪态一样，成为年轻男子和他的家庭关注的焦点。他们将会通过这些衣物，判断女孩是否心灵手巧，是否知情识趣，家庭中是否有得力的女性长辈，然后，才会是成就婚姻的开始。待到她们出嫁，妯娌婆媳之间，每逢闲余，最大的活动就是彼此之间的绣艺讨论，就连家长里短的交流，都伴随着手在布上的不断动作。

这样的生活，和“diuluo”这种手艺一样，世世代代，平静安详的传承着。就连村里最年长的老人，也说不出这种技艺来自何处、从何起源。只知道从自己的太奶奶那时开始，她们就穿着一样的衣服，在这片满是山林溪水的大地上繁衍生息。

在思怡的家里，两岁的思怡正躺在火塘边的椅子上一个人玩着自己衣角上坠着的小铃铛。乃思怡则趴在廊前，捻着将要绣在衣服上的绕线，而萨思怡，则聚精会神地在火炉旁绣着一幅不知道给家中哪个小辈做的绣片。此刻，门外蹭蹭地传来一阵脚步声，乃思怡十二岁的侄女跑了进来，拿过一支铅笔，在纸上开始描绘起纹样来。萨思怡问她：“下学啦？”她点点头。萨思怡再问她：“想穿新衣服不？”她仍是点点头，眼中似乎能看到一些亮光。而我插问了一句：“为什么想穿？”她几乎是想也不想地就回答道：“漂亮！”

谁说她们拥有的，不是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衣服呢？

在美国作家邝丽莎《雪花与秘扇》中，曾记

录了一种秘密文字“女书”：只流传于女性之间，用来记录她们一生的喜怒哀乐，痛苦欢愉。

湖南的边远之地是否真的存在“女书”这样的文字，我们仍不得而知。但对于七十二寨的侗女来说，从出生到死，她们把生命很大一部分的时间，都花在这一针一线上。刺绣，凝聚着她们对美，对自己生活的地方，对自己生活的很大一部分的理解。

侗族人没有文字。在过去，侗女甚至难得走出自己生活的寨子。但她们似乎已经约定，用绣衣和其他纺织品来传递信息，来记录自己、家庭、乃至整个寨子、整个民族的信仰和历史。在这些凹凸立体、繁复美丽，犹如青铜器上所篆刻的图



她们身上所穿衣服的好坏，将会和她的仪态一样，成为年轻男子和他的家庭关注的焦点，以此判断女孩是否心灵手巧，是否知情识趣，家庭中是否有得力的女性长辈，然后，才会是成就婚姻的开始。



案那样高度抽象凝练的纹案上，过去和现在展开对话，日常生活的一切与世界不断发生着交织和互动，而刺绣技艺，就是她们记录的纸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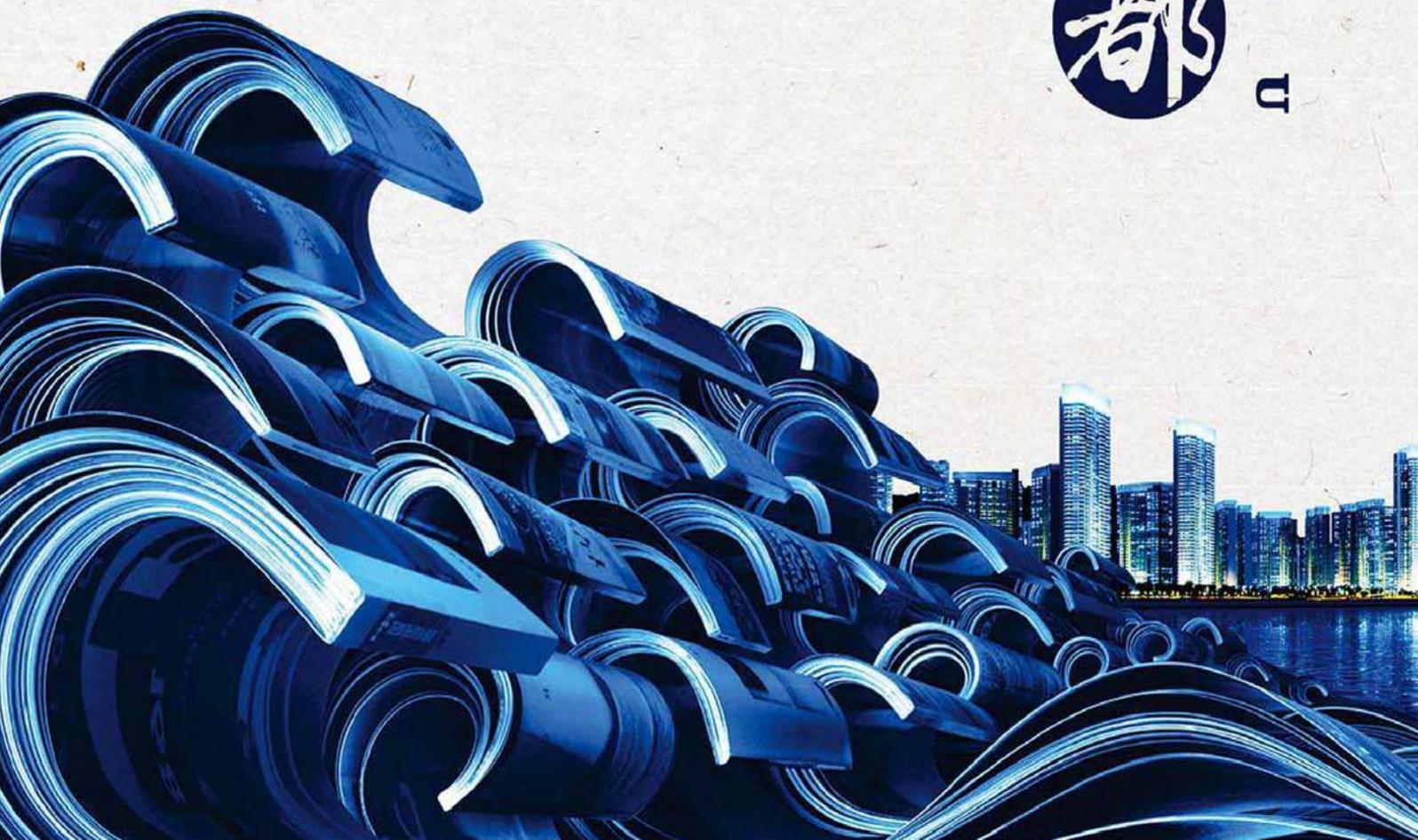
一针一线间的生活中，凝聚着女性们的图画史诗。人类对美的不断追求，演绎出的正是另一种体例的历史。①

生活，
不仅有眼前，
还有诗和远方。

书香

C H E N G D U

成都



纸牌趣史：从“叶子戏”到扑克牌

文 | 刘杨



扑克牌是一种十分普及的游戏工具，几乎人人都会玩。作为纸牌的一种，扑克牌的便携性让它可以出现在任何地方，而且只要有两个人以上，即成牌局。

由于纸是一种脆弱的介质，古代的纸牌难以保存至今，这也让纸牌的发源地存在多种争议。在印度、波斯和埃及都可以追溯到早期纸牌的样本，但大多数专家学者认为，纸牌最早发源于中国。英国近代科学技术史专家、汉学家李约瑟在其专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认为，纸是中国人发明的，因此中国人发明纸牌不足为奇。

中国古代的“叶子戏”是纸牌的鼻祖。有关“叶

子戏”的最早记载出自唐人苏鹗的《同昌公主传》：“韦氏诸宗，好为叶子戏。夜则公主以红琉璃盛光珠，令僧祇捧之堂中，而光明如昼焉。”这段记载能看出，同昌公主到了晚上还让人用夜明珠照明，以便自己玩“叶子戏”，可见这种游戏十分吸引人。

唐朝出现的这种“叶子”原本是当时的读书人夹在书中的便签。欧阳修在《归田录》中记载：

“唐人藏书皆作卷轴，其后有叶子，其制类似今策子。凡文字有备检用者，卷轴数难卷舒，故以叶子写之。”这种“叶子”转化成一种游戏的工具，在唐宋时期流行起来。《宋史·艺文志》中有几

《玩纸牌的人》(The Card Players)，法国画家保罗·塞尚绘。法国巴黎奥赛博物馆藏。图/Paul Cezanne/FOTOE

部有关“叶子戏”的著作，说明当时叶子戏已经有很多种玩法，但尚未发现有史料记载叶子戏的具体打法是什么样的。

到了明清时期，“叶子戏”广泛盛行于各个阶层，其中一种“马吊”牌的打法让很多人沉迷。这种马吊牌“四十叶为一具，一叶为一种，分四门，自相统辖。打时，四人入座，人各八叶，以大击小而现出色样，及余八叶冲出色样，出奇制胜，变化无穷。”这种“马吊”牌后来演变为今天的麻将。

纸牌由中国传入欧洲，很有可能是与蒙古西征有关。拉施特在《史集》记述远征欧洲的蒙古人十分喜欢娱乐，或许这些蒙古人随身就带着便携的纸牌。

意大利人则声称最早的纸牌出现在他们那里，威尼斯商人在外出经商的旅途中发明了扑克用来娱乐。由于马可·波罗曾经到访中国，李约瑟借此推断，纸牌是通过阿拉伯人或类似马可·波罗那样的旅行家由中国传到欧洲的。1377年德国和西班牙首先出现了扑克牌；1378年，意大利人和比利时人也开始玩扑克牌；法国人则在1381年开始进行这种娱乐活动，扑克牌的四种花色（黑桃、红心、方块、梅花）就是在法国起源并流传至今的。至于哪个国家在扑克牌的发明上占得先机，则成为一个永远的谜。

也有一些历史学家认为纸牌起源于波斯，然后传到印度、埃及，最后在14世纪经埃及传入欧洲南部地区。当纸牌传入欧洲南部后，很快便蔓延至欧洲其他地区。早期的扑克牌是手工制作的，因此十分昂贵，手工绘制的纸牌甚至经常被作为结婚或其他正式场合的礼物。15世纪，古登堡在欧洲发明活字印刷术之后，扑克牌的大众化生产才成为可能。古登堡本人也曾经生产过扑克牌。

随着扑克牌的普及，赌博成为了一种流行的大众消遣活动。由于担心赌博的增加会让败坏的道德在下层阶级中蔓延，当时欧洲的教会和国家便开始干预和控制扑克牌的销售与使用，并告诫人们玩扑克牌可能会导致犯罪、欺诈、打架以及其他种种恶行。



二战时，美国扑克牌公司曾经与政府合作，秘密生产一种特别的扑克牌。这些扑克牌被送到在德国的美国战俘手中。将纸牌湿润后，上面就会显露出逃跑路线图。



1376年，文艺复兴的发源地佛罗伦萨开始对扑克牌实施禁令。两年后，德国对从事高风险赌博的人处以罚金。在15世纪，英国议会禁止人们玩牌，只有圣诞节的假期可以例外。16世纪，法国国王亨利八世则检讨了自身，他认为自己在弓术练习上做得不够好是由于扑克牌让他分心的缘故。

1628年，英国国王查理一世执政时，颁布法令严禁从国外进口扑克牌。在法令颁布之前就已经进口的扑克，必须由税务官打上一个带有皇冠图案的红色印章才能销售。1712年，英国政府开始使用黑桃A作为完税标志，而且这张黑桃A必须由政府印刷，并且强制扑克制造商将厂家名字印在扑克牌上。曾有人以身试法，冒险私自印制黑桃A，结果被判处死刑。18世纪时，俄国也曾经对扑克牌进行征税，然后把征来的税收用于补充军费。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扑克牌的背面是没有任何花纹图案的，因此扑克牌也被用作其他用途。人们常常用扑克牌的背面来进行一些记录，或是写请柬或情书。法国政治理论家孟德斯鸠就用扑克牌的背面来做笔记。

早期前往美国的欧洲人同样带着自己的扑克牌。虽然起步晚，但是美国人也对扑克进行了一系列的改良。扑克牌中的小丑牌（Joker）就是由美国人发明的。在一种叫“尤克牌”的游戏中，小丑牌被作为最大的王牌。此外，美国人最先在纸牌上设计两张倒置肖像，这样在玩牌的时候就不用倒过来看是什么牌了。纸牌的四个角被切成圆角，防止在玩牌时被划伤。更加光滑的纸牌也出现了，让洗牌更加容易。而且美国人还用扑克牌作为广告载体，为扑克牌增加了更多的商业元素。

美国扑克牌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扑克牌生产商。为了推广桥牌以及销售更多的扑克，美国扑克牌公司在1922年建成了自己的电台，教大家如何玩桥牌。二战时，美国扑克牌公司曾经与政府合作，秘密生产一种特别的扑克牌。这些扑克牌被送到在德国的美国战俘手中。将纸牌湿润后，上面就会显露出逃跑路线图。^①

日本樱花文化中的凄美情结

文、图 | 陈仲丹

一个晚上，大风吹来，满树的花一下子就凋谢了。樱花的这一特点与日本传统文化推崇的生死观是契合的。在日本人的心目中，与“生时的辉煌”相比，“死时的尊严”更受崇敬。日本人认为人生短暂，活着就要像樱花一样灿烂，即使死，也该像落樱一样果断离去，不带一丝游移。

樱花在日本被奉为国花，樱树被尊为“圣树”、“神木”。日本一些有名的神社每年都要举行一种叫安乐祭的民俗活动，以祈求樱花神的保佑。总之，自古以来日本人对樱花就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爱怜。它早已变成一种难以化解的心绪、情结，一种固定的审美心态。

❖ 赏樱的由来

樱花的栽种在日本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它最早是作为农耕文化的象征与稻米耕作联系在一起。远古时期，樱花的盛开被日本人当做秋天将要获得丰收的征兆，每当樱花盛开，他们都会围着樱花树载歌载舞。古人通过山野中樱花开放的情况来占卜当年稻米的收获量。为了祈祷樱花美丽、长久地开放，农民们准备了一天的酒肴，然后登上山野在樱花树下一边祈祷，一边歌舞。在他们看来，樱花繁花似锦的美实际是农耕女神降临到人间来赐人幸福。而日本人最早崇敬的花并不是樱花。在奈良时代（710年—794年），人们更喜爱梅花，如《万叶集》中的咏梅歌有118首，咏樱歌只有42首。后人在评价《万叶集》时说“忠怨尤霹雳，诚感唯梅花”。到了平安时代（794年—1193年），樱花却成了花中的主角，或许是梅花的典雅气质不太适合阴郁幽玄、古拙本色的岛国之民。贵族们发现自己身边的樱花更适合他们的心理需求。在京都，平安神官外的梅花被全部铲除，代之以樱花。樱花逐渐成为歌者的新宠，905年间

世的《古今和歌集》中咏樱的数目远远超过梅花，其中的名句有：“世间若无樱花艳，春心何处得长闲？”更有甚者，《古今和歌集》的编撰者纪贯之，有一天看到一位女子在采摘樱花，便一见生情，咏了和歌，交给那个女子的家人：

山樱遍野白云卷，雾底霞间闻芬芳。
多情最是依稀见，任是一瞥也动人。

樱花在日本花卉世界获得至尊地位有一系列原因：首先，它的颜色自然素雅与日本崇尚“简洁美”和“柔弱美”的审美情趣较为契合，由此引发了日本人的“物哀”和爱怜之心；其次，随着佛教兴起，佛教中无常的观念在日本人的价值观中得到强化，认为万物变易、一切皆空，而樱花随风飘落、易逝、花期短的特点正好切合了人们这种心态；还有，这一变化与当时日本提倡“国风文化”有关，以前日本人更崇尚中国的“唐风文化”，但随着民族意识增强，梅花地位下降，赏花文化的序列樱梅交替，具有日本本土特征的樱花成为首选。

到了平安时代后期，宫廷举办了各种赏樱活动。在日文中赏樱被称为“花见”。据说日本历史上第一次赏樱会是9世纪时嵯峨天皇主办的，他每年春天都举办“观樱之宴”。后来，他的儿子仁明天皇将皇宫紫宸殿南阶下“左梅右橘”的景观布置改为“左樱右橘”。1598年3月15日，丰臣秀吉结束了战国多年的纷乱，在京都醍醐寺举行赏花大会。这次“花见”办得特别隆重，丰

到了平安时代，樱花取代梅花成了花中的主角。或许是梅花的典雅气质不太适合阴郁幽玄、古拙本色的岛国之民。贵族们发现自己身边的樱花更适合他们的心理需求。



“醍醐花见”，丰臣秀吉在京都醍醐寺赏樱。

臣秀吉亲自去现场指挥筹办，前后五次去醍醐寺，从外地移植了700株樱花树，还建造了三宝院等庭院。他每次去都施以恩惠，送给醍醐寺土地，帮助修建房屋。赏花会那天在醍醐寺周围设立了众多岗哨，配备手持弓箭火铳的武士，来回巡逻。参加活动的有他六岁的儿子秀赖、正室北政所、

侧室淀君（秀赖生母）等1300多人。在一片四周种满樱花的高地上，地上铺着绯红色的毯子，放置供他赏花吟歌的座席。当时离他去世只有几个月，他也有预感，在赏樱时频频举杯，借着樱花奋力绽放散去的精彩，暗喻自己的事业，并即兴赋诗：“随露而生，随露而散，此乃吾身，如烟



往事，宛如梦中之梦。”整个赏樱活动规模宏大，奢侈壮丽。为了纪念这次“醍醐花见”，醍醐寺至今在每年3月的第二个星期天都要举行“太阁(对丰臣秀吉的尊称)花见行列”，以再现当年的盛况。

而赏樱成为一种全民爱好则是17世纪江户时代的事。一时间赏樱习俗风靡全日本，当时的场景是，“或歌樱下，或宴松下，张幔幕，铺筵毡，老少相杂，下贱相混。有僧有女，呼朋引类，朝午晚间，如堵如市”。幕府的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为了民众的赏樱之便，在江户（今东京）城内栽种了数千株染井吉野（樱花名种，以产地命名）苗木。人气很旺的吉原游廓（娱乐场所）每年3月1日举行樱花祭。这里的樱树事先都经过花匠调整开花期，向民众开放。到19世纪中期，“赏樱花不单是追求热闹，也会举行各种如和歌、净琉璃（民间曲艺）、舞蹈、俳句（短诗）、狂歌等文化活动”。人们一面赏樱吟诗，一面饮宴欢聚。有个明治年间在日本生活的外国人记载道：“在飘香的樱花树下，人们摆酒设宴以增加快乐，增进交流，用音乐和诗歌赞颂植物界的奇迹。”在日本居留多年的德国人西博尔德认为：“在日本，

花和诗是不能分离的两个轮子。当樱花和李子如雪一样挤满枝头，当茂盛的藤蔓厚厚盖住藤棚的时候，日本的诗人在他们喜爱的花影下休憩，在金色的小纸上记录下当时的感怀，然后把纸挂在咏进诗里的树的枝丫上。”有人看到，“樱花盛开的时候，一位老人斜挎着装满酒的大葫芦，腰带里塞满厚厚的卷纸，坐在飘着花雨的树下。他并不是想引起别人的注意，只是一个人赏花、喝酒、咏诗。”晚清诗人黄遵宪是清国的驻日外交官，他曾写下《樱花歌》：“墨江泼绿水微波，万花掩映江之沓。倾城看花奈花何，人人同唱樱花歌。……花光照海影如潮，游侠聚作萃渊薮。……十日之游举国狂，岁岁欢虞朝复暮。”诗中写尽了日本人春日赏樱时举国若狂的盛况。

❖ 樱花之美

樱花这种花木，只有实地观赏才能悟出它的神奇之处。说它神奇，是因为它在一年中不开花时实在没有什么引人注目之处。它的树干称不上伟岸、挺拔，然而一到盛开时就会瞬间把整个日本染成一片花的海洋，给郁郁葱葱的山川披上一

01

02
03

01 日本妇女以樱花为头饰簪花。

02 《源氏物语绘卷》图，平安贵族的府邸庭院中栽种樱花。

03 瓷盘上的赏樱图，描绘的是古代日本人在樱树下品茶。



身粉白绯红的盛妆。

日本将每年的3月15日至4月15日定为“樱花节”。由于樱花的花期短，花瓣娇嫩，经不起风吹雨打，赏花必须抓紧时机。但每年从2月到5月，由于气温的影响，从冲绳到北海道，樱花从南到北次第开放，日本人称之为“樱花前线”。这时，走出家门，来到樱花盛开的野外、公园、河畔，尽情享受一年一度造物主独赐的快乐，是日本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事情。

在日本众多的赏樱名所中，最值得一提的要算东京的上野花园（前身是宽永寺）。这是日本的第一座公园。鲁迅先生在《藤野先生》中描写过上野公园：“上野的樱花烂漫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看来上野公园的樱花一百多年前就很出名。上野公园樱花树的规模最大，品种最丰，气势也最旺。花开最盛时，一棵棵樱树花枝招展，争奇斗艳，密密麻麻，连成一朵长达数百米的樱花林荫道，盛开的鲜花把长长的树枝压得低垂。游人成群结队，带着塑料布、草席甚至榻榻米来到赏花的地点，摆开阵势，饮酒品茶，在樱花树下一待就是一天。

樱花的美，美在当它盛开时，枝干上只见花儿不见叶。满树的丰盈，结结实实，密不透风，花儿密集地抱在一起。樱花的美，美在以多取胜，美在灿烂壮观，美在绚丽夺目。它恣意地尽情绽放，给人目不暇给、喜气洋洋的感觉。赏花者坐在树下，环视四周的樱群，有纯白的，有粉红的，有粉白的，也有绯红的，绚丽烂漫。清风徐徐吹过，花瓣像片片雪花飘扬，渐渐地上的花瓣越积越多。这时，抬头看不到蓝天，只见满树璀璨的繁花；低头看不到绿草，只见遍地单薄的落英，有着一一种不可思议的意境。

在日本人眼中，樱花的怒放与陨落是四季迅速轮转的一个缩影。樱花群芳灿烂，美不胜收，但花期又过于短暂，历来有“樱花七日”的说法。

一个晚上，大风吹来，满树的花一下子就凋谢了。樱花的这一特点与日本传统文化推崇的生死观是契合的。在日本人的心目中，与“生时的辉煌”相比，“死时的尊严”更受崇敬。日本人认为人生短暂，活着就要像樱花一样灿烂，即使死，也该像落樱一样果断离去，不带一丝游移。

这种心态在小川和佑《樱花的文学史》中说得很清楚：“男性通过樱花看到的是一种甘美的死；女性透过樱花看到的是自己内心深处复杂的情愫。当这两种关于樱花的梦相互重叠合二为一时，那就好比盛开的繁华一样的极具魅力的死便会陶醉每一个人。而这样的情愫正是我们心底深处潜在的、最复杂的樱花观。”明治后期的诗人大町桂月也有同样的感受，他认为，樱花“其色淡红无造作态，突然开放而后转瞬无所眷恋的凋零，群树齐生，满山皆花蔚为壮观。若论日本国民之特质，淡泊恬然，达观慷慨，不畏生死，非个人而依整体抱团方显强大，因而断言樱花是日本国民之表象也”。本居宣长还写有一句著名诗句：“欲问大和魂，朝阳底下看山樱”，将樱花比喻为日本民族的灵魂。

因而，在赏樱的审美体验中，日本人更在意的是落樱的苍凉凄美。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在《四季的心》中这样描写落樱：

一鸟居前的独木桥，都被樱花所簇拥，树上的樱花不断地落下树梢。飘落在神社长满绿青的房顶上的樱花分外娇艳，从深檐阴影的黑暗中，连绵不断地穿落而下，叫人难以舍弃，就如同金箔从全景灿漫的描金屏风中剥落下来一般。一种可怕的失落感，这就是春天，这就是樱花。

在日本和歌中，描写樱花零落的作品比描写樱花盛开的要多得多，诗中写的都是对落樱的惜情，如：

春雨绵绵下，可是悲伤泪？
曾是灿烂樱之花，今却飘落地。
谁人不怜惜。（大作黑主作）

春日宿春山，白日赏樱为之醉，
似难醒，梦中犹见樱花坠。（纪贯之作）

一片片细小的粉红、洁白、嫩绿花叶叠加在一起，在一夜间骤然开放，似云如霞，占尽春光，洋溢着生命复苏的欢乐。很快，又像雪花般飘然而逝，如此的干脆利落，对世间繁华一点也不留念。这种美而易逝的事物最让人怜惜。

❖ 武士与樱花

日本自古就流传这样的谚语：“花数樱花，人数武士”。日本人在历史上将樱花看做是武士的象征。这与樱花的特点有关，樱花最美的时候恰是其凋谢之时。一夜之间满山樱花全部凋谢，没有一朵留恋枝头。这也是日本武士崇尚“瞬间美”的精神境界，“宁愿短暂，只要灿烂”。樱花的瞬间凋零，就如同武士在片刻耀眼之中达到人生的巅峰。日本作家喜欢用红叶和樱花暗喻血与死，这说明在其民族的深层意识中，惯常将对生理的恐怖赋予美的形式。樱花凋谢时落英缤纷，华丽而凄婉，以此来比喻武士之死。

在日本的传说中，最初樱花是白色的，后来武士们喜欢在樱花树下剖腹自杀，樱花树下血流成河，从此就开出了红色的花。樱花的花瓣越红，表明树下的亡魂越多。日本著名的历史剧《忠臣藏》中的主人公浅野长矩被逼剖腹自杀，临死前他写的辞世诗中就提到了樱花：“春风吹，樱瓣飞，离情依依眷眷心。吾亦惜，吾亦恋，此情此意谁与诉。”直接将武士的死比作被春风吹拂的落樱飞散。

丰臣秀吉早年曾是尾张国大名织田信长的部将。1582年丰臣秀吉在作战中失利，织田信长亲自率军援救，途中留宿京都本能寺，因家臣明智光秀举兵叛乱，织田信长被迫剖腹自杀。为了报答织田信长的知遇之恩，丰臣秀吉在大德寺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并赋诗悼念：“我如朝露降人间，和风樱花随谢意。四十九年一朝梦，一期荣华一杯酒。”感叹织田信长人生的49年犹如朝露樱花，人生的荣华权势亦如一场梦般易逝，一



日本的传说中，最初樱花是白色的，后来武士们喜欢在樱花树下剖腹自杀，樱花树下血流成河，从此就开出了红色的花。





● 东京宽永寺（后为上野公园）的樱花。

杯酒般易醒，其中透露出对人生无常的喟叹。

让人遗憾的是在近代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后，樱花竟被当做为侵略者张目的道具，让这种圣洁之花一度蒙羞。比如在日本发动甲午战争侵略中国时，曾占领辽东半岛，要求清廷割让，后在俄、法、德三国干涉下，日本不得不归还辽东半岛，但要求清政府付出巨额“赎辽费”。在这件事上就有日本人以樱花做起了文章。据日本文

献记载：“伐清大军大举进攻，席卷辽东之野，有人遂在半岛植樱树五株，谓名曰‘朝日樱’，想必是为了让异域芳香馥郁永久，万年之春常驻。岂料转瞬间满目江山复归他人之手，名与花皆落空跌入尘埃。然而，不必拘泥于今，花若遇春总会发，要使敷岛（日本别称）的大和心得以彰显，唯有等待春天的再临。此间的樱花将是未来之花，必将迎来东风，吐露芬芳。”就这样，樱花竟成了日本抢占中国领土的标志，变成了欺压邻邦的象征。

另外，日本军部在日俄战争后发布的《军人精神教育》中也有一段提到樱花：“自古以来，有‘花数樱花，人数武士’之说。所谓武士，即尔等军人也。若把军人以花喻之，则樱花正合也。……一朝遇无常之风，则旧枝花香不再。即使烂漫绽开至极，则当毫无眷顾，如一滴露珠消散于战场。其心其事，何等勇烈高尚哉！尔等之职业即战斗。为了军国，生命轻如鸿毛。任让无常风暴来之，忘却父母妻子，义无反顾，岂不当抱定如樱花般散落之决心与觉悟乎？”这就更直露地利用樱花，以樱花的自然属性作为对军人进行精神洗脑的工具。

如果再看看太平洋战争后期日军的神风特攻队，就会发现每架自杀飞机上都绘有樱花。它们执行的是自杀攻击，用飞机去撞击美国军舰。当时有一幅照片：一排日本女中学生身着水兵服，并肩而立，挥舞着樱花枝条，送别这些一去不回的飞行员。其中有个叫小林的飞行员在起飞前留下了日记：“我陷入了孤独、祈祷、内疚和对社会的责任感，唯独没有爱情。我知道，人们经常用樱花来比喻人的一生，在短暂的生命结束时绚丽地飘落，但我不喜欢这种飘落，它太纯粹了，没有犹豫。人不应该这样轻易地死去。”明显流露出对日本法西斯灭绝人性的批判。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因为樱花曾被军国主义势力利用，一度不受人们重视，甚至有人培植苗木，卖不出去而付之一炬。直到1964年日本举办东京奥运会，国会的众议院议长等人号召“使日本再度成为樱花国度”，成立了“日本樱会”，开展植樱运动，樱林又绿遍四岛，赏樱活动复苏，这才使樱花文化重放异彩。^①

百年前的“特区”：商埠济南

文 | 牛国栋

“商埠”是指旧时与外国通商的城镇。商埠在中国大量出现，是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炮舰政策”的副产品，东南沿海诸多通商口岸都是被迫“约开”，而济南开埠则由中国人自主决定。开埠后的济南发展迅速，成为清王朝最后几年向世界开放的最大商业区，仿佛让垂暮的清王朝看到最后一丝希望。

自 1863至1898年，山东的烟台、青岛两地相继开埠，使这两座原以渔业为主的村镇迅速崛起，发展成为通商口岸城市。这也深深地影响着相距不过几百公里的省城济南。

1875年，山东巡抚丁宝桢在济南城北泺口以东的新城创建了山东机器局，购买外国机器造起了洋枪洋炮。1898年，济南设立了洋务局，专办教案和洋务事宜。1901年，袁世凯在城内创办山东大学堂，1904年又在西关圩子城外新建校舍。早已觊觎山东腹地的洋人也打起了自己的算盘。1901年，强占胶州湾并取得胶济铁路修筑权的德国，在济南圩子城西擅自修建了商务代表处（后为领事馆）和德华银行。1904年，胶济铁路修至济南，全线通车，德国人在这一年还开办了邮局。这些都打破了济南素以老城为中心，在内城和圩子墙里打转转儿的传统。一位在济南任职仅27个月的山东巡抚，却对这座古老城市的变迁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就是周馥。

❖ 济南的开埠与开拓者周馥

周馥（1837年—1921年），字玉山，号兰溪，安徽建德（今东至县）人。年少时聪颖过人，家里省吃俭用供他读书。十七岁时，他离开家乡到安庆谋生，以为人代写书信、测八字算卦为业。



Tips

1899年至1904年间，德国强占胶州湾后在青岛与济南间修建了一条贯通山东腹地的胶济铁路。这条铁路对山东社会、经济各方面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晚清山东历史上重要事件之一。

1902年，英国派任威海卫大臣路克哈特（左二）会晤到访的山东巡抚周馥（右）。
图/FOTOE

同治元年（1862年）春，经人介绍，周馥凭借一手好字和一笔好文，赢得了李鸿章赏识，应募在其手下担任文书。他跟随李鸿章近四十年，历任道员、盐运使、按察使、布政使、巡抚和总督等职，是清末政坛上一位重要的地方大员。1895年5月，他请辞回了老家，赋闲在家三年半。李鸿章请其出山，协助治理黄河水患。

1901年11月，李鸿章离世后，袁世凯从山东巡抚升迁至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周馥与袁世凯同为李鸿章幕僚，二人素来交往甚密，意气相投。袁小周二十二岁，周是袁的叔叔袁保庆的至交，算是长辈，后来两人便好上加亲，成了儿女亲家。周馥最小的女儿瑞珠，幼年时就与袁世凯的第八个儿子克轸订了婚，袁世凯去世后两人正式成亲。周馥的第四个儿子周学熙曾任袁世凯创办的山东大学堂的总办，相当于校长。周学熙主持订立的《山东大学堂章程》，成为那个时代全国大学堂管理制度的范本。此后经袁世凯相邀，周学熙还曾两任民国财政总长。

1902年5月28日，周馥任山东巡抚，并加兵部尚书衔。8月初他刚抵济南，就遇上黄河利津等多处河堤决口之危情，他一面组织官民修筑堤防，一面备有大量堵漏用的石块以防不测，同时沿黄河大堤架设电报通讯线路，以及时掌握汛情。他还定期雇用沿河住户居民巡查保护堤坝，以防破

坏。这些措施使黄河山东段在此后的十余年间，再没有发生决口的情况。

他入主山东后发现，济南过往的施政作为多用在兴学、修庙、治河等方面，世间弥漫着浓厚的“重儒轻商”之民风，每年的贸易额仅有数百万两，其经济地位在省内非但比不上烟台、青岛等“约开商埠”城市，甚至也不及周村、潍县、济宁等地。因此他极力赞成袁世凯提出的“新政”，力主除旧布新，扶持农桑和手工业。他在济南设立了工艺局、树艺公司、桑蚕总局、缫丝厂、染织厂、志诚砖瓦厂、金启泰铁工厂、济和机器公司以及一家银行。1903年，他以官商合办名义，在府城东郊七里堡以北购地十二公顷，创办山东农事试验场，聘日本人谷井恭吉教习农桑，试种日本谷类蔬菜瓜果、美国豆类棉花及本地谷物和蔬菜等，并在南郊燕子山、马鞍山、千佛山南麓辟林场三处，栽植树木。

尽管周馥一生没有取得科举功名，但他勤奋好学，笔耕不辍，留下大量诗文专著，并十分重视新式教育。1902年10月，为选送京师、直隶保定及留学日本的师范生，在他的提议下，山东大学堂附设师范馆，首批招生一百零四名，成为全国地方官办师范教育之滥觞。翌年秋，选派五十人赴日本宏文书院留学。1903年10月，师范馆与山东大学堂分设，改称山东师范学堂。周馥将全省七十一个县的旧式书院，改为新式学堂，以借鉴日本和西方的办学理念。1903年6月25日，他创办了济南乃至山东第一家报纸《济南汇报》，作为地方政府官报，每五天刊出一次，“分政、事、文、学四纲”，页数不定，没有广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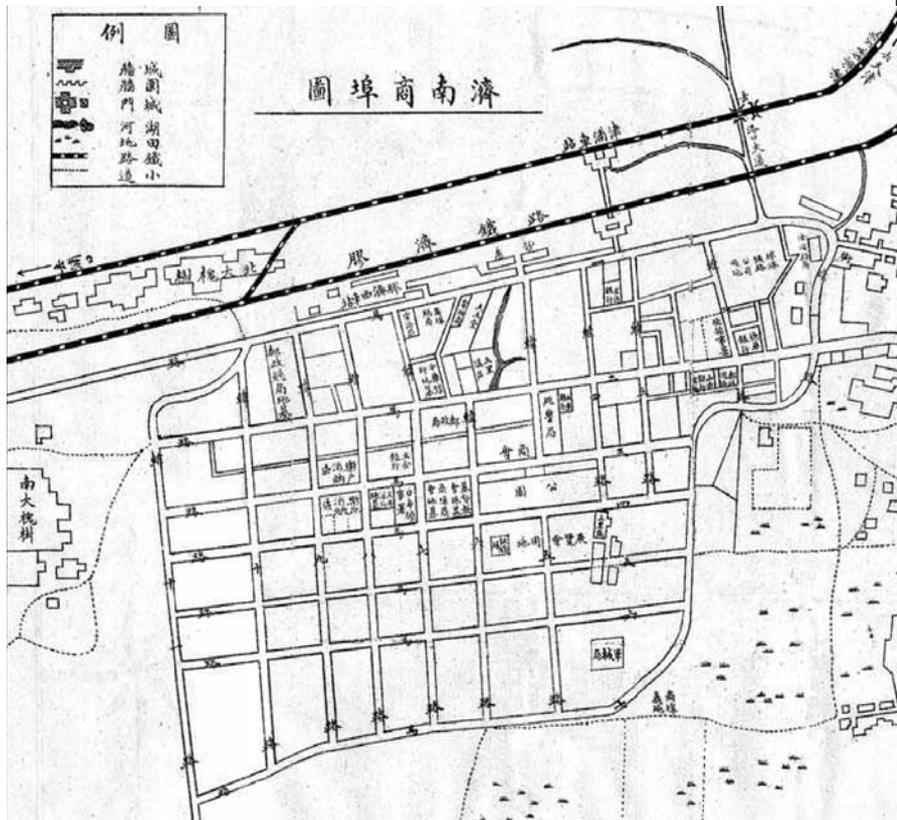
在对待洋人的态度上，周馥也和袁世凯惊人的相似。他俩主张一方面抵制外国对山东的影响和经济侵略，一方面又为寻求解决山东存在的各种问题与洋人接触和沟通。周馥来济南之前便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结下了友谊，并表示出对基督教义的浓厚兴趣。他来济南后，向来访的李提摩太及其四个女儿提供了轿子、游船和茶点，供他们畅游大明湖，并举行了丰盛的晚宴。李提摩太在其《亲历晚清四十五年》的书中高兴地写道，

周馥“在所有的中国政府官员中，是最令人感到亲切的一个”。1902年12月，周馥提出访问胶澳（即青岛）的要求，令胶澳总督德国人特鲁泊深感意外。在此之前，山东和胶澳的联系，都是在非正常状态下进行的。按照当时在青岛的德国传教士、汉学家卫礼贤所著《中国心灵》的说法，特鲁泊在“采取了一些秘密的防备措施”后，接受了周馥的访问请求。周馥在青岛访问期间，亲眼目睹了这块被洋人强行租借之地的迅猛发展，也看到了中国人在租界内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他在与特鲁泊的几次会晤中，不仅表达了中国想要收回丧失的权利，结束殖民统治的基本意图，而且也表现了他对时局的关心。周曾对特鲁泊说：“即使青岛已租借给德国，它仍属于山东地盘。”如卫礼贤所说：“他那率真坦诚和健康的幽默感立刻扫去了人们心中的疑云。”这无疑显示了周馥在外交上的才华。

周馥成为继袁世凯之后第二位到青岛访问的清廷高官。他的这次访问在当时朝野上下饱受诟病，甚至被晚清李宝嘉所著的“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讽刺得不轻。虽然没有详细证据表明他的青岛之行与济南开埠有直接关系，但他这次“破冰之旅”，从一定意义上增强了他对山东寻求变革的决心。

在济南开埠动议上，袁世凯与周馥更是一拍即合。1904年4月4日，离胶济铁路通车不足两个月，袁世凯和周馥联名上奏，请求济南、周村、潍县三地自开辟为“华洋公共通商之埠”“借堵洋人寻衅滋事之口”“以期中外咸受利益”。不日即获清廷外务部照准，当年即勘定界址。

为将新开之埠建成精心规划、文明有序的新城区，袁世凯和周馥等人进行了周密安排。先是成立商埠总局统一协调管理商埠事务，下设工程局，掌管界址内工程建筑、房地产、工商行政、税务、治安管理，并制定相关的规划与规章。袁世凯还邀请其亲信、前任上海道台的袁树勋参与济南商埠开办筹备工作，主要是打造规划管理体系。袁树勋带来了上海相关的法律规章，作为济南新建



商埠的样板。同时还参照岳州、秦皇岛等地开埠章程，对济南商埠开发建设与管理做好制度安排。袁树勋因此与济南结缘，于1907年再次来济南，做了22个月的山东巡抚，为商埠建设继续发力。

1904年11月，周馥被调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1906年1月10日，济南举行了隆重的开埠典礼，周馥的继任杨士骧出尽了风头，而人们没有在此见到周馥的身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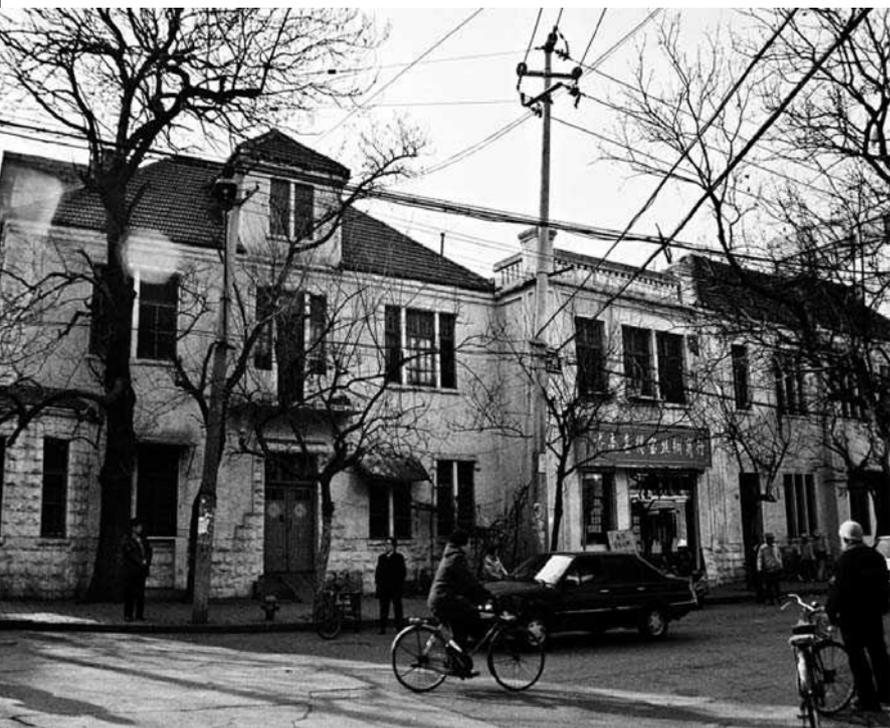
辛亥革命后，一大批前清遗老遗少移居青岛德国租界寻求庇护，周馥更是熟门熟路，近水楼台，在青岛购建了前清官吏中最大的宅第，并在那里生活了一段时间。周馥还被推举为由苏、皖、赣、浙四省籍人士在青岛成立的三江同乡会会长。后来他去了天津。1921年8月21日，做了许多年寓公的周馥病逝在天津寓所，终年八十四岁。尽管

01	02 03
----	----------

01 1915年的济南商埠地图。（选自《济南指南》）

02 胶济铁路的建设是济南自开商埠的重要外因之一。图为1904年胶济线开通仪式。

03 德国洋行是最早进入济南商埠的外国商号。图为位于经五路纬三路的路德洋行旧址。



周馥生前很少提及自己在济南开埠时所做的一切，甚至他从济南卸任后很少再回济南，但今天的济南人应该记住他。

❖ 精心打造一个济南城

济南商埠的范围在今天看来也是颇具规模的，其设定也富有远见，在西关外东起馆驿街西首的十王殿（今纬一路），西至大槐树村，南沿长清大街（今经七路），北以胶济铁路为限，东西长约5里，南北约2里，共4000亩土地，约2.5平方公里，同老城面积大致相当。商埠内规划有洋行贸易处、华商贸易处、堆货处、西人住家处、领事驻地以及公园、花园、菜市、营房等，城市功能较为齐全，很受投资者的欢迎。1905年10月23日《东方杂志》载：“济南开办商埠，设局勘界，均将就绪，近闻商贾铺户陆续注册者已多至千余家。”同时还保留了北岗子、五里沟、魏家庄、大槐树庄、官扎营等原有村庄的“原生态”，保护了原住民的生存空间。在街区划分上也是因地制宜，布局严谨，主次分明，开发有序。确定主要道路东西为经，南北为纬，路面宽度七米至十七米不等。棋盘式纵横的道路布局，将土地划分成若干小方块，路网间距在两百米左右，既遵循了周代《考工记》中所谓“九经九纬”的道路布局，又展示了近代流行的小网格城市的别样风采。街区深处则是里弄（济南称里分）、别墅或宅院。这种便于功能分区的布局，无疑借鉴了西方近代城市建设中的惯用手法。

清廷在开埠事宜上“吃一堑，长一智”。虽然受当时历史条件局限，商埠规划仅是划地租赁和扩建的方案，尚缺乏近代城建规划的理论指导。但他们无疑借鉴了其他“约开口岸”及国外城市的建设经验，突显主权意识和公平公正之精神。如《济南商埠租建章程》第一节规定，“埠与条约所载各处约开口岸不同，准各国洋商并华商于规定界内租地杂居”。要求中国人与洋商共同遵守。第十节规定，“济南城外既开商埠，



所有洋商在此规定界内可任意往来，携眷居住、贸易。但在济南城关内外，以及附近各处，仍按中国内地章程办理”。这一章程还进一步强调，商埠中不准划分租界。这就保证了国家对土地的所有权。土地租价则是按照中国传统的福、禄、寿、喜的称谓确定了四个阶梯租价，以火车站附近最贵，由东至西逐次递减。租建章程中对工程建造也有着详细的规定。如在商埠内严禁搭盖草屋。建造计划须事先报工程处和警察局审查批复。所有建筑物必须安装污水管道，引入建设局统一建设的水道排出等等。而且邮政、电话、电报等经营权和司法权由中国人自理，“外人不得干预”。

当时，商埠已具有今天“特区”的某些特点，洋商在埠内有了“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外国资本纷纷从东部沿海涌入这里，仅1905年以后的三四年的时间里，洋行就达二十多个，其中德、

日、美、英居多。德国一战战败后，日本趁机掠夺胶济铁路经营权，在经济上控制山东。在“五三惨案”发生之前，日本在济南的侨民达两千余人，日资商号达一百七十家，都集中在商埠。济南也成为东三省之外，日本洋行最多的城市。德国、美国、日本、英国和瑞士的领事机构也在商埠设立。同时，采取了免除土货出口税、裁减厘金、投入官款扶持实业开发等通商惠工政策，以扶持本国贸易，并鼓励国人投资工商业与外商竞争，极大地刺激了国内工商业者的资本注入。人们在此开办商号、银行和工厂，从此掀开了济南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成建制”的开发建设的序幕。

在短短的十几年间，商埠区逐步形成了以老火车站为半径轴心，以此向东南西三面辐射，以经二路为东西主线，以纬二路和纬四路为南北支架的新城区格局，使济南这座典型的单一的封闭型内陆城市，逐步发展成为老城与商埠并重，政



当时，商埠已具有今天“特区”的某些特点，洋商在埠内有了“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外国资本纷纷从东部沿海涌入这里，仅1905年以后的三四年的时间里，洋行就达二十多个。



矿企业“接管”。1939年日伪政权划齐鲁大学以西，四里山以北，岔路街以东，经七路以南约1500亩土地为南郊新市区，与北商埠遥相对应。1942年，日伪济南市公署又将北商埠南端开辟东、西部工业区，还陆续将原来保留的魏家庄以及官扎营、北坦、南大槐树、营市街等处划归商埠，使商埠总面积总计12943.344亩。

商埠的建立，对济南百姓的日常生活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济南的商业中心也从城里的芙蓉街、院西大街和西关、普利门一带逐步西移到了商埠一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商埠引领济南时尚潮流。那时，城里人买东西要到商埠，因为这里商店多，商品种类齐全，质量也好。外地人来济南，商埠成为他们看街景、购商品的必到之地。

从占地面积、目标设计和财政支出等方面来看，济南商埠及其潍县、周村两附属地属于清王朝最后几年向世界开放的最大商业区。清廷显然想把这种“自开商埠”的中国模式与外国人控制的“约开口岸”分庭抗礼。因此，济南商埠也成为近代史上山东乃至黄河流域，最早按照精心规划建设发展起来的商业化区域，为其他内陆城市提供了范例。

商埠的设计者不再沉醉于老城内“荷香柳影”“山色湖光”的浪漫诗意中，也不再拘泥于拥挤的老城的圈子里，而是另起炉灶，打造一番新的天地，向城西大片的荒地、坟莹和少量的农田寻求发展空间，从而也减轻了老城因发展而带来的各种压力。商埠的建立，对于济南这座古城无疑具有划时代作用，可以说没有商埠的济南是难以想象的。由于商埠和老城分置，虽然济南近现代工商业不断繁荣，但老城却依然保留着完整的格局，直到改革开放初期。这种“双核”或者说是“二元合一”的城市格局，在我国近代城市中虽不能算是孤例，却也是今天很多城市旧城改造时应该学习借鉴的样板。^①

（摘编自《济水之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除标注外，图片均由出版社提供）

01

02

01

民国时期的商埠呈现出与老城迥然不同的街区风貌。（历史照片）

02

如今的老商埠还较多地保留着当年的风韵。（牛国栋摄影）

治、文化和交通、商贸并举的现代“双核”城市。辛亥革命后，济南的城市人口由开埠前的12万增加到25万。尤其是1912年津浦铁路修至济南与胶济铁路交汇后，济南遂成为华北地区仅次于京津的商业集散地和交通枢纽，成为“各州商贾辐辏之处”。据《山东各地乡土调查》记载，当时济南已有杂货铺、绸缎庄、钱庄、银行、药铺、铁器铺、钟表行、漆行、洋货铺等商行32种，达1995家之多。

1918年和1925年，伴随着商埠区内商业的繁荣和人口的增加，商埠又先后两次拓界。泺口以南，津浦铁路以西，官扎营以北辟为“北商埠”，从而形成了济南城北面积广袤的大型轻工、化工、造纸、纺织为主的工业区，工商业门类更加齐全。济南沦陷后，日伪政权在老城和商埠内加紧推行殖民化统治，不但从商埠内德、美、英等国的洋商中抢夺利益，而且还将大部分银行、商场和工

大唐公主们的“任性”往事

文 | 李晓巧

在中国古代宫廷史上，皇帝的女儿们是一道引人注目的风景线。每个朝代的“金枝玉叶”都有各自特征，最具个性的是唐代公主，尤其是盛唐时期的公主们相当“任性”。

❖ 唐代那些跋扈骄奢的公主们

唐朝武则天时代，“宗室诸女皆以骄奢相尚”，她们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所贵于富贵者，得适志也。”所谓“志”可不是志气的志，而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为所欲为。

因是金枝玉叶，公主们有丰厚的收入过着奢靡生活。《资治通鉴》卷二百四记载：“（太平）公主方额广颧，多权略，太后以为类己，宠爱特厚……太平（公主）食邑独累加至三千户。”唐朝的惯例是，亲王的食邑（封地）不过千户，公主的正常食邑是三百五十户，而武则天给太平公主的经济待遇接近原标准的十倍！到唐睿宗景云初年，更是“加太平公主实封满万户”，这在唐朝历史上前所未有。而且，太平公主“田园遍及近甸”，田地庄园不仅多而且都是好地段，同时，她还很有经济头脑，“收市营造诸器玩，远至岭（南）、蜀，输送者相属于路”，经济实力巨大。

《资治通鉴》卷二百八记载，唐中宗神龙二年（公元706年），下旨：“太平、长宁、安乐、宜城、新都、定安、金城公主并开府，置官属。”

其中，太平公主是唐中宗的妹妹，另外的六个公主都是他的女儿。国家为七个公主设置了衙门和一套办事班子，这助长了公主们干涉朝政的念头。唐中宗景龙年间，左监门大将军薛思简等宦官，“纵暴不法”，即便有监察官员弹劾他们，朝中大臣也不敢治他们的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被当朝皇帝的女儿安乐公主所宠信。

公主们飞扬跋扈的例子很多。唐代刘肃的《大唐新语》中说：“安乐公主、韦温等侵百姓田业”，个别有良心的官吏想为百姓伸张正义，但是，无一例外地遭到趋炎附势的地方官员的打击排挤。并且，安乐公主还打皇宫的小主意——想得到皇城内的昆明池，皇帝老爸虽然宠女儿，但是碍于皇家规矩，没把昆明池给女儿。安乐公主顿时发飙，“大役人夫，掘其侧为池，名曰定昆池”——皇帝老爸你不给我老李家的池子，我就在旁边挖个新的，还一定要胜过那个老池子，就叫“定昆池”，把昆明池给“镇定”住。唐中宗不但不怪女儿瞎胡闹，反而带着皇后去参加“定昆池”竣工宴会，还要求百官们写诗纪念这一伟大的时刻。连皇宫大院都不放在眼里，这样跋扈骄横的公主谁还能管得住她！

要问安乐公主的生活到底有多奢靡，举个简单细节：正史记载，安乐公主有条裙子，上面绣了花卉鸟兽——这倒不算奇特，奇的是这条裙子在太阳下，在阴凉处，在有光、没光的不同地方，

“日中影中各为一色”，经有关学者的物价换算，这条裙子竟价值1亿！

❖ 被皇帝宠爱的公主们觊觎国器，下场可悲

被爸爸深深宠爱的安乐公主政治野心极大，为了让她妈妈韦皇后能像她奶奶一样掌权，她与母亲韦后“相与合谋，于饼馅中进毒”，毒死了皇帝爸爸。唐中宗至死也不会想到他的“贴心小棉袄”竟然是“毒棉袄”。

当皇太子李重茂即位后，安乐公主心还不死，试图掀起宫廷政变把她的叔叔（后来的唐睿宗）和姑妈太平公主除掉。但是，安乐公主的势力没斗得过他叔叔的儿子李隆基和姑姑，被李隆基的势力先行下手，公元710年，六月庚子日夜里，唐朝皇宫刀光血影，“韦（皇）后惶惑走入飞骑营，有飞骑斩其首献于（李）隆基。安乐公主方照镜画眉，军士斩之”。毒死老爸、怂恿老妈当皇帝的权欲熏心的任性公主就此收场。

《大唐新语》还记载：“太平公主沉断有谋，则天爱其类己。诛二张，灭韦氏，咸赖其力焉。睿宗朝，军国大事皆令宰相就宅咨决，然后以闻。”就是说，太平公主在武则天、唐中宗、唐睿宗三个朝代都掌握赫赫大权。尤其是到了唐睿宗时，朝廷七个宰相，其中“四出其门”。

太平公主同李隆基联合，一起推翻了安乐公主和韦氏集团，史书评价她对唐睿宗政权“屡立大功……（皇）上常与之图议大政”，很多军国大事都是她决断的。她不来皇宫的时候，朝廷遇到突发大事，皇帝就安排宰相直接去公主府请示，“则宰相就第咨之”，而且，“公主所欲，上无不听”，就是说太平公主想要什么，唐睿宗就给什么；太平公主想怎么做，唐睿宗都听从。“自宰相以下，进退系其一言”，于是，想当官的人都来找她，“趋附其门者如市。”她的三个儿子薛崇行、薛崇敏、薛崇简都被封为王爷。正史用了八个掷地有声的字来描述她的赫赫声威，“居处奉养，拟于官掖。”其实，当时的太平公主府不啻于皇宫外的“皇宫”。



安乐公主想：“皇帝老爸你不给我皇城内的昆明池，我就在旁边挖个新的，还一定要胜过那个老池子，就叫‘定昆明池’，把昆明池给‘镇定’住。”



晚年，太平公主还想在皇宫里兴风作浪，李隆基即位后，有大臣弹劾她“凶猾无比，大臣多为之用”，于是，唐玄宗开元元年（公元713年）七月，太平公主势力遭到铲除，“太平公主逃入山寺，三日乃出，赐死于家，公主诸子及党与死者数十人。”在查抄太平公主府时，金银堆积如山，奇珍异宝可媲美皇宫大内，她家牧场与圈里的马、羊之类的牲畜，以及庄田菜园里的租金、利息，让一大帮监察官员们忙了好几年还没有忙完，“收之数年不尽”。可见，太平公主得势的时候，有多“任性”。

其实，当时的公主们为了争权夺利，几乎都“各树朋党，更相潜毁”，斗得朝野上下鸡飞狗跳。

❖ 为什么这些唐朝公主如此任性？

除了时代氛围、个人性格等缘由之外，还有几个因素。

首先，公主“任性”有些是向父母学的。“太后欲以太平公主妻其伯父士让之孙攸暨……太后潜使人杀其妻而妻之。”——为了给女儿找老公，武则天不惜把人家原来的老婆杀掉空出“位置”来，这样的“任性”绝对让人瞠目结舌！上行下效，妈妈“任性”到这个级别，女儿想不任性都不可能！

其次，公主“任性”是家长惯的。唐中宗的几个女儿长宁公主、安乐公主需要奴仆的时候，直接叫手下到大街上去随便抓，官员汇报到皇帝那里去，皇帝爸爸根本就不当回事，一切听之任之。于是，在“金枝玉叶”们眼里，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不能做的！

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封建时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帝家的权利最大，谁也约束不了皇帝，于是，被皇帝视为“掌上明珠”的公主们任性而为，也就自然而然了。

时间过了一千多年，大唐盛世的公主们的烜赫声势和“任性”之处，我们再怎么翻查、想象也只是其一鳞半爪而已。但是，正如一句流行语说的那样，人在江湖混，总是要还的，那些“任性”得离谱的公主们，历史已经给了她们应有的“回赠”，并以镜鉴后人。①

“疯狂”的郁金香

文 | 周可



《郁金香热》

[英] 麦克·达什 著
冯璇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年5月
定价：49.00元

在17世纪40年代，郁金香在荷兰掀起一股热潮。成千上万的荷兰人不惜“倾尽所有存款、押上全部财产”参与郁金香交易，并认为购买郁金香花再多钱也值得。这股狂热在1637年达到最高潮，一个郁金香球根的价格卖出过5200荷兰盾，要知道，当时300荷兰盾就能满足一户普通荷兰人家全年的开销。

郁金香狂热的故事让人百思不得其解。英国作家麦克·达什在其作品《郁金香热》中为人们还原了那个狂热年代的历史真相，并且着力分析了其背后的历史原因。

郁金香最早盛开在帕米尔高原山坡上的低矮树丛中，一直蔓延到天山脚下和山谷之中。在传入欧洲之前，郁金香首先征服了土耳其人，并在16世纪上半叶成为土耳其最具代表性的花朵。16世纪中期，郁金香开始在欧洲种植。

在17世纪的荷兰，郁金香的稀少是人们对其狂热的重要原因之一。随着17世纪20年代对郁金香需求的增长，园艺家开始培育更多的郁金香品种。到1730年，荷兰的每个城镇几乎都有专业的郁金香种植者。对于无心园艺的花商来说，潜在的利益成为他们参与郁金香交易的重要原因。花商对球根的投资获得丰富回报的消息传开后，一些其他行业的人也参与进来。

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多来自不同行业的人会为郁金香交易着迷？除了利益原因，复苏中的荷兰经济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在经历了17世纪20年代漫长的萧条之后，荷兰经济在1631年开

始好转，并且在整个30年代都保持增长。此外，麦克·达什还提到，1633-1637年间在荷兰多个城市爆发的黑死病疫情也是影响当时郁金香交易的重要因素之一。瘟疫造成直接后果便是劳动力紧缺，雇主们不得不提高工人的工资，这开始让工人有闲钱投入郁金香交易。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进入郁金香贸易，仅仅交易花朵已经不能满足商人的需要了。以至于人们不仅愿意购买实体的花朵，而且还交易生长在地里的球根的所有权。这样，原来受到花期季节性影响的交易就变成了全年可以进行的交易。这种类似期货交易的商业形式也让郁金香交易的风险增加了。

郁金香的价格在1637年2月毫无预兆地暴跌，“荷兰曾经最富有的人们一夜之间倾家荡产。其他在郁金香上大笔投资的商人也面临着血本无归的下场”。买家不仅对郁金香失去了购买意愿，也失去了购买能力，成千上万巨额的买卖合同只能留给法庭处理。尽管富有的收藏家依旧一掷千金地购买郁金香球根，但大多数荷兰人对郁金香的热情渐渐散去了，倒卖花卉赚钱的日子也结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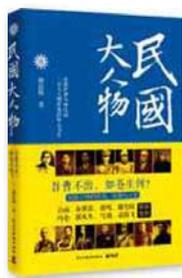
类似的花卉狂热在此后也出现过。比如1838年法国的大丽花热，一花圃的大丽花可以卖到7万法郎，一朵美丽的大丽花甚至可以兑换一颗上好的钻石。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言：“郁金香狂热是一种永远不会彻底消失的病毒。它是一种纯粹的人性疾病。人类对美好的追求和对金钱的贪婪是这种病发育的温床，一旦时机成熟，随时可能爆发。”^①



《开拓者：著名历史学家访谈录》

王希 卢汉超 姚平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定价：39.00 元

本书汇集了当代十余位中外著名历史学家的访谈。在访谈中，他们回顾自己的学术人生，评论和反思当前的历史学的研究现状，并为历史学的未来指明了方向。



《民国大人物》

滕征辉 著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定价：38.00 元

本书讲述的是民国时期影响历史进程的大人物的人生浮沉，着力表现身处大时代的杰出人物的风骨与情怀，旨在绘就一幅民国大人物的精妙群像。



《运动通史——从古希腊罗马到 21 世纪》

[德] 沃尔夫冈·贝林格 著 丁娜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定价：68.00 元

本书不仅讲述各个文明在历史长河中创造的神奇百怪的运动项目，还挖掘和探讨运动与其文化背景互动的关系。



《苦难辉煌》

金一南 著
作家出版社
定价：58.00 元

金一南 15 年心血之作，出版 6 周年修订增补纪念版。首次使用战略思维、战略意识点评中国近现代史。只有透彻读懂那段历史，才能读懂中国的当下和未来。



《我们应有的反思》

葛剑雄 著
中信出版社
定价：68.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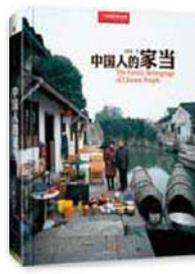
本书精选作者三十余年最具代表性的文章，或学术前沿，或分析历史迷局，或探讨社会热点，带有强烈的思辨精神与深厚的人文关怀。



《一个瑞士人眼中的晚清帝国》

[瑞士] 阿道夫·克莱尔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定价：280.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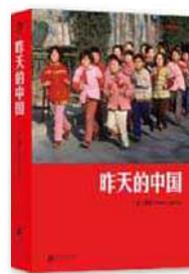
一百多年前，瑞士丝绸商阿道夫·克莱尔来到中国，足迹遍及大江南北，收藏了大量晚清时期的珍贵照片，这些华夏旧影生动地勾勒了鸦片战争后的中国风貌。



《中国人的家当》

马宏杰 著
中信出版社
定价：238.00 元

这本中英双语摄影画册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生活情境的视觉图景，是解读当下中国社会生活在场的图像文本，也昭示了影像所具有的特殊价值和功能。



《昨天的中国》

[法] 阎雷 著 杨宁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后浪出版公司
定价：128.00 元

本书全面呈现 1985—2000 年间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的日常生活、经济起飞和社会巨变，用镜头为整个中国创作一幅最鲜活、最富生命力的肖像。

所谓“拼爹”

文 | 薛仁明

西安有份杂志，问了我“拼爹”的问题。这问题，三言两语很难说得清。毕竟，好的家世给了后世子孙，究竟是庞大资产呢？抑或是沉重的包袱呢？还真是千差万别、因人而异。我有一些出身世家的朋友，每回见到他们的学问深厚、见识广博，尤其那种自幼在家庭教育中所熏陶出来的进退有据、从容不迫，我都不禁要自叹弗如、心生羡慕。但话说回来，能有这样的家学渊源，当然极好；可是，这毕竟不可能是人人能有。倘使无有，其实，也未必打紧。

这让我想起了在1917年，毛泽东二十四岁，那响还是湖南第一师范的学生。那一年的暑日，他同友人萧子升，分文未带，以叫化子的装扮，行旅了湖南数县。沿途之中，每回问路，萧子升因为书香世家的出身，放不下身段，总必定要整整衣服、干咳两声，然后才开得了口。而且，问路之时，也只挑大户人家去问。至于毛泽东，完全不然，他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遇见了任何人，或站、或坐、或蹲，不管啥样，总可以畅谈开怀；即使访贫问苦，也能口角春风、亲切如故。

毛泽东出身农村，因此，没萧子升那样的包袱。

又说刘邦当年，一向就是“自监门戍卒，见之如旧”，才瞬间，便可与市井之人稍无隔阂的。这样的无隔，借用朱天文的说法，是像个“速溶颗粒，当场溶于对方，溶于情境”。作为“速溶颗粒”，刘邦最惊人之处，是在于他既能“溶于市井走卒之间，又不可思议能融入张良者流”。若纯粹粹粹聊聊天、谈谈话，甚至只是演演戏地搭个腔，这当然不难；可真要同时溶于市井走卒与张良者流这迥然有别的二者，老实说，极不容易。正因极不容易，那聪明绝顶的张良，才会叹息言道，“沛公殆天授！”

刘邦出身民间，又状似无赖，更偶得天幸，因此，才修得这“速溶颗粒”的能耐。其中，民间的出身，是个基础；这样的基础，使他有如禅僧所说的“体露金风”或者庄子所说的“浑沌”般地雨露风霜、天生地长，于是，日后逢人遇事，每每充满了弹性；即使遭困受挫，也总能百折不挠。如此充满弹性与百折不挠，使刘邦屡屡战、屡仆屡起，心中毫不罣碍，总像个无事之人。这恰恰与他的对手项羽那样地暴然而兴又骤然而亡完完全全地相悖相反。遥想当日，项羽败走，一路疾奔至乌江，那乌江的亭长正横船（拢船靠岸）以待，只待渡过江水，项羽就可重回江东，徐图再起。可是，项羽望着那一汪江水，想起那五年的霸业，再想起江东故土，顿觉百转千回，真要往前渡去，竟是举步维艰、万万不能呀！“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

是呀！项羽出身贵族，自有其身段，更有其面子问题。做为将军世家之后，项羽当初才二十出头，便已光芒万丈；数年后，更“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这样地不可一世，转眼间，却只落得兵败而逃。此时此刻，真让他这样地奔回江东，究竟颜面何在？看到父老，又有“何面目见之”呢？

是的，乌江边的项羽，前思后想，除了自刎，确实也别无选择了。换言之，他贵族出身的背景，固然使他有条件在极短时间内暴然而起，可到最后，如此出身的种种身段与面子问题，却也将自己逼到无以转圜。他的出身，造就了他，也毁掉了他。

所谓“拼爹”，不也如此？①

（摘自《其人如天：史记中的汉人》

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